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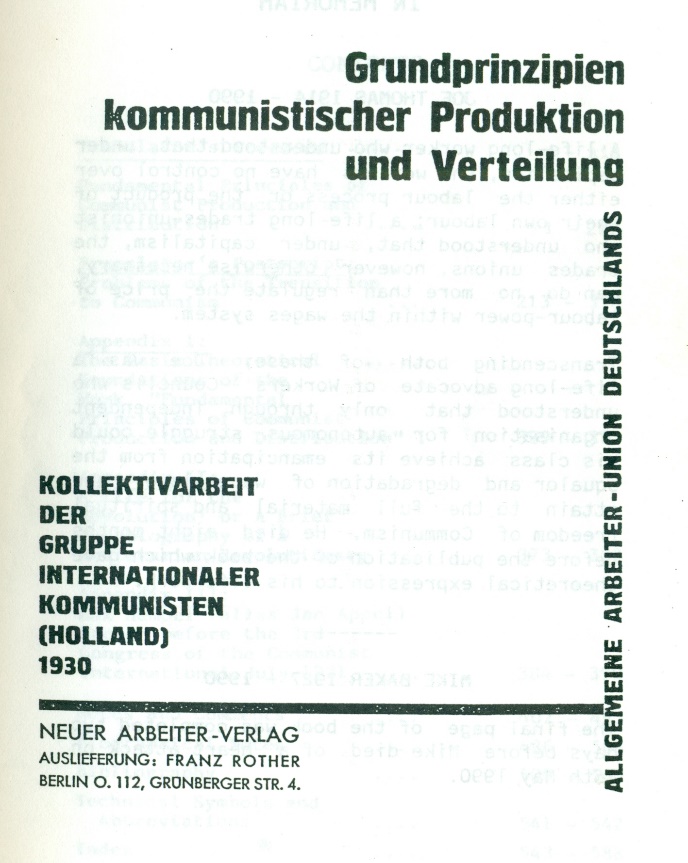
1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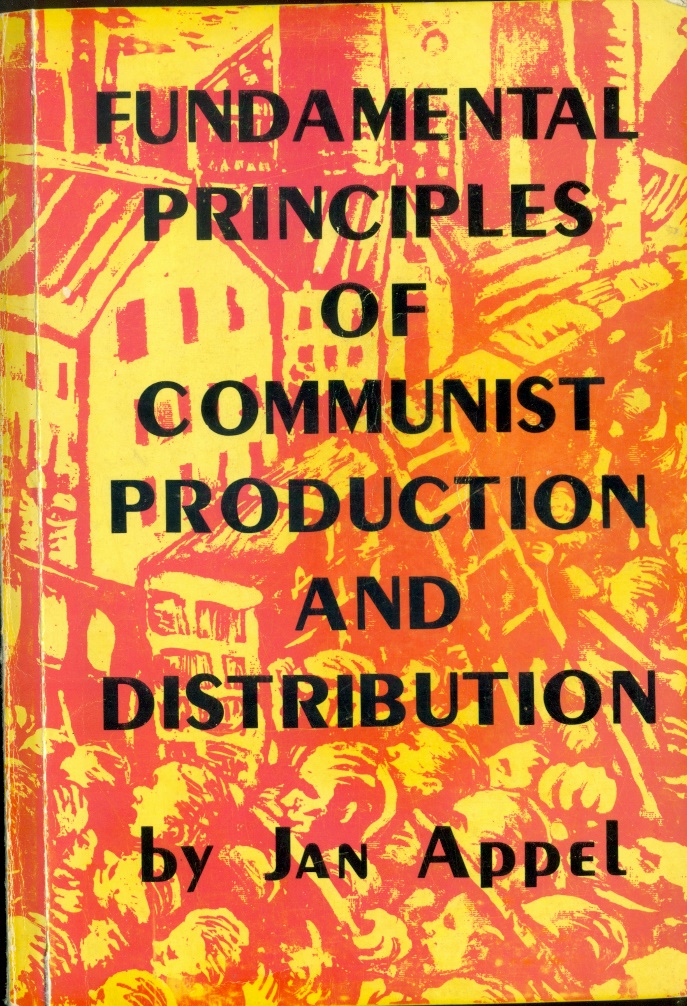
前言

中文译者我比较了此书的带有保罗·马蒂克导言的libcom版本、MIA（马库）版本与潘涅库克档案馆（AAAP）版本，发现了一点编辑错误，与前两个网站的管理员联系更正，最后进行了翻译。三者都基于同一个来源*Movement for Workers' Councils*（London 1990），不过MIA和libcom版本是相同的，但与AAAP版本略有不同，书中会有标记。原文中斜体和大写用翻译成中文后加粗处理。Libcom版带了一个总结，AAAP版则有各章内容摘要。

附三个网站对此书的介绍和评论：

潘涅库克档案馆：





The titlepage of the first editions in German (1930) and the cover of the English edition (1990)

Sourc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ommunist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 Collective Work of the Group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s of Holland (g.i.k.) ; [On the cover: by Jan Appel]. – London : Movement for Worker’s Councils, 1990. – xii, 589 p.

转写来源：[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https://www.marxists.org/subject/left-wing/gik/1930/)（MIA），由Mike Baker翻译和编辑；Jonas Holmgren做了标记（他做了小的修正）。Mike Baker的翻译是经过‘编辑’的，因为他有时试图“改善”和“完成”荷兰国际共产主义小组（GIC）的工作；他插入、删除和改变词语和表述方法，例如他倾向于将“国家共产主义”翻译成“国家资本主义”，根据GIC的精神，这并没有错，但这不是GIC当时写的，而且还模糊了历史辩论的发展。他还在注释中增加了评论（90页），可以在整本书的pdf中查阅。此外，他使用的是1930年的版本，忽略了1935年的第二版，即扩充了的荷兰语版本，该版包含了1931年版（由Mike Baker单独翻译和出版）和1935年版（没有翻译，可能Mike Baker不知道它）的补充内容，这两个版本是用德语出版的。

这里按照英文版本重新编辑完成，多少根据了德文原版的意思，但没有全面校订。事实上，需要进行认真的比较，才能看出Mike Baker的改动。

Libcom评价：

我们不同意此书关于使用劳动券的规定，但转载此文供参考。作为替代方案，我们推荐阅读*A world without money: communism*。

# MIA介绍及评价

《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则》是对共产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论述——事实上，除了马克思在其《哥达纲领批判》（该书就是在此基础上编写的）中给出的第一个基本轮廓之外，这本书还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基本轮廓。第一份工作草稿是由著名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的资深成员扬·阿佩尔（Jan Appel，又名马克斯·亨佩尔，Max Hempel）起草的。该草案随后由荷兰国际共产主义小组（GIK）成员组成的集体修改并完成了荷兰语版，并由德国工人总联合会（Allgemeine Arbeiterunion Deutschlands, AAUD）于1930年出版了德语版。它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作用就像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作用一样，也许是德国革命最先进的思想成果。

共产主义的经济前提被证明在于废除工资劳动、货币和所有由价值决定的生产和分配之中，并由一个通过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进行调节的使用价值生产体系所取代。这部作品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在实现从初级向较高阶段过渡的过程中，逐步“废除”自身的过程进行了清晰而深刻的论述。

国家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崩溃，赋予了德国和荷兰革命运动的这一历史文件非常重要的意义。今天的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可能会发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为苏联建立的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缺陷。多亏了这项工作，人们的注意力能集中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简单但又很容易被忽视的事实上，即布尔什维克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没有建立在客观的社会调节方式上，因此，它依赖于一批由大小官僚组成的军队的主观命令，这些官僚作为统治精英，组织在一个与国家融合了的强力政党的专政之下，实际上剥夺了广大劳动人民对经济进程的所有控制权。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世界长期以来所熟悉的可怕暴政的经济基础，也揭示了布尔什维克体制是一个错误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模式，误导了世界70多年！

评价

正如下面的译者介绍所表明的那样，这篇文本代表了对马克思所提出的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进步。此文本众多的优点之一是始终坚持，任何非剥削性的制度要真正发挥作用，所有参与者都必须理解其经济基础。除了使旧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专家”，后资本主义经济还有淘汰倒数第二名的歪曲者、江湖骗子和富人的马屁虫——政治家的任务。为此，为旧社会的中产阶级创造就业的各级官僚计划都将被废除，在人民的愿望和实现这些愿望的实际需要之间的唯一机制就是工人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将成为目前议会制度所不具备的一切。通过位于工作场所和社区的工人委员会，人民的声音将得到字面意义的重视。如果代表发言人歪曲或操纵委员会的决定，他们可以被召回并立即被解除。与目前（资本主义）制度下被人民惯坏了的议会毒蛇和渎职的代表不同，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将自动从其代表队伍中删掉追名逐利者、吸血鬼和懒汉，而这些人占据了今天议会的主要席位。如何做到这一点，也是仔细研究这个文本将得到的一个有益之处。

这个版本的《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则》直接取自伦敦的工人委员会运动（the Movement for Workers' Councils）成员Mike Baker（已故）的对德文文本的首次英文翻译，该团体成立于1989年，总部设在伦敦，现在早已解散。印刷版已经出版，但由于质量不高，以及包含了不相干的材料，使这个虚拟出版物成为必要。

对于围绕后资本主义经济和更广泛社会的整体性质的问题进行严肃对待之必要性，我们希望鼓励大家进行一些辩论。尽管下列文本产生的问题比它试图解决的问题要多，但这更多地表明了非限制性的论证思路，而非它有任何根本性的缺陷。把类似《基本原则》的作者诚实地处理的那些棘手问题……留给后代，或者留给一些认为这些问题终会得到解决的想当然的假设，这实际上是对革命责任的一种推卸。为了要求全世界的工人把资本主义消灭在野蛮社会的历史范围里，至少需要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新社会的理念。

附潘涅库克档案馆和Libcom版本的网址：

英：<http://aaap.be/Pages/Transition-en-Fundamental-Principles-1930.html>

德：<http://aaap.be/Pages/Transition-de-Fundamental-Principles-1930.html>

Libcom：<https://libcom.org/library/fundamental-principles-communist-production-gik>

目录

[MIA介绍及评价 3](#_Toc83649876)

[1970版本中保罗·马蒂克的导言（Libcom版附带） 7](#_Toc83649877)

[AAAP 版内容摘要 15](#_Toc83649878)

[代序 18](#_Toc83649879)

[一. 国家共产主义还是自由平等生产者的联合体 20](#_Toc83649880)

[1. 国家共产主义 20](#_Toc83649881)

[2. 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21](#_Toc83649882)

[3. 国有化和社会化 23](#_Toc83649883)

[4. 社会平均劳动时间 26](#_Toc83649884)

[5. 走向自由平等生产者的联合体 28](#_Toc83649885)

[二. 迄今为止在界定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 32](#_Toc83649886)

[1. 马克思的门徒 32](#_Toc83649887)

[2. 自由共产主义 35](#_Toc83649888)

[三. 一般再生产过程 40](#_Toc83649889)

[1.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再生产是个别资本集团的职能 40](#_Toc83649890)

[2. 公式 (P+C)+L= T. PRD(总产品) 42](#_Toc83649891)

[3. 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所持的价值观念 43](#_Toc83649892)

[四. 社会平均生产时间作为生产的基础 47](#_Toc83649893)

[1. 考茨基的规定 47](#_Toc83649894)

[2. 莱希特的规定 48](#_Toc83649895)

[3. 一些比较性的评价 50](#_Toc83649896)

[4. 公式(P + C) + L的运行模式 51](#_Toc83649897)

[五. 社会平均生产时间作为分配的基础 54](#_Toc83649898)

[1. 莱希特认为的产品分配 54](#_Toc83649899)

[2. 沃尔高的国家共产主义作为分配中的一个因素 57](#_Toc83649900)

[3. 生产机关对生产者的支配 60](#_Toc83649901)

[六. 一般社会劳动 61](#_Toc83649902)

[1. 一般社会用途（GSU）单位 61](#_Toc83649903)

[2. 莱希特的价格政策 63](#_Toc83649904)

[3. 产品的分配 65](#_Toc83649905)

[4. 社会化的分配 67](#_Toc83649906)

[5. 混合型工业单位 69](#_Toc83649907)

[七 .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 71](#_Toc83649908)

[1. 生产者与产品的关系 71](#_Toc83649909)

[2. 市场 73](#_Toc83649910)

[八. 扩大规模的生产，或共产主义的积累 78](#_Toc83649911)

[1. 积累作为一种社会职能 78](#_Toc83649912)

[2. 积累基金的应用 79](#_Toc83649913)

[3. 积累的特殊形式 82](#_Toc83649914)

[九. 一般社会核算体系作为经济过程整合的模型方法 86](#_Toc83649915)

[1. 劳动时间作为生产预算的基础 86](#_Toc83649916)

[十. 一般社会簿记制度作为经济过程的控制制度 90](#_Toc83649917)

[1. 主观行政决策的控制方法 90](#_Toc83649918)

[2. 客观的控制方法 91](#_Toc83649919)

[3. 通过对产品流的登记进行控制 93](#_Toc83649920)

[十一. 对一般社会用途单位(G.S.U.)或公共机构单位的控制制度 96](#_Toc83649921)

[十二. 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 98](#_Toc83649922)

[1. 基本范畴 98](#_Toc83649923)

[2. 生产时间和再生产时间 100](#_Toc83649924)

[3. 生产资料的折旧 100](#_Toc83649925)

[十三. 无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与一般会计控制制度 101](#_Toc83649926)

[十四. 土地问题与农民 103](#_Toc83649927)

[1. 面向商品生产的发展 103](#_Toc83649928)

[十五. 农民与革命 106](#_Toc83649929)

[十六. 俄罗斯和匈牙利的土地革命 107](#_Toc83649930)

[1. 俄国 107](#_Toc83649931)

[2. 匈牙利 108](#_Toc83649932)

[3. 结果 109](#_Toc83649933)

[十七. 德国革命中的农业无产阶级和中小农户斗争的开始 110](#_Toc83649934)

[1. 斗争开始 110](#_Toc83649935)

[2. 革命蔓延 110](#_Toc83649936)

[3. 僵局 111](#_Toc83649937)

[4. 农民的作用 111](#_Toc83649938)

[十八. 农民和工人委员会 113](#_Toc83649939)

[十九. 后记 115](#_Toc83649940)

[1.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115](#_Toc83649941)

[2. 从货币到劳动时间的计算 118](#_Toc83649942)

[3. 所谓的乌托邦思想 120](#_Toc83649943)

[AAAP网站的编辑注释 124](#_Toc83649944)

[总结——对《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则》这部作品理论基础的总结 一项补充工作（AAAP版附带） 124](#_Toc83649945)

[工人委员会作为共产主义生产的组织基础 124](#_Toc83649946)

[马克思主义关于决定对工人阶级统治的基本社会前提的规定 127](#_Toc83649947)

[基本因素 127](#_Toc83649948)

[目标与手段的混淆 128](#_Toc83649949)

[社会民主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129](#_Toc83649950)

[国有化和社会化 131](#_Toc83649951)

[俄国革命提出的困难 132](#_Toc83649952)

[“国家共产主义”下对劳动和工人阶级的统治形式 134](#_Toc83649953)

[“自然的”[以物易物]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分配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理想 136](#_Toc83649954)

[实验 136](#_Toc83649955)

[俄国革命的两个教训 138](#_Toc83649956)

[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单位 139](#_Toc83649957)

[生产的调节 139](#_Toc83649958)

[对分配的调节和控制 141](#_Toc83649959)

[出版商提示 142](#_Toc83649960)

# 1970版本中保罗·马蒂克的导言（Libcom版附带）

下面介绍的这本集体编写的书《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则》，现在是四十年来的第一次出版。该书作者们是荷兰国际共产主义小组（GIKH，或者GIC——译者）的成员，他们参加了委员会运动。

委员会（Councils）首次出现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期间。据列宁说，即使在那时，他们也可以夺取政治权力，尽管他们实际上仍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边缘。对托洛茨基来说，与活跃在工人阶级中的政党不同，工人委员会代表了无产阶级自己的组织。荷兰理论家安东尼·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认为委员会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这将导致其阶级统治和对生产的控制。随着1905年俄国革命的结束和委员会的结束，人们对这种新的组织形式的兴趣消退了，工人运动的组织再次掌握在传统政党和工会手中。后来，1917年的俄国革命再次使委员会的观点引起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注意。这次不仅是革命工人自发组织的表现，而且也是对抗传统工人运动中的反革命政策的必要手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国际的瓦解标志着工人运动第一阶段的结束。工人运动融入资产阶级社会，这是很久以前就可以预见到的事情，现在已经成了无可辩驳的事实。工人运动并不是革命运动，而是工人适应资本主义的运动。工人们及其领导人对废除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兴趣，他们满足于在现行制度下的工会和政治活动。各党派和工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取得的微薄成就表达了工人的真正利益。由于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任何真正的革命运动都成了不可能。

改良派工人运动所依据的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各阶级之间可能实现和谐的理想，在与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碰撞中被击得粉碎。这些矛盾表现为危机和战争。当战争的苦难暴露出资本主义的真实性质时，起初只限于工人运动中少数激进分子的革命意识形态在群众中传播开来；暴露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性质，还有在资本主义中出现的工人组织的性质。这些组织已经摆脱了工人的控制；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使其官僚机构永久化。

由于这些组织的功能与维护资本主义相联系，它们只能反对任何真正的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革命运动实际上需要超越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赋予工人对其组织的权力，这些组织不仅包括部分工人阶级，而且包括全部工人阶级。委员会运动是建立适合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形式的第一次尝试。

俄国和德国的革命都在委员会运动中找到了他们组织形式的表现。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没有证明自己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力，并将其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虽然俄国委员会运动无疑要归咎于俄国社会和经济条件的普遍落后，而德国运动的失败则是由于工人群众缺乏以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意愿。社会化被看作是政府的工作，而不是工人自己的任务；因此，委员会运动宣布了自己的解体，资产阶级民主重新建立。

虽然布尔什维克党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下取得了政权，但它是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概念行事的，即建设社会主义是国家的任务而不是委员会的任务。虽然在德国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社会化，但布尔什维克国家摧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没有给予工人任何生产权利。无论它如何维护工人的利益，其结果都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它使工人的社会状况没有改变，实际上继续剥削他们，为一个新的特权阶级谋取利益。社会主义既不可能通过改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也不可能通过新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国家来实现。

除了客观的或主观的不成熟的情况之外，本来可以通向社会化的道路仍然笼罩在朦胧之中。社会主义理论一般倾向于涉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战略和战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及其制度似乎已经在资本主义中预先设定好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马克思本人只留下了几个基本的指示，因为，从实践上讲，关心未来，关心不能根据现在或过去来理解的情况是没意义的。

然而，与后来的解释相反，马克思确实明确表示过，社会主义不是指国家，而是指社会。社会主义，作为“自由平等生产者的联合体”，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

已经包含在资本主义中的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人们不认为它指的是生产者在生产和分配方面可能的自我组织，而是指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最终导致国家对经济各方面统治的集中和集权倾向。这种社会主义的概念首先是由资产阶级提出的，然后又被他们指责为一种幻想而遭到攻击。

像委员会这样的大规模革命运动的结束，并不排除它在新的革命形势下重新出现的可能性。此外，人们总是可以从失败中学习。革命失败后，委员会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并不仅仅是为委员会制度进行宣传，还包括对运动中导致其失败的不足之处进行调查。它的缺点之一，也许是最大的缺点，是委员会对于它们在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组织中的作用完全没有明确的立场。由于委员会设在工厂，社会协调与经济生活之综合的起点，而正是在工厂内，生产者必须对他们生产的东西拥有权力。《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则》是西欧委员会运动在委员会的基础上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首次尝试。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所面临的巨大困难，而这项工作主要与共产主义经济中计算与核算的单位有关，乍一看似乎很奇怪。

由于我们无法预知会遇到的政治困境的细节，因此对于此类主题，我们只能投身于猜测。摧毁一个特定的社会制度可能是容易的，也可能是困难的：这取决于无法预见的那些情况。然而，这项工作不是关于如何组织革命的，而是关于革命后的问题。由于不可能预测革命后的经济状况，人们甚至不能预先制定出必须要完成的工作计划。但是，可以对建立某些理想的社会条件（在这里是指共产主义的条件）所必需的程序和工具进行事先讨论。

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理论问题在俄国革命后成为一个实践问题。但这种实践从一开始就由国家集中控制的概念决定，这是社会民主主义各派别的共同遗产。关于实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争论并没有触及真正的问题：工人对其生产的控制。而争论的焦点却是如何在中央当局的指导下进行经济规划。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既不知道市场，也不知道竞争、价格和货币，所以社会主义只能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中，通过数字统计，生产和分配都由一个中央机构决定。资产阶级的批评正是集中在这一点上，其声称在这种条件下，合理的管理是不可能的，因为生产和分配需要一个价值尺度，如市场价格所提供的尺度。

为了避免预先回答在《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则》中就这一问题提出的观点，它的作者们在作为生产分配基础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找到了用以解决必需的计算单位的方法。他们严谨证明了这种公共计算与会计的方法在社会再生产的两个时刻里实际应用。而就利用方法获得特定结果而言，他们的推理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使用这种方法的必要前提是实现共产主义类型的生产分配制度的意愿。一旦这个假设被认可，就没有什么能阻挡这种方法，尽管它不可能是适合共产主义的唯一方法。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所有经济都是“时间”经济。劳动分工的安排，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根据生产和消费的需求来实现的，就像在资本主义里一样，劳动时间是生产的尺度，但不是分配的尺度。在价格这个资本主义调节器的基础上，价值与劳动时间相联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两者同时又是市场关系），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和动力的资本积累，它们排除了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的等价交换（exchange of equivalent values as measured by labor time）。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发展，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人们很容易想象，在社会主义中，价值规律也必须是有效的，因为在社会主义中也必须考虑到劳动时间，以便有一个合理的经济。但劳动时间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能转化为“劳动时间价值（labor time value）”，在这种条件下，对必需的生产社会协调取决于市场和私有财产的关系。没有资本主义的市场关系，就没有价值规律，尽管为了使社会生产适应社会的需要，可能（也许是永远）需要考虑劳动时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则》谈到了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作者强调，以前有人提出把劳动时间作为经济计算的单位。他们认为这个建议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只建立在生产上，而不是基于分配，而在这方面看，仍然与资本主义有关。在他们看来，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必须对分配和生产都有效。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在计算劳动时间方面遇到了一个困难和弱点，马克思也考虑到了这个困难，然而除了废除基于劳动时间的计算外，他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的答案。他提出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原则。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强调，由于生产者的劳动能力和个人情况不同，按照劳动时间的比例分配将意味着新的不平等。有些人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工作强度更大；有些人有家庭需要照顾，而有些人则没有；因此，根据劳动时间分配的平等将导致消费条件的不平等。马克思写道：“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哥达纲领批判》）。虽然他认为这种不便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共产主义原则。《基本原则》的作者说他们提出的“只不过是对马克思自己的理论方法的一贯应用”，而只有当这种思想被应用于，等价交换原则仍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时，他们这句话才是正确的，而等价交换的原则将在社会主义中得到终结。

对马克思来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出处同上）因此，按劳动时间分配的制度可能存在的缺点无法通过生产和分配的分离来克服，因为生产者对生产的控制也意味着他们对分配的控制，正如国家对分配的决定——自上分配——同样意味着国家对生产的控制一样。《基本原则》的作者正确地强调了这个事实：生产者必须有最充分的机会控制自己的生产，但是，要这么做就需要一种按照劳动时间的分配形式，这又完全是另一件事。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在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社会生产力已经足够发达，可以过剩地生产消费资料。超过一半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及与之相关的非生产性活动（这完全不考虑未被剥削的生产力）肯定与人类的实际消费无关，而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理性经济中才有意义。那么，很明显，在共产主义经济的条件下，可以生产如此多的消费品，以至于对它们在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个人所占份额的任何计算都是多余的。

然而，要达到已经有可能实现的富足状态，就必须根据生产者的实际需要彻底改变社会生产。将资本主义生产转变为以满足人类需求为导向的生产体系，不仅会因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废除而带来产业技术发展，而且也会因此为未来人类的生存提供更大的保障，这一保障现在已受到明显的威胁。

虽然《基本原则》正确地强调了生产是由再生产所制约的这一事实，虽然共产主义生产的起点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终点，但新社会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对生产的目标和方法进行适当的修改。在这些修改中所采用的程序和所获得的结果将允许选择正确的分配方式，既考虑到生产的各个阶段，也考虑到实际的、不同的社会需求。还有一种可能是，社会转型所需要的阶级斗争导致生产基础的部分破坏，这可能会排除按劳动时间分配的可能性，而不至于使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无法实现，比如说通过配给制。而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确实可以由工人自己决定，这样就没有必要对劳动时间进行苛刻的计算了。但《基本原则》假定的是一种“正常的（normal）”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即一种已经建立起来并在其自身的再生产条件下运转的制度。在这种条件下，与劳动时间挂钩的分配形式似乎是多余的。的确，《基本原则》中所阐述的“生产者与他产品之间的确切关系”，只涉及个人在生产中的部分——在减去社会消费和社会生产之再生产所需的那些产量部分后。社会化进程表现为个人消费的减少和公共消费的增加，通过这种方式，共产主义生产最终趋向于废除分配中的劳动时间计算。没有市场的经济结构要求把消费者组织成合作社（与工厂直接联系），在合作社中，有关消费和生产的个人需要可以被集体地表达。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是《基本原则》发展最少的部分。因为资本主义在其辩护中利用的正是市场经济所谓的消费选择的自由。实际上，完全可以不借助于市场来确定消费要求，甚至这么做可以更有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与社会阶级存在有关的分配形式所制造的市场需求扭曲将消失。在生产中也是如此，（资本主义中的——译注）计算也只能是近似的，因为劳动和再生产的过程是不断变化的。总体生产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计算有一定的延迟，得到的结果总是滞后于实际的再生产。计算的“精确性”，不管通过现代方法和技术有多少可能减少报告所需的时间，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仍将不断变化。种缺乏精确性的情况，对于在生产本身或更普遍的水平上计算生产和再生产来说，并不构成不可克服的障碍。但实际情况会与预测的结果不同，只有在这种差异中才能发现真实的生产状况。在计算劳动时间时，并不是要使通过计量单位获得的生产时间与实际使用的平均劳动时间和由此产生的产量完全相符，而是对社会劳动进行安排和分配的问题，就其本质而言，这只能是近似地实现。对于一个有计划的共产主义经济来说，这样的结果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基本原则》的作者设想生产组织的方式是“生产者与他产品之间的确切关系将成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基础”，他们认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生产者的头上架起一个机关。只有通过明确界定产品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废除管理者和行政人员在社会产品分配中的作用”。因此，无阶级社会的必要前提是生产者对其产品分配的自我决定。在现实中，生产者和产品之间直接关系的确定只能是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它将委员会制度确立为社会组织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太需要根据分配来调节生产过程了。人们可以很好地想象对消费资料的受控分配，还有不受控分配的情形，但这并不一定会导致新特权阶层的存在。此外，仅仅假定一个分配标准并不是建立共产主义经济的充分条件：实际上，后者不能简单地建立在生产者对社会产品分配的参与上，而是在这些问题之外，建立在社会生产的物质条件上。

在资本主义中，分配只是表面上由市场调节。虽然生产必须在市场上实现，但市场本身是由资本的生产决定的。交换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的积累是生产过程的基础。使用价值在生产中只是作为增加交换价值的一种手段出现。只有当生产者的真正需要与积累的需要相一致时，才会得到考虑。生产，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按照交换价值关系来调节的，而交换价值关系只是碰巧与使用价值关系重合。共产主义社会只为使用而生产，因此必须使生产和分配适应社会的真正需要。生产是先于分配的，尽管它是由消费者的需要决定的。但是，组织生产需要的不仅仅是准确地确定生产者和他的产品之间的关系：它需要控制全社会的需求和生产能力，以它们的物质形式，还有对社会劳动的充分分配。

委员会制度至少要建立一些机构，使它能够监督整个社会的需求和可能性。由此获得的信息必须导致无法由每个工厂组织单独做出的决策。委员会制度结构必须是这样的：生产将被集中调节，但不侵犯生产者的自主权。此外，在工厂本身，工人的决定将由委员会来执行，但不会导致委员会对工人的支配权。在国民生产中也是这样，从更普遍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一些组织方法，从而在生产者的控制下，协调这些工厂一级以上的机构。但是，无论如何，《基本原则》所主张的中央集中制与联邦制矛盾的这种解决办法，不可能通过“在一般社会簿记中登记经济过程”的方式被轻易解决，而很可能需要其他机构，将其纳入委员会制度，这些机构将专门用于组织经济。

在《基本原则》中，反对由国家指导的对生产、分配的中央管理机构是以俄国的经验为基础的，这些机构并不适用于委员会制度，而适用于国家资本主义。但在后一种情况下，生产和分配也确实不是计划机构的责任，而是国家的责任，国家把计划机关当成工具。正是国家机器对工人的政治专政，而不是经济计划，导致了一种新的剥削，计划部门也参与其中。如果没有国家机器的政治专政，工人就不会被迫服从于对生产、分配的中央管理。

因此，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第一个要求是必须没有与委员会并存或凌驾于委员会其上的国家机器，而“国家”职能，即镇压反革命倾向，必须由工人自己在其委员会中组织实施。任何

任何作为工人的一部分，渴望获得国家政权或在夺取政权后将自己设置为国家机器的政党，无疑都会试图控制生产和分配，并谋求使这种控制永久化，以保持它所占据的地位。如果少数人控制了多数人，那么剥削仍然存在。委员会制度不可能允许任何国家与它并存，还同时不放弃它的使命。但是，如果没有这种从社会中分离的国家权力，任何生产分配的计划都只能由委员会制度来执行。计划机构本身也是企业（enterprise），它们与其他企业一起被统一在一个委员会系统中。关于这一点，现在应该指出的是，工人阶级也是不断变化的。《基本原则》认为，聚集在工厂中的工业无产阶级是具有社会决定性的阶级。以工厂为基础的委员会制度决定了社会结构，并迫使其他阶级，如独立的农民，融入新的社会经济体系。在过去的40年里，工人阶级，也就是那些为工资或薪水而工作的一类人已经增长，然而，相对于整个人口来说，产业工人的数量已经下降。一部分白领与体力劳动者一起在工厂工作，另一部分在分配和行政领域工作。由于生产越来越依赖于科学，而科学的生产力有超过直接劳动的生产力的“趋势”，大学，至少部分地，也可以被看作是“工厂”。而如果在资本主义中，无论科学状况如何，剩余价值总是意味着无偿劳动（剩余劳动），那么共产主义的社会财富就不是表现为劳动的增加，而是表现为必要劳动的不断减少，这是摆脱了资本主义限制的科学发展的结果。生产逐渐社会化，这是群众越来越多地参与生产过程的结果，劳动群众只能存在于最严格的协作和各种工作的相互渗透中。一句话，工人阶级的定义已经扩大；今天比40年前包容的范围更大了。劳动组织的变化已经包含了劳动分工的更替，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办公室和工厂之间、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的分离的更替：这是一个过程，通过所有生产者参与现在面向社会的生产，可以导致一个包括全体社会的委员会制度，从而结束阶级统治。我们可以赞同《基本原则》中对“领导人、专家和科学家”的不信任，他们自以为是地指挥生产和分配，但同时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除了管理者之外，其他人也是生产者。委员会制度必须使他们与其他生产者一起工作，并剥夺他们在资本主义中所占据的特权地位。然而，由于社会领域的倒退总是可能的，很明显，即使是委员会系统也会衰败；例如，由于生产者对他们自己的自主权缺乏兴趣，以及随之而来的将委员会的职能转移给体制内部的人员，然后他们变得独立于生产者。作者认为，这种危险可以通过“产量的新计算结果作为生产的一般基础”来避免。但是，由于首先对产量的计算必须被公布，期望的效果可能会由于一系列的修改而丧失。

正如作者所解释的那样，这个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成了。通过“生产的客观运行”，通过对后者与再生产的关系的控制，该体系可以防止个人获得决策权，如国家资本主义的情况。新的生产分配制度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保障，虽然“生产的客观运行”实际上总是由个人来保证的。在资本主义中，也有生产的“客观运作”，这是由市场法则所决定的，所有个人都要服从市场法则。是制度支配着人。这种制度拜物教的外在表现掩盖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的现实。在经济范畴的背后是阶级和个人，每当制度拜物教被克服，阶级和个人之间的公开斗争就会暴露出来。虽然共产主义也是一种社会制度，但它并不凌驾于人之上，而是通过人来运作的。它没有自己的生命，让个人必须适应它；“生产的客观运作”是由个人决定的，但这些个人构成了委员会体制。

这些简短的意见足以说明，在《基本原则》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完整的方案，而是对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问题的初步尝试。而且，尽管《基本原则》涉及的是未来的社会状态，但它同时也是一份历史文件，它揭示了过去辩论中所达到的阶段。它的作者处理了半个多世纪前的社会化问题，他们的一些论点已不再适用；《基本原则》介入了自然经济理论家和市场经济代表的争论，证明了两者的错误立场。社会主义一般不再被认为是一个新的社会，而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市场经济的捍卫者说的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而计划经济的捍卫者则利用基于市场的经济。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组织并不排除通过价格操纵对消费品进行不平等分配。“经济法则（economic laws）”被人们认为与社会类型无关，目前的讨论最多是围绕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哪种混合体更“经济”。

“经济原则（economic principle）”，即经济合理性原则，正如人们经常重复的那样，它是每一种社会秩序的基础，它被说成是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结果，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利润原则，它总是倾向于最大的剥削。因此，工人阶级的“经济原则”只能是废除剥削。作为《基本原则》之基础的这一原则，直到现在对工人来说都是一纸空文。除了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明显的剥削外，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会议在讨论社会主义问题时只会提到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总是被认为是国家所有制。无论是否有市场，商品的行政分配始终是集中决策的对象。与资本主义一样，剥削有两种形式：通过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持续分离，以及通过政治权力的垄断。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某种共同管理权被承认或强加给工人，市场机制就把自我剥削与国家剥削结合起来。无论在《基本原则》中发现什么弱点，在目前的情况下，今天和明天，它仍将是所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讨论和认真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努力的起点。

1970.2

# AAAP 版内容摘要

一. 国家共产主义或自由平等生产者协会

国家共产主义：阶级统治的一种新形式。生产机关凌驾于生产者之上。国有化和社会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只有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共产主义生产中才会变得成熟，其中，管理和行政由“自由平等生产者的联合体”来发展。《资本论》和《反杜林论》中阐述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委员会制度使“联合体”再次进入社会视野。

二. 迄今为止在界定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

马克思的门徒们阐述了社会由于资本集中而自动和自发地发展为共产主义的理论（希法亭）。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得出了一种共产主义工业生活的形式，它完全通过使用价值的生产而建立起来，但这种生产却没有调节或会计控制单位的干预。韦伯和米塞斯揭示了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可能性，这使得马克思主义阵营产生了巨大的困惑。纽拉特、沃尔高和希法亭回避了这个问题。考茨基和莱希特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调控和会计控制的基本单位。考茨基回到资本主义寻找解决办法。莱希特再次提到了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作为调节和会计控制的单位。俄国革命表明，对生产工具的集中控制带有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起初表现为自由共产主义的东西现在显示出它是种建立在对经济的集中支配权基础上的生产机关（production apparatus，类比“国家机关”而如此翻译——译注）（塞巴斯蒂安·富尔）。

三. 一般的再生产过程

在资本主义下，再生产是个别资本家或个别资本家集团的职能；在共产主义下，它是一种社会职能。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小时）作为调节和会计控制的单位。现代资本主义的工业计算揭示了每个产品在社会平均生产时间基础上进行计算的可能性。生产公式（p+c）+L同时也是再生产的公式。莱希特把资本主义的价值概念应用于劳动能力。按照他的说法，它表现的是一种价格（以劳动小时表示），他认为这种价格反映了劳动能力的再生产成本。

四. 社会平均生产时间作为分配的基础

考茨基不能把社会平均生产时间作为自己的方法，因为他只能接受这样一种制度，即把每个最终产品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由一个集中的行政控制机构来实行控制。出于同样的原因，当面对个别工厂的平均水平问题时也束手无策。解决办法在于，每个生产集团形成一个单位根据公式（P+C）+L=社会平均生产时间发挥作用，根据这个公式，每个特定的工业单位对这个平均数的偏离程度由生产力因素决定。偏差的总和在任何特定时刻都等于零。

五. 社会平均生产时间作为分配的基础

尽管莱希特接受劳动时间的控制，但他设想了对抗的产品分配方式。分配的准则将由统计学上得出的最低生活标准决定。这决定了对非熟练劳动力生效的最低维生工资，而更高素质的劳动力则得到相应的更高报酬。这种对立的产品分配模式应该决定社会的组织结构。社会责任总是在上面，而不是在下面。在莱希特那里，产品的价格决不等同于其再生产时间。负责全部生产的中央行政部门奉行一种价格政策，通过这种政策，产品的实际再生产时间不再能够得到任何体现。因此，社会平均劳动小时不能再构成分配的基础。在沃尔高阐述的国家共产主义制度中，劳动时间和产品分配没有丝毫的联系。一切都取决于主观意图和法令。这种用心良苦的无产阶级产品分配政策，同时也揭示了这个制度的内在腐朽程度。它清楚地暴露了一个事实，即生产机关已经把自己抬高到了生产者之上。

六. 一般社会成本

总生产的一般成本（社会福利等）似乎使得对生产的集中控制机关成为必要。国家通过价格政策获得满足这些一般社会成本的手段；换句话说，它通过工业单位提供的盈余，或者通过间接税收获得这些成本。莱希特试图准确地定义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使这些成本与直接消耗的劳动力形成准确的关系。最后，他通过另一种价格政策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范畴的实施与任何一种价格政策都是不相容的。产品的分配决定了包含被使用掉劳动力的全部产品无法由生产工人自己消费，而只能是其中的某一部分。这一部分是由我们所说的报酬系数或个人消费系数（F.I.C.）决定的。这个系数随着分配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变小，从而不断地接近零。那些不采取任何经济措施就把产品交给个人消费，但同时又提供必须用于生产的产品的工业单位，被称为“混合型工业单位”（发电厂等）。

七. 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

决定性的因素是实施一种反映生产者与社会产品之间确切关系的方法。消费者合作社作为自由和平等的消费者联合体。产品的分配显示出它是一种公共职能。市场机制作为衡量社会消费需求的一种手段。合作社作为个人需求和愿望的集体表达。在不同消费群体中的分配。

八. 扩大规模的生产，或共产主义的积累

积累是一种社会功能。社会在其经济代表大会上决定了扩大整个生产机关的规模。为此，首要的要求是准确确定究竟有多少劳动力将被简单再生产所吸收。通过采用积累指标作为FIC内部的一个范畴而构成了社会积累基金。对它的实施进行管理的决定权仍然在生产者手中。通过把特殊形式的积累，如铁路、开垦荒地等，纳入一般社会用途（G.S.U.）账户的范围，避免了生产的中断。

九. 一般社会核算体系作为经济过程整合的模型方法

当生产和再生产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时，市场、货币和价格就被消除了。然而，对于有计划的生产来说，一个用于社会调节和控制的单位作为手段是必需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小时）似乎是维持对生产的会计控制制度的自然基础。通过这种方式，产品流根据生产特定使用价值所需的社会平均生产时间（小时）的数量而流动。一般社会核算制度登记了这一产品流，从而使它同时获得用于计算个人消费系数所需的所有必要数据。

十. 一般社会簿记制度作为经济过程的控制制度

国家共产主义中主观或武断的控制方法。必需区分技术控制和会计（簿记）控制。在一个产品流按照其社会平均生产时间流动的生产体系中，生产是由再生产控制的。这不是一种任意的或主观的控制方法，而是一种完全客观的方法。社会平均生产时间的确定。对这一点的控制来自于记录各种产品流的方法。

十一. 对一般社会用途机构（G.S.U.）或公共机构的控制制度

自动控制体系不像生产性企业那样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它只在一个方向上展开。适用于对各经济部门进行比较检查的其他控制手段。适用于发行和分配劳动券的控制制度。

十二. 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

人们曾试图将会计控制的因素纳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范畴。这显示它实际是不可能的。对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的计算，同时导致了对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的确定。与价值构成商品生产的节点中心一样，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构成共产主义经济的节点中心。

十三. 无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与一般会计控制制度

无产阶级以一种极不民主的方式制定新的生产规则：它行使经济专政。社会一般会计（簿记）制度显示出它是对小规模生产性单位的重要支持，这些机构相当独立地管理和控制生产。专制制度最终自我解体。

十四. 土地问题和农民

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封闭的地方经济中，农民主要不是作为商品生产者出现，因为他只把自己的剩余产品带到市场上。对金钱的需求越来越大，导致了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学家在其农业发展理论中所犯错误的原因。通过商品生产，农民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

十五. 农民和革命

农业无产阶级是比较弱的。农村的阶级矛盾也同样发展得很弱。农民和无产阶级的经济依赖程度同样很大。

十六. 俄罗斯和匈牙利的土地革命

“一切土地归农民” 的口号之所以能够释放出如此巨大的社会能量，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作为独立商品生产者的要求得到了实现。俄罗斯的农民经济现在才开始发展，而西欧的农民已经经历了这种发展。在匈牙利，农民革命未能得到发展。大规模的土地所有权被置于中央国家管理之下。对于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来说，俄国和匈牙利在共产党对农业经济的管理和控制方法方面都没有提供任何教训。

十七. 德国革命中的农业无产阶级和中小农户斗争的开始

中小农并不是德国革命中的重要因素。大庄园里的农业无产阶级没有表现出对土地分配的渴望。意识形态主要由经济（包括技术）发展水平决定。半无产阶级在德国革命中发挥了强大的刺激作用。

十八. 农民和工人委员会

农民被宣传和经济上的强制力说服，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以便在土地上实施委员会制度。对其产品所需的再生产时间进行计算。

十九. 后记

# 代序

下面的工作，是荷兰的国际共产主义小组（GIK, or GIC/the Group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s）集体研究的成果，它在其结构上表现出了内容的高度协调统一，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积极的集体努力成果。文本起草时采用了集体工作的方法，这在实践中证明了一个自觉奋进的团体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果，这只是具有如此巨大和久远价值的其品质之一。

通过这项工作，荷兰国际共产主义小组在战后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在使用价值经济的基础上，安排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实际可能性，以供人讨论。他们把先前工人阶级的理论代表从早期的尝试中所积累的，以求解决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所有领域中最终极的、最决定性问题的经验集中在一起，以便揭示让先前的一切努力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的根本原因，从而避免进一步混乱的产生。

另一方面，本书以科学共产主义的既定原则为出发点，并把这些原则与前人的在任何程度上都有积极意义的工作相结合，同时揭示了新的社会关系和经济上的相互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在总体上为共产主义经济学建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本书不仅关注工业领域经济改造和建设的必要性，而且揭示了与农业经济有关的必然联系。作者通过这种方式，清晰地展示了一个成长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其整个经济有机体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特点的规律模式。

简洁的语言和所采用的明确的分析方法，对每一个有阶级意识的工人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这就保证了每一个勤奋学习后续书页的革命者也能充分掌握其内容。写作的明确性和严谨的客观性，同样也为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广泛讨论空间提供了可能，这个空间可以把工人阶级队伍中有代表性的各种意见派别都吸引到它的领域中来。由于我们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也必须对这里所设想的各种可能性进行最彻底的讨论，因此，有于下面的论述，我们立场的最终表述，将留待以后再说。

不过，我们有一个愿望，想对这个文本提出来，以帮助它继续前进：当所有革命工人都有意识地读完它的书页，并把其中所积累的经验实际应用于争取无产阶级事业的胜利、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时，《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则》这部著作就会最终地、永远地证明它的成功！斗争是艰苦的，但最后的目标是值得的！

柏林，1930

工人总联合会（AAU）

德国革命工厂组织/ Revolutionary Factory Organisation of Germany

# 一. 国家共产主义还是自由平等生产者的联合体

## 1. 国家共产主义

俄国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所作的种种努力，已经把以前只能在理论上加以处理的领域，至少就工业生产而言，引入了人类的实践领域。俄国企图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来安排经济生活......而在这一点上却完全失败了！工资的增长不再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的失败。1由社会生产体系所实现的更大程度的生产率，并没有带来在社会产品中相应的更大份额。这表明，剥削是存在的。亨丽特·罗兰-霍尔斯特（Henriette Roland-Holst）证明了今天的俄罗斯工人是雇佣工人。人们可以试图轻描淡写地指出，俄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私有制仍然存在，正因为如此，雇佣劳动的基础必然会强加到社会生活的整个经济基础之上。凡是认为这种解释令人满意的人，可能确实是在客观上正确地认识了当今俄国的经济基础，但是对于俄国人实行共产主义经济的巨大尝试，这个人还是一无所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无产者对俄国人正在采用的、据说会导向建立共产主义的方法产生了怀疑。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方法，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工人阶级没收了占有者，把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交给国家，然后国家着手组织各工业部门，把它们作为国家垄断的行业交给社会支配。

在俄国，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能够控制工厂并在自己的管理下继续经营它们。共产党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支配者，发布了一些指令，根据这些指令，工厂要把它们的工人委员会（苏维埃）在乡、区、县三级联系起来，以便把整个工业生活统一成一个有机单位。生产机关（production apparatus）就是这样从劳动群众强大的活力中组建起来的。这是存在于无产阶级内部的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动力的一种表现。一切力量都朝着生产集中的方向发展。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

“人民经济的集中管理，是胜利的无产阶级所掌握的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生产力最迅速发展的最可靠手段……它同时是对人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把小企业纳入统一经济结构的前提条件。集中化是避免人民经济任何分裂趋向的唯一手段。”2

正如在这一发展开始时，情况的基本因素在于工业生产管理的控制权掌握在群众手中一样，同样不可抗拒的是，在以后的阶段，这些权力也不可避免地会转移到中央管理机关。如果说起初各局、公社委员会等是对工人群众、生产者负责的话，那么到了最后，它们就成了中央管理机关的附庸，由中央管理机关指挥全局。一开始：自下而上的负责；最后：职责来自上层。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俄国实现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土地都不曾尝试过的生产力的高度集中。被迫与这样的权力机器作斗争的无产阶级，真是悲哀！不管其余怎样，这就是俄罗斯所面临的现实！现在不能有丝毫的怀疑：俄国工人是雇佣劳动者，是被剥削的工人！这些工人必须为他们的工资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进行斗争！

我们在这里要提请大家注意的基本问题是，在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中，无产阶级对生产机关没有控制权。在纯粹的形式意义上，它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它对生产资料却没有处置权。生产者在社会总产品存量中究竟可以得到多少比例的劳动报酬，是由中央管理机关决定的，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中央管理机关就根据统计数字来决定。实际上，是否应该进行剥削的决定权在中央机关。即使是由一个仁慈的政府来指挥，然后以公平的方式分配产品，它仍然是一个把自己提高到生产者之上的机关。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状况是由于俄国的特殊情况而出现的，还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独有特点，对每一个与生产和分配有关的中央管理机关来说都是典型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建立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确实会很成问题。

## 2. 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仅除马克思外，我们发现，在几乎所有关心共产主义社会中经济生活组织问题的作家那里，他们所主张的原则与俄国人在实践中所运用的原则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以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为根据：“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3然后，他们开始着手进行集中化的任务，并开始构建类似于俄国人所号召建立的那些类型的组织。例如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和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这些名字还可以由一大堆其他的“专家”来扩展）这样写道：

“依据现有的自然和人工的生产条件决定制造新产品的方式、地点、数量和手段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方的和全国的委员会。他们借助有组织的生产统计和消费统计的一切手段，把握杜会的需要，从而以自觉的预见、按照他们自觉地代表和领导的共同体的需要，组织整个经济生活。”4

而纽拉特更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社会主义经济科学只承认一个单一的经济主宰：它不计较盈亏，不流通任何形式的货币，无论是贵金属还是反映经济计划的‘劳动货币’，在没有任何核算控制单位的帮助下组织生产，并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分配生活资料。”5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们都得出了与俄国人所建立的社会体制相同的结论。即使我们假定这种体制实际上是可行的（我们否认这是事实），并且中央管理机关和社会控制机关愿意或能够按照公认的不同的生活水平以公平的方式分配大多数的产品——即使这样，即使我们假设所涉及的无数经济活动顺利进行，生产者实际上没有权利控制生产机关的事实仍然存在。它不是生产者的机关，而是置于他们之上的机关。

这种状况只能导致对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而对行政当局采取反对立场的团体的强制镇压。**中央经济权力同时也是政治权力**。凡是在政治或经济事务上希望以不同于中央管理机构的方式安排事务的反对派，都将受到强大国家机器一切手段的镇压。当然没有必要给出具体的例子——它们已经够让人熟悉了。这样一来，马克思所倡导的**自由平等生产者的联合体**就变成了一个人类从未经历过的监狱国家！

俄国人，和其他理论学派一样，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宣称他们的理论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但实际上，这与马克思无关。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以共产主义术语呈现的资本主义管理和生产控制。布尔什维克倾向的历史观点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他们观察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程是如何受到程度越来越大的社会化控制的。商品的自由生产者处处受到工会、托拉斯等的限制；生产确实已经是“共产主义的！”：

“对资本主义思维方式的克服，作为一种初生的社会现象，就假定需要实现一种覆盖面极广泛的过程。社会主义很有可能首先将自己确立为一种经济秩序，因此，社会主义者将首先通过社会主义秩序产生，而不是反过来，社会主义秩序由社会主义者产生——此外，这一顺序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6

如果经济以这种方式变成了“共产主义”，那么只需要转变生产关系，使生产资料成为国家财产，然后：

“……社会有计划的根据社会和每个人的需要对生产进行调节，以取代社会生产的无序状态。”7

在这种由计划决定的控制基础上，他们再进一步构建他们的制度。为了使计划得以完成，只需要设置一个新的管理机构来负责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关——共产主义社会就在那，现成的！

根据这种共产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只需要安插一个新的管理机构负责管理生产，以便在统计数据的帮助下，在所有可能的最好的“共产主义”世界里，把一切安排得最好。这种观点在意识中的基本来源是这一事实：那些想出这些主意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不能把计划生产的增长看作是劳动群众自身发展的一个方面，而只能把计划生产的发展看作是他们——经济专家——被要求贯彻和完成的一个过程。不是工人群众，而是他们——领导者——注定要引导破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进入共产主义。掌握知识的是**他们**，思考、组织和命令的是他们。群众要履行的唯一作用，就是支持他们以自己的智慧所决定的东西。凌驾在劳动人民群众之上的是经济专家和领导人，带着他们的科学，受到大众的尊敬，被视为社会奇迹的殿堂守护者，而这个殿堂对群众来说仍然是封闭的。科学将成为伟人们的财产，新社会的光芒就是从他们身上发出来的。不用说，在这种形式的社会中，生产者对生产没有任何控制权或管理权，因此，此处描绘的图景实际上代表了马克思关于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概念的一个奇怪版本。

所有这类计划都明显地带有诞生它们的历史时期所给予的印记：在这，**就是机械科学发展的时代**。生产系统被设想为一个复杂精细的机械装置，它通过数千、数万个齿轮和传动杆发挥作用。生产过程的各个部分彼此拼接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就像分离但相互依赖的传送带的部分功能一样，像现代工厂——例如福特汽车公司。到处都站着生产装置的控制员，他们通过统计数据来控制机器的运行。

这些机械式的计划起源于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认为共产主义主要是一个组织-技术过程的编排问题。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如何确定生产者和产品之间的基本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就这种机械的观念而言，必须找到使生产者自己能够建造生产体系的基础。这种建造行为是一个从下往上而不是从上往下进行的过程。这是一个由生产者自己来完成的集中的过程，而不是像天堂的魔法从上面落在他们身上那样。如果我们想牢记革命的经验，遵循卡尔·马克思给我们的指导方针，那么，我们甚至现在就有可能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明显的进展。

## 3. 国有化和社会化

虽然没有人给我们留下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详细描述，但采纳卡尔·马克思的观点，即这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在本质上将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并将完全独立于社会民主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的理论而产生，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生产和分配的领导者和管理者不是国家，而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本身，这些职能将落到他们身上。

改良派在这些年里把这种理论完全上下颠倒了。争取社会改革的斗争和各工业部门稳步地转变为国营或市政经营企业，对他们来说，意味着稳步地走向共产主义。只要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任何一个特定生产部门达到这样一种集中程度，以至于它能作为中央管理下的一个直线职能结构（unitary structure）运作，那么这就表明将其国有化的时机已经成熟。改良派的社会民主主义设想通过持续和渐进的国有化过程实现共产主义，而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倾向认为，为了完成国有化过程，革命是必要的。**因此，从莫斯科来的人的观念是建立在与改良派的理论方法基本相同的基础上的**。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那些已经成熟到可以国有化的工业单位将通过国家来经营，而经济中尚未充分集中的部分将继续掌握在私人资本手中。

俄国革命就是按照这个计划进行的。1917年，俄国的生产者开始在整个经济体中征用有产阶级的财产，目的是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来安排生产和分配。征用的过程是从下层开始的，这使那些希望从上层领导和管理经济的人感到非常困惑。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俄罗斯经济管理部门将许多被工人们没收的工厂归还给了他们从前的老板，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工厂还不够“成熟”，来实行共产主义管理。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是作出了如下决定：

“在生产组织领域，必须实行最终的国有化措施。必须从对单个企业实行国有化措施（截至目前已有304家），发展到对整个工业实行统一的国有化。**国有化一定不能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必须只能由人民委员会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授权批准下实施。**”8

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实行国有化与实际的共产主义社会化概念之间的区别。

在这一点上，我们还看到了被认为已经具备成熟的共产主义条件的工业企业与条件尚未成熟的企业之间的区别，这显然是马克思从未想过的概念。弗兰茨·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在H. Beck编辑的《社会化的方法和目的》（’Methods and Aims of Socialisation’）专题讨论会中非常正确地指出：

“把对个体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或市政化（municipalization）当成社会化的一种形式，人们认为这种流行的描述正在逐步推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化’概念，这是一种错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原本难以理解和神秘的‘成熟的企业......’才会得到强调。然而，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走向成熟。按照他的说法，单个的工业单位或这些单位机构的分支，很少能够变得‘成熟’和‘为社会化做好准备’，就像胚胎的独立器官在孕期的第四个月变得成熟，并被分娩出来独立营生一样。”9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国有化只会导致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state更倾向于国家政府，注意与national socialism区分——译注）的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成为一个庞大的雇主和剥削者。”10

但是，目的不应是限制群众的活力，他们自己也在进行社会化的过程，而是要把群众作为活细胞纳入共产主义经济的整个有机体中——而这一发展，反过来说，只有当合适的一般经济条件存在时才有可能形成。使用价值的创造者就能使自己将他们的工厂纳入社会生产的整体范围中，从而决定生产者与社会产品之间关系的基础。

据我们所知，唯一试图在这类问题上讲真话的作家是改良主义者亨利·柯饶（H. Cunow）。他说：

“归根结底，与科布登学派（Cobden School）相反，马克思的意图是对经济过程实行固定的控制。**但是，不是通过国家，而是通过社会主义社会中联合起来的自由团体**。（…*the unification of the free associations of the socialist society.*）”11

柯饶在“对国家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否定”（”The Negation of the State and State Socialism”）的部分中，向我们展示了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如何逐渐摆脱这种立场。最初，运动反对那些希望将诸如铁路和矿山等大型企业纳入国家管理的倾向。一个例子就足够说明了。在上述著作的第340页，我们能知道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在一篇文章中如何阐述这一观点的：

“逐步将一个个工业企业国有化的意图，换句话说，是用国家代替私营雇主，仅仅是换另一位剥削者来继续资本主义工业……它（国家）以雇主的身份出现在私人雇主的位置上，工人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然而国家确实加强了权力和压迫手段。资产阶级社会越来越意识到，它无法永远抵御社会主义思想的浪潮，我们也就越接近国家社会主义能被真正宣称的那一刻，而民主所要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将在“向社会民主主义前进，向国家社会主义前进！”的口号下进行。12

柯饶随后证明，这种立场在1900年之前就已经被抛弃，1917年卡尔·伦纳（Karl Renner）宣称：“国家将成为社会主义的杠杆。”（见：《马克思主义、战争与国际》，Marxism, War and the International）。 柯饶完全同意这一点，但值得称赞的是，他清楚地表明，这一切与马克思无关。柯饶抱怨马克思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分如此鲜明，而在他看来，这种区分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不再是一个有效的概念。

布尔什维克按照“成熟”的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像在俄国实行的那种做法，实际上是掴了马克思主义一巴掌。事实上，他们把自己的效忠转移到了属于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上。在俄罗斯，这种做法已经在以最压迫的方式让人感受到它的结果。社会不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控制权。这些都掌握在统治集团手中，他们“以社会的名义”（恩格斯的说法）任命和管理一切。这就是说，他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手段镇压每一个试图反对新剥削形式的团体或个人。俄国本应是共产主义的典范，却通过这种手段发展成为社民主义未来的理想。

我们已经用较多的篇幅论述了这种类型的国有化，以便说明这与马克思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的名誉实际上也因此受到了损害。特别是在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马克思才开始接受这一观点：**对经济的组织安排不能通过国家来实现而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联合体来实现**。随着对无产阶级为革命阶级斗争、为夺取经济和政治权力而组织起来的确切形式——工人委员会——的发现，必须被历史唯物地（historically）建立起来的生产者自由联合的社会，其历史基础就显露出来了，并得到了充分的揭示，供所有人认识和理解。

## 4. 社会平均劳动时间

因此，马克思对“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的概念采取了自己的立场。然而，这种联合体与目前流传的“互助”的模糊概念毫无关系，而有其非常物质性的基础。**那个基础就是计算生产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正如本文将证明的那样，这与价值毫无关系。这与恩格斯的观点也是一致的，这可以从下面的内容看出：

“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100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100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劳动小时。因此，到那时，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不断波动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产品中包含的、现在已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的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来表现这个量，而是会用它们的自然的、最恰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13

马克思还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作为计算单位的劳动小时（工时）。在他著名的“孤岛上的鲁滨逊”的讨论中，他关于这个岛上的居民说过：

“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种或那种职能所占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难的大小。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在这里是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连麦·维尔特先生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也能了解。但是，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14

“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4、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15

我们在这里看到，马克思在他的“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团体”（”Association of Freely Associating Producers”）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设想了劳动时间的计算方法，而且确实是在与工时的同一的基础上设想的。然而，马克思已经让他的自由联合生产者代替了鲁宾逊，我们现在明白，我们同样可以很容易地把共产主义放置的社会簿记系统置于社会的支配之下，从而得出对马克思文本的以下解读：

“它的存货账本包含了它所拥有的有用物品的目录、生产这些物品所需的各种操作，最后还包含了生产具体数目的这些产品平均花费的劳动时间。社会成员和组成其自身创造的财富的物品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如此简单和透明，任何人都可以理解。”

马克思假定这种社会簿记制度普遍适用于劳动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过程；这就是说，不论共产主义是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还是已经实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它都一样适用。换句话说：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生活的组织可能会经历不同的阶段，**但所有这些阶段的稳定基础仍然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单位**。（*but the stable basis for all of them nevertheless remains the unit of average social labour-time.*）

马克思确实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例如，这一点从他不厌其烦地特别强调说明——分配可以采取各种形式——这一事实中就可以看出。纽拉特由此推断，马克思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暗示着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产品**如何**被分配。对这样一个“马克思专家”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错误。纽拉特肯定知道，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对自由一无所知，而他只知道在功能上被派生出的内在必然性（functionally derived organic necessity）。就分配制度而言，它的选择自由被生产制度所规定的结构限制在了一定范围之内。然而，这一点需要作某些修改，稍后我们将讨论这些修改。

“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16

如果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就能够很好地提供一个基本范畴，来决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适用于生产领域的经济调节和核算控制的方法，那么，在分配领域，他则纯粹通过举例来证明这一点。因此，他进一步写道：

“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17

马克思在书中的其他地方还指出，他认为劳动时间是共产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

“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18

如果是以个人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个人对产品消费的标准，那么大部分的产品也必须按照同一尺度来衡量。换句话说，这些产品一定打上了印记：它们包含了多少人类劳动力，以时间衡量就是，包含了多少社会平均劳动小时。但是，这要假定其他各类生产的范畴（生产资料、原料和辅助材料等等）都是按照同一尺度来衡量的，因此，对各个单独的工业单位的生产进行会计核算控制的整个制度必须以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为基础。那么，人们就可以很公正地宣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在劳动方面还是在劳动产品方面，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在这都是简单明了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纽拉特认为生产和分配之间的联系很少，以至于我们可以有“自由选择”，这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如果马克思把个别劳动时间作为决定个人在产品中的份额的尺度，那么通过这种方式，他同时奠定了生产者与产品之间关系的基础，生产的基础也根据这种关系而确定。

现在让我们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一种计划的使用价值生产体系，如在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经济机关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是否必然会导致一个把自己当成一种外来力量凌驾于生产者之上的体系？我们说：**不！在一个生产者与社会产品的关系直接表现出来的社会里，不存在这种危险。在每一个其他的社会形态中，如果这个原则不适用，那么生产体系最终必然要发展成一种压迫机器。**

## 5. 走向自由平等生产者的联合体

按其生产体制的形式，人类创造了一个旨在满足成千上万人需求的有机组织。在生产过程中，我们既消耗了自己的劳动力，也消耗了生产过程本身。从这个角度看，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破坏的过程，一个消耗资源的过程；然而，通过这个破坏的过程，我们不断创造新的使用价值。被消耗的东西在同一过程中又获得重生。机器、工具、我们自己的劳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得到恢复，被重新生产，或被**再生产**。它是一股永不停息的改造过的人类的能量流，从一种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的能量。每一种具体的形式都是人力的结晶，我们可以根据创造它所消耗的劳动时间来测量它。

同样的标准也适用于生产过程中不创造实物产品的部分，例如教育、医疗服务等。这里也消耗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形式是指导、照顾病人等。分配直接在生产发生中并通过生产本身进行，消耗的能量以其新的形式直接流向社会。由于我们能够及时地测量这些能量，生产者和产品之间就建立了完全确切的关系。每个个别的生产者与每个具体的社会产品的关系就变得完整而清晰。

在按照纽拉特或希法亭关于组织生产的计划的情况下，或像在俄国实施的那种情况下，这种关系反而是**完全隐蔽**的。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神秘的过程，而生产者自己当然比国家管理者对它的了解更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由上级机关把一定比例的社会产品分配给生产者，生产者必须充满信任地等待他们将得到的东西。这就是俄罗斯的情况。虽然生产力可能提高，虽然社会产品的数量可能增加，但生产者得到的份额却没有增加，也即，存在剥削。

生产者对此应做什么？什么也不做？是的，他们必须再一次扛起斗争的事业，反对剥削者，反对那些把生产制度控制在自己手中的人！人们可以试图让“更好的领导人”掌权，不过这当然不会消除剥削的原因。归根结底，除了重建整个生产体系，来使生产者与他们劳动所形成的产品之间的确切（exact）关系成为社会生产制度的基础之外，没有别的出路。然而，在这样的体制中，领导者和管理者分配产品的任务也被消除了。**没什么要分配的。**社会产品中的份额是直接确定的。劳动时间是用来确定总产品中个人消费产品比例的尺度。

无产阶级在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能否建立起生产者和产品间的这种关系，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权力的问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计划生产才有可能。各个独立的工业单位，乃至整个工业，就可以在横向和纵向上合并成一个单独的计划的整体，而所有部门都可以在以各种形式消耗的劳动时间的总核算中，自行计算它们所占的份额，这些不同的消耗形式主要是：机器的磨损、原辅材料的消耗和劳动支出。这种共产主义生产的基本编排和组织，能够而且实际上**必须**由生产者自己来实现，确实也能够**由他们自己独立**建立。于是，自由平等生产者联合体就成了一种绝对必要的东西。互相耦合和互相依存的制度自下层生长起来，正是因为生产者自己，以他们自己的权利，控制了运营和管理。现在已经创造了必要的机会，生产者本身的主动性得以表达，他们因此能够创造出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千姿百态的发展中的动人的形式。19

**正是无产阶级本身奠定了那巩固生产者与其劳动产品之间基本关系的基石。有且仅有这一点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问题。**正如封建农奴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为了争取自己的那块土地和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充分支配权而斗争一样，无产阶级现在也为了争取对工厂及其他工业单位的控制权和对生产的充分支配权而斗争——只有在新的社会法制条件中把生产者和产品的基本关系斗争到最后，才有可能得到这一结果。这里的决定性问题，正是无产阶级要为自己在社会中赢得什么样的地位；问题是，在获得工作场所劳动权的同时，无产阶级是否也获得了对这些工作场所产品的处置权；或者与此相反，无产阶级是否再次被宣称没有能力履行责任，而要把这种处置权委托给领导人、专家和科学家。归根结底，这场斗争的对象是那些认为在革命后自己注定要代表无产阶级来承担责任的人。正因为如此，只有首先奠定了共产主义生产的基础，与这些人合作才是合适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的技能才可能为社会服务，否则他们只会成为新的统治阶级。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压制一切反对统治的东西，直到所有生产部门都足够“成熟”，可以由各自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纳入权力和行政的总体结构中。在“自由平等生产者的联合体”的情况下，工人统治的目的是，依据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作为一切生产一般基础的原则，引进和实行新的生产、核算和管理制度，并为自由生产者自己控制生产和管理生产创造基础。而另一方面，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一般情形是最强大的镇压机器在中央机构的控制下被建立起来。至于自由联合的生产者的体制，它的作用是催生和促进那些力量，通过这些力量，它本身作为统治的职能逐渐失去权力，最终使自己成为多余的；**工人统治的作用是使统治本身在尽可能早的历史时刻消亡。**

我们不需要进一步关注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更应该着手研究，为什么在目前的历史关头，任何“理性的”人仍然会拥抱并坚持马克思的“天真的”观念，（人们认为这观念是他从其所处时代的自由-无政府主义倾向中衍生出来的）20即认为对经济生活的调控“不是通过国家，而是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联合体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经济生活的基本范畴应该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最重要的是，必须采取步骤，确保证明马克思的这种“天真”概念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可能基础。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同时也就表明，这个概念最初并不是在写字台后面诞生的，而是一种沸腾的、不断发展的革命生活活动的产物。

历数我们能够回顾的往事，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决定性的时刻，它们标志着我们对“共产主义经济学家”所唱的媚俗赞美诗的幻灭。第一个是苏维埃制度的自发发展和运作；第二个是俄国国家机器解除了苏维埃的武装；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幻想破灭的时刻，是被国家管理的生产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迄今未知的对整个社会的统治形式。这些事实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更仔细的考察，这种考察表明，国家资本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没有共同之处。社会生活本身已经通过其明确的表现形式——社会实践——以工人委员会、苏维埃制度的形式，把马克思的自由平等生产者联合体的概念推到了历史前沿，而在相同的时刻，同样的社会生活，连同它对理论和实践的客观批评，却把社会的实际权力交给了国家资本主义。

[1] Henriette Roland-Holst: Klassenstrijd (Class Struggle), 1927, p. 270.

[2] A. Goldschmidt: Die Wirtshaftsorganisation Sowjet-Russlands (The Economic Organisation of Soviet Russia), p. 43.

[3] 这当然是著名的《反杜林论》的引文，但是，应该指出，在本书第七章所引用的另一部伟大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观点作了相反的表述，即他一生的朋友和同事卡尔·马克思所采用的观点，即把共产主义的社会基础定义为“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

[4]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第一章

[5] O. Neurath: Wirtschaftsplan und Naturalrechnung (Economic Plan and Accounting in Kind), p. 84.

[6] O. Neurath: ibid., p. 83.

[7] 恩格斯，《反杜林论》

[8] A. Goldschmidt: Die Wirtshaftsorganisation Sowjet-Russlands (The Economic Organisation of Soviet Russia), p. 42.

[9] F. Oppenheimer, quoted by H. Beck: Sammelbuch über 'Wege und Ziel der Sozialisierung' (Symposium on 'Methods and Aims of Socialisation'), pp. 16-17.

[10] A. Pannekoek on "Socialisation" in Die nieuwe Tijd (New Times), 1919, p. 534.

[11] H. Cunow: Die marx'sche Geschichts, Gesellschafts und Staatstheorie, Band 1 (The Marxist Theory of History, Society and the State, Vol 1), p. 30.

[12] W. Liebknecht: Staatssozialismus und revolutionare Sozialdemokratie (State Socialism and Revolutionary Social Democracy) quoted by H. Cunow in Die marx'sche Geschichts, Gesellschafts und Staatstheorie, Band 1 (The Marxist Theory of History, Society and the State, Vol 1), p. 340.

[13] 恩格斯，《反杜林论》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

[15] K. Marx: ibid., p. 171.

[16] K. Marx: Capital, Vol I, Penguin Books, p. 172.

[17] K. Marx: ibid., p. 172.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第十八章

[19]本段结尾处：“……因此能够创造出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千姿百态的发展中的动人的形式。” 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多么清楚地突出了这种制度的简单实用性！的确可以说，至少就生产控制的技术基础而言，计算机时代代表着共产主义时代的到来。

[20] H. Cunow: Die marx'sche Geschichts, Gesellschafts und Staatstheorie, Band 1 (The Marxist Theory of History, Society and the State, Vol 1), p. 309.

# 二. 迄今为止在界定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

## 1. 马克思的门徒

对本来如此丰富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文献进行调查，就会发现，关于这种形式的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著作极少，而这种社会的目的是取代资本主义。在马克思那里，我们找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分析，它的结论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把选择权摆在它面前，要么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后在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继续生产，要么——陷入野蛮状态。这一伟大的科学成就使社会主义脱离了乌托邦的范畴，使它站在了科学思想的坚实基础上。然而，关于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只给我们指明了几个路标，告诉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奠定这些基础。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他的《旁注》，即所谓《哥达纲领批判》。这种不希望以更大的篇幅来论述这个问题，只给我们几个指针的愿望，然而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什么错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把这些问题展开来加以全面考察，几乎肯定是不成熟的。这样的开端几乎肯定会以乌托邦而告终，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本人才警告说不要这样做。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禁忌知识之树的果实，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尽管俄国革命已经证明，正是在这个历史关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1

除了确定新的生产制度的一般基础外，马克思还指出了在新社会中可以应用的社会调节和核算控制方法，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为按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核算。建立共产主义一般基础的前提条件是，货币和市场必须完全消失，而马克思的门徒们，他们完只全关心共产主义生产的基础，却没有再进一步。在共产主义中，他们根本上只看到了我们在资本主义下所知道的经济资源集中的延续，这将自发地产生共产主义。这种观点在希法亭的例子中体现的最清晰。他考察了资本完全集中在一个所有者手中的后果。他描绘了一幅想象中的巨型托拉斯的图景，并以下列文字描述：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将由一个主管机关自觉地进行调节，这个机关决定它的所有领域内的生产量。于是，价格决定成为纯粹名义上的，仅仅意味着总产品在卡特尔巨头为一方和大量的所有其它社会成员为另一方之间进行分配。那时，价格将不再是人们之间发生的物的关系的结果，而成为物在人们之间进行分配的单纯的计算方式。于是，货币失去了作用，因为要完成的是实物的分配，而不是价值的分配，所以货币会完全消失。随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消失，物的外观的消失，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消失，从而货币也消失。由卡特尔分配产品，物质生产要素被再生产出来并用于新的生产。在新产品中，一部分分配给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其它部分留归卡特尔随意使用。这是一个以对抗形式进行自觉调节的社会。但是，这种对抗是分配的对抗。分配本身被自觉地调节，从而使货币的必然性消失。这样，在它的完成的形式上，金融资本脱离开它赖以产生的土壤。货币流通变得不必要了，货币的不息流动达到了它的目的地，即被调节的社会。流通的永动机找到了它的最终归宿。”2

根据这一理论，向共产主义发展是一个没有问题的问题。这是一个自动的、无矛盾的过程，资本主义本身就完成了这个过程。资本主义竞争导致资本的集中，通过这种方式，在产业中发展出大型的集团。这样的一个集合体——例如，一个把运输、采矿、轧钢厂等结合在一起的托拉斯——形成了一个没有货币的分配领域。上级管理部门只是决定把新的生产资料（扩大的再生产）送到哪个工厂，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等等。根据这种理论，共产主义生产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无非是进一步实行这种集中，然后很自发地导致共产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将被取代，原因很简单，它成为工业企业进一步合并的障碍。消灭了私有制，集中的过程就能充分发展，然后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把整个经济生活结合成一个巨大的托拉斯，然后由上面管理。这样，马克思为共产主义社会所设定的前提条件就得到了满足。市场将会消失，因为一个单一的企业不会向自己出售或购买。附在产品上的价格也随之消失，而上级行政部门根据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将产品从一个工业单位流向另一个工业单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必需衡量每件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这显然是一个幼稚的错误。

因此，与共产主义经济有关的科学所采取的发展进程，并不是以一条直线的形式出现，而是在马克思之后，采取了一个不同的方向，直到1920年左右才回到它以前的经典位置。正是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意中帮助共产主义科学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向前迈出了慷慨的一步，这无疑是一个苦涩的讽刺。当看起来资本主义的崩溃是可以预见的，而共产主义即将席卷世界时，马克斯·韦伯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开始发展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批评。当然，他们只能将这种批评与希法亭式“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还有本质上是一样的——俄式“共产主义”，而作为希法亭的忠实信徒，纽拉特却要被迫承受这种后果。他们的批评最后表明，一个没有任何调节手段或核算控制手段的经济，一个没有用来衡量产品价值一般标准的经济，是不可能的。而事实上，他们的抨击找到了正确的目标。结果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造成了相当大的沮丧和混乱。在经济科学领域，共产主义的不可能已经被证明了，其理由很简单：在这样一种经济中，每一种形式的计划生产都会停止。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为基础试图证明自己存在权利的共产主义，表明自己甚至比资本主义更不适于有计划的运作方式！M. Block接着又补充说，在没证明有什么控制手段来代替“市场机制”之前，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就连考茨基也失去了冷静，所以提出了一些最荒唐的建议，比如长期固定价格等等。不过，考茨基的这些疯狂转变有其积极之处，因为通过它们，人们认识到了建立社会调节和核算控制的制度之必要性，尽管考茨基当时实际设想的这种制度是在现今货币的基础上产生的。他认为，“作为记账用的价值尺度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记录交换关系账目的方法”以及“一种流通手段”，货币将是不可或缺的。（考茨基：1922，《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Die proletarische Revolution und ihr Programm*，本书未被翻译成中文）

韦伯和米塞斯对共产主义的破坏性批评，在现实中起到了帮助共产主义经济研究的作用，克服了它的惯性，并将其置于真正的基础之上。正是他们唤醒了那些从那一刻起就不允许自己再休息的思想力量，因为正是从那一刻起，进一步深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一概念之间的关系才成为可能。

作为国家共产主义的对立面，各种工团主义（syndicalist）思潮在1910年左右开始出现，它们试图通过“工团”（”sydicates”）、“产业工会”或“行会”来继续资本主义生产。这些组织会将其利润分配给工人，或者让利润积累到一个中央社会基金中。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从来没有经过任何理论上的阐述，除非我们可以把奥托·莱希特（Otto Leichter）1923年在维也纳出版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调控》（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in a Socialist Society）这样的著作考虑在内。这一研究总体上是以建立在劳动时间计算基础上的社会调节和核算控制方法为基础的，无疑这是迄今为止在该领域所得的最好的努力成果。在这，由生产者-消费者自己掌握的自主经济管理理论向前迈了一大步。书中相当诚实地提出了问题，尽管我们认为，莱希特没有对这些问题形成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他还称，在他之前，莫里斯·布尔甘（Maurice Bourguin）曾试图把共产主义经济建立在根据劳动时间消耗的核算控制的基础上。据莱希特称，后者的思想方法与他自己的几乎完全一致。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承认共产主义经济中的核算控制必须通过劳动时间来实现，尽管这些经济学家都没有在他们的核算方法中采用生产资料的范畴。例如，尤金·沃尔高（Eugen Varga，非匈牙利语译为叶·瓦尔加）在《共产主义》创刊第2年中第9-10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不用说，由于上文所述的错误，结果毫无价值。

然而，不仅在经济科学领域中对问题的定义上可以看到进步，而且在政治因素领域也能看到进步。经济专家只从生产和分配的角度考虑共产主义。然而，革命的无产阶级在现实中还有其他动机。国家共产主义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对他们来说是相当的无关紧要。他们同样拒绝接受它，是由于这个原因，即实践已经证明，生产机关可以在收归社会所有的同时，仍继续作为剥削机器发挥作用。例如，俄国革命确实从此政治角度揭示了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打听一下，现在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内部，有哪些关于新的共产主义经济的积极的思想和观念正在流传，我们就会发现，自主管理和运营的思想已经发展得相当好了，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点，还缺乏更详细的说明。尽管如此，现在每个人都认为，绝对必需在这些问题上取得明确性（clarity）。

## 2. 自由共产主义

米勒-雷宁（Paul Arthur Müller-Lehning）在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小册子中，表达了对明确性的强烈要求。他反对这样的观点，即眼前的任务是造成普遍的破坏，而与此同时，探索如何重新组织社会的任务可以安全地留待无限的将来去处理（出处同上；第4页）。为了确定“在革命发生后如何实现无政府工团主义”（同上；第5页），必须要有一个方案。仅仅宣传经济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如何把革命进行到底”（同上；第6页）。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把群众的自主性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但是问题是，群众的主动性究竟是如何表现出来的，群众今天和明天究竟要做什么——所有这些都还是模糊的，只是稍有些积极的意义（同上；第7页）。“许多宣言出现了，但是对于日常实践的问题，只有极少数的宣言能够给出明确而简单的回答”（同上；第8页）。以下是引自米勒-雷宁的小册子：

“不得不说，俄国革命很彻底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个没有工资制度的社会，其切实的和经济的基础是什么？革命后的日子该怎么办？无政府主义将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牢记过去几年的教训，如果完全失败的结论不至于是无可救药的破产。旧的无政府主义的解决办法，不管它们可能包含多少真理，不管它们可能被反复唱了多少遍，它们没有解决现实生活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特别是，它们没有解决社会革命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任何一个问题。”（米勒-雷宁，《无政府工团主义》，第10页）

“没有这些实际现实，所有的宣传都是消极的，所有的理想全是乌托邦。是无政府主义必须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而且——这一点不能太经常地重复——已经通过俄国革命的痛苦经验不断得到了证明。”（第11页）

“经济组织以剥夺资本和解除国家武装为目的。必须取代资本主义和国家机关的正是工人的生产联合会，它必须作为撑起整个经济生活的支柱发挥作用。**基础必须是工厂，工厂组织必须形成新的经济社会组织的胚胎细胞。**整个生产体系必须建立在联邦式工农业组织的基础上。”（第18页）

“任何想看到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终结的人，必须用其他的现实和其他的经济组织来取代这些社会生活的现实。这只有生产者自己才能做到。他们只能集体地，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来做到这一点。在工厂里的集体，在工业中的集体，等等。他们必须组织起来，通过他们联邦式的工业组织来管理生产资料，从而在工业和联邦的基础上组织整个经济生活。”（第19页）

1927年出版的这本小册子，相比迄今为止其他试图澄清这个问题的所有小册子相比，取得了根本性的进步。它的意义并不在于引人注目的繁多概念，而在于它确实试图吸收俄国革命的某些经验，并将其转化为未来阶级斗争的武器。对经济生活的联邦制设想源自俄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然而作者没完没了的证明，这实际上只是提出问题的第一次尝试，还没一个人能提供解决方案。

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塞巴斯蒂安·富尔（Sebastien Faure）试图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他在1921年出版的《普遍幸福》（Universal Happiness）一书中，描绘了他对自由共产主义的构想。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无政府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并不一定排除对社会生产集中处理和控制的体制。因为仔细研究他的“自由共产主义”体制，就会发现它实际上不过是庸俗的国家共产主义。事实上，该书没有科学考察的性质，而更多的是以乌托邦小说的形式表现，“自由共产主义社会”是在纯粹的幻想中成长起来的。然而，与“人人平等”、“自由合意”和“反对国家及国家权力的崇高精神原则”这样的词句相反，书中描写了一种生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对生产的控制权并不在生产者自己，这清楚地表明，至少在这个特定的阵营中，完全不用担心这位特定的作者会有任何证据来证明他自己对适用于共产主义制度的运动规律有任何理解！

富尔反对作为“自在之物”的权力，为此，他谈到了成千上百的线索和纽带，这些线索和纽带违背人们的意志强行把所有在现代生产机关中合作的人捆绑在一起。他写道：“这整个组织（即他的体系——编者注）是建立在自由合作这一鼓舞人心的精神原则之上的”（第213页）。然而我们认为，这不能成为任何生产和再生产制度的基础。如果生产者希望使自己的权利得到保障，无论是否有“鼓舞人心的精神原则”的帮助，整个组织都必须在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生产者必须自己在工作场所决定生产者与社会产品的关系。他们必须计算每一种产品用掉了多少劳动时间，因为他们的劳动时间是他们在社会产品中的份额的尺度。只有这样，整个组织才能建立在经济现实的基础上，而不是依托某种飘浮在抽象原则之上的“精神”理想。

我们再次发现，要建立在生产者本身之间的互助关系，同样是通过没有清楚、稳定根据的“自由合意”（”free agreement”）来表达的。在这也没有明确清晰的基础，没有对产品从工厂到工厂之间的流转进行时间上的调控和核算上的控制制度。然而，没有这个物质基础，这些“自由合意”也仍然只是空话。“一个人试验这个方法，测试那个方法，把它们结合起来，再检验这各种方法的结果。由此产生的一致意见形成了，发出它的号召，并靠其结果的力量来推动，最后取得胜利”（第334页）。对富尔来说，这种以每个人的自由为基础，并通过所有人的一致而实现的基础，是再自然不过的。“自然界不也是如此吗？自然界的例子就在那里，清晰而鲜明。那里的一切都通过自由而自发的相互调解（accommodation）而结合在一起……无数微小组成部分，就像微尘一样，相互寻找，相互吸引，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原子”（第334页）。

在这方面我们要指出，从自然界得出的类比总是极其危险的，特别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富尔的方法“清楚而明白地”表明了它是多么地不充分。在他的世界里，一切都是通过“自由而自发的相互调解”而结合起来。然而，实际上如此奇妙的是，人类的自由概念被不加思索地转移到了自然领域。在“纯粹象征”的领域里，人们当然可以逃避任何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富尔完全忽略了这些“自由而自发的相互调解”在自然界中实际产生的决定性时刻；当然，这个时刻是由参与成员之间的相互力量关系决定的。如果太阳和地球彼此缔结了如果太阳和地球达成一个“自由而自发的协议”，即地球应在365天内围绕太阳公转，**这是特别地由太阳和地球的质量分别决定的**。这是他们达成“自由的相互调解” 的真正物质基础。

自然界中的物质总是这样有编排的。它的原子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物质在运动中，都是建立在相互对立的力的平衡之上。这种关系的精确形式，是由两个对立而又统一的伙伴之间作用力的具体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也乐于采用自然界的这个例子，但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通过这些手段来说明，如果要在人类社会的条件下成功地缔结这种“自由自发的相互调解”，那么生产者与产品之间的确切关系就必须存在。正是通过这些手段，这种协议才从一句空话变成了现实。虽然很明显，富尔实际上从未关注过经济问题，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他是纽拉特学派的代表，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自然的”经济学家3，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个学派认为调节和核算控制的单位是绝对多余的，并建议通过借助统计数据的生产计划达到相同的结果：

“首先，还需要确定每种单独需求的总需求和数量……然后，各公社应根据居民人数，把这些需要报告负责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央管理办公室，那里的官员由此得到一份‘国家’总需求的调查报告。然后，每个公社都会编制第二份清单，说明他们能够生产多少东西，根据这份清单，‘中央管理机关’现在能够评估‘国家’的生产力。这个过程的结果是非常清楚的。上级官员现在应该决定把多少比例的生产分配给每个公社，多少部分的生产可以留给自己”（富尔，《普遍幸福》，第215-216页）。

这个过程和国家共产主义者设想的完全一样：下层——群众；上层——官员，这些官员把生产和分配的经营和管理权保留在自己手中。这样的社会不是建立在经济实际状况的基础上，而是取决于个人意志的好坏，或者取决于他们的管理能力——这一点富尔倒很乐意承认。为了使人们不怀疑中央控制权的必要性，他补充说：“中央管理机关知道总生产和总需求的限度，因此必须通知每个地方委员会，它有多少产品可供支配，它必须生产多少生产资料”（第218页）。为了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一切与任何一种具体的**自由共产主义**毫无关系，我们把它同希法亭描述的**社民主义式共产主义**4进行比较。我们会看到两者几乎字字相符：

“依据现有的自然和人工的生产条件决定制造新产品的方式、地点、数量和手段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方的和全国的委员会。**他们借助有组织的生产统计和消费统计的一切手段**，把握杜会的需要，从而以自觉的预见、按照他们自觉地代表和领导的共同体的需要，组织整个经济生活。”（斜体作者强调——编者注）5

由此可见，在这种形式的“自由共产主义”中，很明显，对生产机关的处置权是交给那些熟知统计艺术技巧的人的。人们本以为，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对政治经济学有足够的了解，知道谁掌握了生产机关的控制权，谁也就掌握了社会权力。上述“中央管理机关”不得不为自己提供使其意志生效的手段，也就是说，它必须把自己设置为一个国家。这的确是富尔体系的运动规律之一，不管这是不是其本意；这道菜是配上“自由合意”的调味料，还是配上“精神原则”的肉汤，也无关紧要。这种掩盖饭菜真味的调味品，丝毫不会扰乱实际的政治和经济现实！

问题的实质并不是说，人们会反对富尔的制度，认为它力图把整个经济体设计成一个单独的单位；这种结合的行为确实是发展过程的最终目的，这发展是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实现的。然而在做到这一点之后，就必须提供基础，**保证他们自己——生产者和消费者——把握对经济的控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对每一种形式的经济活动耗费的劳动时间进行准确核算，以便他们能够确切知道在每一种产品中耗费了多少劳动时间。这样，就完全没有必要把怎么分配社会产品的决定权交给任何“中央管理机关”；相反，每个工厂或其他单位里的生产者自己就可以计算耗费的劳动时间来确定这一点。

富尔的《普遍幸福》对我们关于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知识没有丝毫贡献。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研究这一工作，那仅仅是因为，通过对这种关于“自由共产主义社会”的幻想进行尖锐批评，就可以清楚地表明，最近十年来这个领域取得了多大的进步。1917年以前，人们要想揭示隐藏在这堆误导性词语中的国家共产主义内核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感谢俄国革命中实践学派的表现，因为正是这个学派以明确无误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允许一个中央政权确立自己的社会权力，然后将生产机关的一切权力集中在它的手中的后果的后果。

[1] 段落结尾处：“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了禁忌知识之树的果实，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尽管俄国革命已经证明，正是在这个历史关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在这里又发现了一个例子，说明在一战中及其后的革命浪潮爆发时，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中间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无产阶级革命将主要在欧洲范围内，在同一历史时期内较快地结束，简言之，一战及其后的欧洲革命浪潮将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的曙光，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

除了一个相当明显的事实，即这个信念的一个重要因素反映了当时参与革命的团体中普遍存在的主要基于情感的兴奋感之外，马克思主义者还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弹性及其吸收激烈的矛盾动荡和社会对抗的能力是巨大的，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因此，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成功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成熟之前，必须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不发达的边缘地区，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

[2]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第十五章结尾

[3] “自然经济学家”指的是这样一种人，他认为一个没有阶级的、非对抗性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经济基础建立在“实物”交换即直接以物易物的关系基础上的社会。

[4] 在这里，“国家共产主义”比“社民主义式共产主义”更适合

[5]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第一章

# 三. 一般再生产过程

## 1.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再生产是个别资本集团的职能

人类为自己创造了社会生产的机器，作为满足其千百倍需求的一种器官。生产工具——也就是说，集体生产资料——作为一种用来从自然中获取其生存和更高发展所必需的东西工具来为人类社会服务。在制造过程中，生产过程，我们的劳动力和客观的机器本身，都被消耗。这样来看，生产过程也是一个破坏的过程，是一个资源的使用过程。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被用完的东西在同一个过程中又诞生了：机器、工具和我们的劳动力被消耗，同时又被更新，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生产过程就像人体内的生命过程一样。从自我毁灭到自我更新，以一种持续的、更加复杂的形式：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1

对共产主义来说，这段话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生产和再生产是有意识地从这一原则中产生的，而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这一过程通过市场机制自发地完成。再生产的依赖这样的事实：每消费一种产品，一般都必须有一个新的产品取而代之。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必须对进入生产过程的一切进行精确的核算。无论这看起来多么困难，实际上却很简单，因为一切被用完和毁坏的东西都可以分为两类：**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在资本主义下，再生产是一种个人职能。每一个资本家，即资本的单位，都要满足自己的再生产需要。资本家要考虑损耗和用完的固定生产资料（机器、建筑物）、流动生产资料（原料和辅助材料）的消耗和直接消耗的劳动力。在这些基础上，再加上辅助性支出，如营销成本、保险等，最后资本家带着作为成品的商品进入市场。如果经营成功，那么一个生产周期就成功结束了。资本家现在购买了新的生产资料和新的劳动力，生产又可以重新开始了。由于所有的资本家都以同样的方式行动，结果是整个生产体系连同消耗过的劳动力都得到了再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体系之生产力的提高，迫使资本家通过竞争，把他们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投入到额外的资本、新的生产资料和扩大的生产设备中去。其结果是生产储备的增长，包括生产设备的“死”部分和“活”部分。因此，不仅是那些在前一个生产时期被用完和毁坏的生产资料被再生产，而且——用资本主义的有关术语来说——还发生了积累。至于在多大的规模上和在谁的工厂里进行积累，则是个别资本家或资本主义集团的决定，他们的动机是与争取利润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在共产主义下，积累被称为**扩大规模的再生产**。在这里，市场和将商品（产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被消除了，但产品流动仍然存在：

“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义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2

“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3

因此，工业单位将其产品交由社会支配。然而，就后者而言，必须按最初投入生产的数量为工厂提供新的生产资料、原料和劳动力。实际上，如果要实现扩大生产规模，就必须向工厂提供更多的生产资料等要素。然而，这方面的决定权不再掌握在拥有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集团手中，而是由整个社会决定扩大生产的程度，扩大到满足社会和个人需要的程度。如果说必须向每个工厂提供新的生产资料，其数量与生产中已经用完的生产资料的数量相同，那么，为了进行再生产，每一个工厂都必须计算它已经以各种形式（也以劳动券的形式）消耗了多少社会产品，这是必要和充分的。然后我们以同样的数量替换这些产品，一个新的劳动周期就开始了。

如果要问，我们可能在多大程度上确定每个工业单位所耗费的工时，那么，现代成本会计学就能提供决定性的答案。由于种种原因，在1921年左右，资本主义的工业积累方法被迫进行了彻底的合理化改革。正是这样，在1922年前后出现了一整套新的文献，内容是发展了为每一个单独的生产过程和每一个单独的辅助劳动功能计算确切成本价格的新方法。这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例如：生产资料的数量、消耗的原材料和辅助材料、劳动力，以及每个单独的部分生产过程或特殊的部分劳动职能（如运输、社保等等）的管理费用。但是，它们都与一个共同的要素有关：货币。而工业管理人员认为，正是这一点阻碍了精准的核算。但是，没有什么能阻碍把它们转换成另一个核算单位。而且，在社会化生产的条件下，目前形式的公式往往是不稳定的，因为出现在成本预算中的各种因素——例如资本利息——将不再有意义。然而，这种方法本身仍然是一种持久的进步。在这方面，新社会也是在旧社会的子宫里诞生的！奥托·莱希特（Otto Leichter）在现代成本会计核算方面写道：

“资本主义核算控制方法，如果能持续地、毫无阻拦地引入工厂，就能提供准确的数据，显示任何半成品、任何仍在制造过程中的产品的价值，或者精确地指出每一项单独劳动操作的成本。他们可以确定在一个工厂的许多不同的车间中，在许多不同的机器或许多不同的劳动力单位中，哪一个特定的劳动操作可以更经济地进行；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被用来提高生产过程所达到的最高程度的精简（rationalization）。除此之外，资本主义核算方法的另一个成果是：每一个大工厂实际上还有一些成本和费用，对可交换的产品没有任何实际贡献。”(这里指的是官员的工资，工作场所的取暖成本等——作者。)“资本主义核算方法的伟大成就之一是，它使这些详细成本得以包含在工程总预算中。”4

## 2. 公式 (P+C)+L= T. PRD(总产品)

出于这个原因，完全有可能在每一种产品上标明生产它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当然，有些设施不生产有形产品，例如社会和经济委员会、保健服务、教育等等；但是这些设施也同样能够确定它们消耗了多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因此，在这里也可以确切地揭示再生产的成本。如果我们想给再生产下一个简明的定义，那么我们就会说：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生产中的直接起作用的因素。在与自然的联系中，它们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大量的机器、建筑、食品、原料等使用价值形式的产品。一方面，这批大量的产品以不间断的方式从一个工厂流动到另一个工厂；另一方面，它被消费者的个人需求所消耗。**

每个工厂通过对生产资料(=p)和劳动(=L)的精确核算确保其再生产，这两个量以劳动小时为单位。因此，每个工厂的生产公式表示如下：

p + L = 产品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范畴包括机器和建筑物（固定的生产资料），也包括原材料和辅助材料（流通的生产资料）。如果现在我们用字母p来表示固定生产资料，用c来表示流动生产资料，那么，公式的形式如下：

( p + c ) + L = 产品

如果为了清楚起见，我们现在用虚构的数字来代替字母，那么，比如说，一家制鞋厂的生产将会揭示下面的简略公式：

( p + c ) + L = 产品

也就是

（机械+原材料）+劳动=40000双鞋，以劳动小时(L-Hrs)计算，即

(1250 L-Hrs + 61250 L-Hrs) + 62500 L-Hrs = 125000 L-Hrs

因此，求平均值：

125000劳动小时除以40000双鞋等于每双鞋3.125劳动小时。

在这个生产公式里，工厂同时也发现了它的再生产公式，这个公式表明，为了更新已经用完的一切，必须要恢复多少个代表社会产品的劳动小时。

这个原则适用于每一个单独的工业单位，对整个共产主义经济也同样适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后者只是经济体中在任何给定时刻活动着的所有经济设施的总和。对于社会总产品来说，同样也是有效的。它不过是所有经济单位总和的产品(p + c) + L。为了与单独的工业单位的生产核算控制范围相区分，我们对总产品使用如下公式：

(P + C ) + L =总产品

如果我们假定所有工业设施（industrial installations）中所有用完的机械（p）的总和＝1亿个劳动小时，原材料（c）＝6亿个劳动小时；如果还消耗了活劳动力的6亿个劳动小时（L），那么社会总生产的简略公式就会如下：

( P + C ) + L =总产品

( 100 m+ 600 m ) + 600 m = 1300 m劳动小时（m为百万——译注）

因此，所有工业设施加在一起，要从社会总库存量中拿出7亿劳动小时的产品来对生产设备的物理部分进行再生产，而工人则消耗6亿劳动小时的最终社会产品。这样，所有生产要素的再生产就得到了保证。

现在让我们特别考虑一下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在我们的例子中，有6亿个劳动小时可供个人消费。不能也绝不可能消费比这更多的劳动，因为在工业单位何在工人中分配没有关系。例如，非技术劳动、技术劳动和智力劳动都有可能得到不同的报酬。例如，分配工作可以这样进行：非技术（unskilled）工人每工作一小时按比例获得四分之三小时的报酬，技术工人正好是一小时，官员和领班则是三小时。

## 3. 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所持的价值观念

实际上，经济学家阁下们确实认为应该这样安排分配！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给劳动以同等的价值，也就是说，分配给每个人相同份额的社会产品。当然，这就是纽拉特“不同的生活水平”的意义所在。社会统计学家确定了必要的最低标准，然后使“非技术的”工人的收入与之相符，而其他人根据他们的努力程度、能力和劳动的重要性获得更丰厚的报酬。纯粹是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

考茨基认为这种报酬上的差别是必要的，因为他认为，对于不愉快的或繁重的劳动形式，同比较愉快的和比较轻松的工作相比，应该支付较高的工资。他顺便说，对他来说，这提供了证据，证明劳动时间核算是行不通的。在这一点上，他确实同意莱希特的意见，甚至建议即使在每个职业内部也应保留报酬上的差别，因为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考虑到技术工人所需要的额外培训等等，支付给个人的实际工资将不可避免地高于基本工资率（wage rate）。与他有同样想法的人，例如，有观点认为在共产主义经济中应保留工资标准。对此，莱希特十分正确地指出，这并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劳动小时核算的引入，这也可以从我们的例子中看出这一事实。他说：

“存在着纯粹的技术上的困难，这在资本主义下也存在，即为每一个单独的劳动职能支付的工资必须单独确定，但这与资本主义下使用的方法相比没有什么特别的复杂之处。”5

我们看到，莱希特认为，不同的劳动评价尺度、不同的工资率的应用，以及同一类型的劳动中确实存在的差异，在原则上都是正确的。然而，这只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并没有停止**，社会产品的分配仍然带有对抗性，争取产品分配的斗争仍然在继续。这种斗争实际上只不过是**争取权力的斗争**，而且必须作为对权力的斗争来进行。

没有比上述更明确的证据可以表明，这些“社会主义者”除了对千百万工人实行统治和支配的形式外，根本无法设想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对他们来说，人类只变成了臣民。他们不过是生产机关的一部分，社会统计学家必须计算需要向这种人力材料提供多少食物和其他必需品（最低生活水平），以保证劳动力能够自我更新。工人阶级必须全力反对这样的观点，并要求**大家**在社会财富中享有同样的份额。

然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初阶段，起初可能需要对各种知识分子职业给予较高的报酬；例如，40个小时的劳动可以得到80或120个小时的产品。我们已经看到，这对劳动时间核算方法来说并不构成困难。在共产主义社会形式的初期，这确实是一种公正的措施，例如，高等教育的手段并不是人人都能免费获得，因为社会还没有在新的基础上充分彻底地组织起来。但是，一旦这些事情得到了安排，那么就不可能再有让知识阶层从业者在社会产品中占有更大份额的问题了。

“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之所以无法摆脱对劳动力的不同评价的观念，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所处的阶级状况。总产品的平等分配完全与他们的阶级意识相矛盾，因此是“不可能的”。然而，人们从感觉的或感性的世界中获得有意识的思想概念，即使这不是一种古老的，那么至少是一种正确的原则，对于这些人和其他人一样，智力一般不与感觉的世界所支配的东西相矛盾。例如，正是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莱希特可能希望消除价值概念，因为它适用于非个人的再生产，但在涉及劳动力报酬的地方却无法摆脱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是作为商品出现的。雇主支付的平均工资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相对应，就非技术劳动而言，这些成本或多或少处于生存所需的最低水平。一般来说，非技术工人的孩子是无法学习一种专业技能的，因为他们必须尽早开始挣尽可能多的钱。6这就造成了一种情况，即非技术劳动只能作为更多的非技术劳动力进行再生产。而对于技术劳动力的再生产来说，更多的成本是必要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孩子们接受了职业训练，这就意味着技术工人本身已经再生产了技术劳动力。莱希特认为，劳动力的这种商品关系在“社会主义”下也适用。他写道：

“因此，劳动显示出各种劳动的资格，各种劳动的强度。各种质地不同的劳动力的再生产需要不同程度的投资。合格的劳动者为了使自己的劳动力一天天地或一年年地再生产，需要更多的投资，也就是说，他们的经常性支出是较大的。一般来说，如果以前负责这种发展中劳动力的人不再有工作能力，那么就需要加大投资，以培训和促进合格的劳动力，直至其完成，达到具有相同教育和知识替代水平的人的标准。在评价各种劳动力的价值时，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7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一点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力价格的分析进行比较，那么，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就完全清楚了，他们无法从价值概念中解放出来。

“那么，劳动力的生产成本是什么？

它是维持工人作为工人和把他培养成工人所需要的成本。”

因此，任何工作所需要的训练时期越少，工人的生产成本就越小，工人的劳动价格即工资就越低。在那些几乎不需要任何学徒期的工业部门中，在工人仅仅身体存在就够了的情况下，工人生产所必需的成本几乎只限于使工人活着和能够工作所必需的商品。因此，工人劳动的价格将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

……. 同样，在计算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费用时，也必须包括再生产的费用，这样工人的种族才能繁殖，才能用新的工人代替损坏的工人。这样，工人的折旧就和机器的折旧一样被考虑进去了。

“总之，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作最低工资额。”8

正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机关的非个人部分的再生产是个别资本集团的职能，同样在该制度下，劳动力的再生产也是工人的个别职能。然而，在共产主义下，与生产机关的非人部分的再生产成为社会职能一样，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同样成为社会职能。它不再成为单独的个人的责任，而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例如，教育程度不再依靠父亲的钱包，而完全取决于孩子的才能、心理和生理特征。在共产主义下，没有人会认为，那些天生就具有更有利的遗传特征或更有利的内在能力，并因此能够最大限度地吸收人类社会在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的所有成就的人，应该在社会产品中额外获得更大份额。社会为他们提供了在艺术和科学知识方面取得超越常人的成就的可能性，但只是为了使他们能够以更有才能、更密切的合作形式完成所有的文化任务，把那些原来以文化产品的形式从社会中拿出来的价值还给社会。共产主义下的社会产品的分配，并不是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是社会通过一切技术资源和其他资源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配。考茨基、莱希特和纽拉特版本的“社会主义者”用他们的“按不同生活标准计酬”的原则想真正达到的目的，实则是为低收入工人在营养和其他家务和家庭评估的基础上确保其生存必需的最低生活标准，而收入较高的人则消费剩余。他们的思想实际上与消灭剥削的思想相去甚远。的确，他们希望继续剥削，只是这次是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

对我们来说，劳动力的再生产只能意味着社会产品的平等分配。在计算生产时间时，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是按其实际数量记入的，而每个工人则从社会产品中拿走他所耗费的实际劳动时间。

在那种反映和基于“最低生活水平”统计数据的“社会主义”中，生产者把自己的劳动能力交给一个巨大的、未被定义的权威，这个权威被委婉地称为“社会”。然而，凡是这个未定义的权威实际以有形的形式出现的地方，它都是以一种凌驾于生产者之上、与生产者对立的异己力量出现的，是一种把自己提升到生产者之上、剥削生产者、统治生产者的力量。它实际上是通过生产组织进行的统治，这种机器现在是一种国家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生产者作为无个性的因素发挥作用。

[1] 《资本论》，第一卷

[2] 《哥达纲领批判》，“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第一章

[3] 同上

[4] O. Leichter, *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n der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pp. 22-23.

[5] O. Leichter: ibid, p. 76.

[6] “一般来说，非技术工人的孩子是无法学习一种专业技能的，因为他们必须尽早开始挣尽可能多的钱。”

虽然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的特殊形式的运作方式基本上仍然是正确的，但近几十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通过实行义务中等教育和大学助学金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改变（在“工业化”国家）。然而，尽管进行了这些改革，上层和中间阶级的子女仍然在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中占主导地位。

[7] O. Leichter: ibid, p. 61.

[8] 《雇佣劳动与资本》

# 四. 社会平均生产时间作为生产的基础

## 1. 考茨基的规定

莱希特的文章起了特别有用的作用，因为它有助于进行研究，证明在共产主义下，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可以彻底且始终一致的作为一个进行社会调控和核算控制的单位，即使在实际花费的劳动时间不被当作分配的基础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至少在所采用的社会调控和核算控制单位的问题上，他表明自己远远领先于他的同事，即“马克思主义”经济专家纽拉特和考茨基。在布洛克的《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1一书中，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在共产主义下废除货币的企图说成是幼稚的，并得出结论说，对根据劳动时间进行社会调控和核算控制的理论做更彻底的研究是多余的（第215页）。另一方面，考茨基认为劳动时间核算控制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在实践中不可能实施，因为货币不能被免除，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作为维持对交换关系的核算控制的一种价值尺度”，同时又必须“继续作为一种流通手段发挥作用”2。考茨基直到现在还把资本主义的价值概念说成是“一个历史范畴”（也就是说，一个必须随着资本主义消失的范畴）3。但由于韦伯的资产阶级观点的批评和俄国革命的实践，他已经陷入了如此混乱的状态，以至于他现在转向了这样一种观点：价值概念必须永远被奉为圭臬！

有关共产主义的批评对考茨基产生的影响，特别是认为必须引入一个调控和核算控制的单位，把他从自己理论的藏身之处引诱了出来；现在他不可能继续坚持旧的普遍公式，即“价值”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他现在被迫去寻找他所看到的真理。在实际情况中，一个用来进行调控和核算控制的计量单位确实是必要的。如果马克思坚持认为，在共产主义经济中，“首先消除的是货币资本”，那么就必需对核算控制单位的概念进行更仔细的考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和马克思在《资本论》和《批注》（《哥达纲领批判》）中都表明，它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我们现在知道考茨基的研究导致了什么结果，现在它将证明，解开考茨基的理论的来源是值得的，他的理论认为，调控与核算控制体系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已经指出，当时广泛流行的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观念是，资本主义将凭借其固有的集中倾向而自掘坟墓。希法亭假设将整个经济组织在一个单一的巨型托拉斯，即一个总卡特尔之中，在此基础上，他研究了经济单位完全集中的后果。在这个假想的卡特尔内，没有市场，没有货币，没有价格。没有货币的经济将得到实现。

在这个托拉斯内，生产将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在从天然材料到成品的转变过程中，产品经过了最多样的工业设施。例如，煤和铁矿石进入冶炼炉，（并作为其产品），钢和铁进入工程车间，然后为纺织厂提供机器，最后纺织商品作为最终产品出现。在它们从一个经济设施到另一个经济设施的过程中，来自所有可能的工业部门的数千名和数万名工人在塑造产品方面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以便最终创造出最终产品。**这个最终产品究竟包含多少劳动？**就这样，考茨基著名的难题被提出来了，面对这样一个超人的任务，他悲哀地把头埋在了自己的手里。是的，从理论上讲，这个问题一定有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在实践中呢？不，不可能“为每一种商品计算代表其成本的劳动总量，从最初的开始到最后的加工完成。”4“根据商品所包含的劳动（原文如此）来评价商品，即使有最庞大和技术上最完美的统计设备”，也是不可能的（同上，第321页）。5

是的，考茨基完全有理由说，用这种方法计算商品生产过程中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是完全不可能的！

## 2. 莱希特的规定

然而，这样的生产方式只存在于考茨基的幻想中，或存在于“自然经济学家”的幻想中，他们希望看到经济由一个中央机构管理。此外，他们还设想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即每个独立的工厂，即整体的各个部分，都没有责任对其工厂的生产过程进行精确的核算控制！然而，托拉斯的各个部分的生产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是独立的，原因很简单，否则计划生产就不可能实现。事实上，即使是为了确保合理的运作，这也不仅仅是必须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可能最精确的实现基于一种社会调控和核算控制单位的核算方法，对于在一个单一的托拉斯内部进行无货币的交换绝对是一种必要：

“独立的生产设施之间存在着关系，只要劳动分工存在，这种关系就会一直存在，而且随着技术发展的进步，这种更高层次上的劳动分工将继续进一步发展。”6

“所有非个人的生产前提，所有半成品材料，所有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由其他生产单位交付给那些注定要进一步加工它们的人，将确实记入他们的账本，即，将被分解为要素清单（factorised）。”7

“卡特尔巨头或——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整个经济的管理者，将不允许让负责同一生产计划的各个工业单位按照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成本进行生产。在资本主义下，这在很多情况下也形成了一种激励，使较弱的企业允许自己任由一些巨大的集团‘吞并’，不管它们愿意不愿意，希望现在对他们的工厂来说，公认的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最好的制造方法，最勤奋的官员——将被吸引到提高工厂生产力的任务中。然而，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在单独的标题下显示所有其他工厂和生产设施的结果，并且还要管理事务——这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中都没关系——就好像每个工厂都有自己独立的业主，希望掌握有关他的工厂生产的经济结果的确切数据。由于这个原因，卡特尔内部保持着极其严格的核算控制，任何认为在卡特尔内部商品可以被贪污而不需要进一步考虑的想法——简而言之，在独立的工业设施中，对‘我的’和‘你的’之间的区别保持核算的解释是不可取的——这实际上属于对资本主义的流行误解，也是对社会主义的误解。”8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不可能计算蕴含在某一产品中的劳动量的说法，就有了不同的含义。为了确定考茨基从他的中央经济指挥部中无法确定的东西，即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从一个局部工作到另一个局部工作的漫长过程中，吸收了多少已实现的劳动时间——**这项任务，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生产者自己完全能够完成**。其秘密在于，每一个由其“工厂组织”管理和运营的工厂，都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运作，就像在资本主义中一样：

“乍一看，人们会认为每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或多或少都是独立的，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清楚地看到把单个工厂与经济体的其他部分及其管理（administration）所联系在一起的脐带。”9

在局部工序的链条中，每个工厂都有自己的最终产品，然后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被引入其他工厂。此外，每家工厂完全有能力通过应用生产公式（p+c）+L，计算出其产品生产所耗费的平均劳动时间。在上面提到的鞋厂的例子中，3.125劳动时间被发现是一双鞋的“单位成本”。对单个工厂进行这种单位计算的结果是一工厂内平均值，它表示一双鞋、一吨煤或一立方米天然气等所包含的劳动小时数量。

## 3. 一些比较性的评价

因此，生产要素被认为是完全准确的（除了在共产主义早期可能出现的错误估计）。一个工厂的最终产品，假设它不是消费品，就会转移到下一个工厂，在那里作为生产资料（p或c）。当然，这家工厂单位也同样通过应用相同的调控和核算控制单位来控制其生产。通过这种方式，每个工厂都获得了对其最终产品进行核算控制的完全准确的方法。这一程序不仅适用于生产大量产品的工业设施，而且也适用于复杂生产机有体的最多种多样的产品，这一事实很快就被普遍接受，特别是因为“成本会计科学”的这一特殊分支已经非常发达。最后一个成品所占用的劳动时间，实际上不过是生产链中最后一个工厂所贡献的平均劳动时间，通过应用标准公式（p + c）+ L，它同时占用并在其计算中包括了从生产链的起点到最终产品的每个参与单位的所有单独劳动时间的总和。这个最终总数的计算是由所有部分过程建立起来的，完全掌握在生产者手中。

考茨基确实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必需计算产品的平均社会劳动时间，但他没有设想到在实践中完全实现这一概念的可能性。难怪他无法对与这一类别有关的各种问题作出丝毫意义上的解释！例如，当他试图考虑各个工厂之间生产率的差异问题时，当然还有确定每个产品的“价格”问题时，他已经搁浅了。虽然我们进一步关注这些反对意见似乎是多余的——因为我们已经发现了考茨基的主要错误——但我们可能会发现，进一步遵循他的观点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反面的例子，对平均社会劳动时间这一范畴做出更具体的规定。

让我们从产品的“价格”概念开始。首先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考茨基毫无保留地谈论产品的“价格”，好像这些在共产主义下仍然有效。他当然有权对自己的术语保持信心，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价格”继续在考茨基式的“共产主义”中发挥作用。同样地，对这位“马克思主义者”，价值的范畴被赋予了永恒的生命，正如在他的“共产主义”下，货币也继续发挥作用一样，价格也被保证有永恒的生命。但是，在什么样的共产主义中，同样的经济范畴仍然具有资本主义下的有效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至少拒绝与这种“共产主义”经济扯上任何关系。们已经表明，按照他们的说法，价值和价格是如何被消除并纳入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一范畴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生产者才会计算“每一件有用的物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弗·恩格斯：《反杜林论》）。考茨基宣布，这种计算是不可能的。为了使这一判断具有实质意义，他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并非所有工厂都具有同等的生产力，实际花费的劳动时间在一种情况下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因此导致价格的混乱。他在这一点上说：

“那么实际应该考虑多少数量的劳动呢？当然不是每个产品的实际消耗的。如果这样做的话，来自不同企业的各种同类商品就会产生不同的价格，那些在不利条件下生产的产品会比其他厂生产的产品价格更高。这当然是荒谬的。它们都必须有相同的价格，但这不是根据实际花费的劳动，而是根据社会平均劳动来计算的。（原文如此——英文译者注）实际中有可能为每一种单独的产品确定这个价格吗？”10

考茨基在这里公正地要求产品的“价格”必须与社会必要劳动相一致，而不是与特定工厂中实际花费在该产品上的劳动相一致11，因为，（并非所有工厂的生产力都相同），实际花费的劳动时间在有的情况下会高于或低于该工业集团的社会平均水平。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生产者自己，通过自己工厂的组织，计算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而不是考茨基。他的经济指挥部所无法实现的目标，工厂组织本身，即工人委员会，却完全能够实现，以这种方式同时赋予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一范畴以具体形式。

## 4. 公式(P + C) + L的运行模式

各个生产单位确定了其产品所必需的平均劳动时间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已经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平均的概念。为了实现这一点，在同一生产部门经营的所有生产单位必须相互合作。例如，在我们的例子中，所有鞋厂必须从所有不同的个别工厂的平均数中确定总平均数。如果一家工厂生产每双鞋的平均时间是3小时，另一家是3.25小时，还有一家是3.5小时，那么平均劳动时间应该是3.25小时。（当然，这只是一个近似值；准确的公式见本书第9章）。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计算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需要已经导致了生产单位的横向协作。然而，这并不是由国家控制的官僚机构来执行的，而是由工厂本身自下而上发展出来的。这个系统的原因和出发点对每个工人来说都是完全清楚和可以理解的，同时，公开记账的必要性使一切都在公共控制之下。

个别的生产单位得出不同的平均数，这是他们不同生产率的表现，其原因在于，构成每个独立工厂之生产系统的客观的生产资料与活劳动在一种情况下的运作效率更高，另一种情况下更低。同时，我们的“制鞋业卡特尔”以3.25小时的平均劳动时间计算了所有鞋厂，这就成为鞋子进入个人消费的密码。一家没有生产力的工厂，也就是说，一个低于平均生产力水平的工厂，因而，尽管它尽了最大努力，也不能在少于3.5小时的时间内生产一双鞋，它必然要亏本经营。它无法在下一个生产周期以社会上适当的平均速度再生产它的（p+c）+L。与此相反，还会有其他生产过剩的工厂，它们的生产率超过了平均水平。再以我们的例子来说，这些工厂可以在3小时内生产一双鞋。当他们的产品进入一般的社会消费时，他们能够再生产他们的（p+c）+L，并表现出额外的正增加量。由于社会平均水平是由所有个别生产单位的平均水平算出来的，所以“卡特尔”内部的亏损和盈余必须相互抵消。

如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生产集团内部的调节制度，而且确实是由生产单位自己实行的制度。这不是一种依赖“互助”的调节模式，相反，它是一种精确的计算方法。一个特定生产单位的生产力可以被精准确定，通过这种行为，损失和盈余的界限被准确地固定下来。因此，生产力成为一个精确的要素，可以用一个密码来表达，即生产力因素。这个因素准确地界定了一个特定的生产单位的“加”或“减”的值将是多少。

虽然不可能提供一个一般公式，在某一特定的“卡特尔”内进行计算时必须以此为基础，因为这必然会随着组成它的生产单位的类型和规模而变化，但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一个确切的数量。生产力不仅由产品的数量决定，而且还由生产的产品数量与(p + c) + L在生产中被消耗的程度之间的关系决定。在一个特定的生产单位生产力不足的情况下，这意味着相对于其生产的产品数量，它的(p + c) + L已经被估计为一个过高的数字。反过来说，( p + c )+ L的内在的或实际的数值太低，而这个值低于平均水平的程度是由偏离社会平均水平的程度衡量的。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的鞋厂计算出一双鞋的工厂平均值为3.5小时，而社会平均值为3.25小时。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实现的生产率与要求的水平成反比，这意味着这个特定工厂的生产率水平是3.25与3.5的比值，相当于13:14。因此，工厂的计算必须应用(13/14)\* [(p+c)+L]的公式，使其与社会平均水平相一致，只要该厂的生产力保持在这个水平，就必须在计算其生产时间时始终应用这个公式。因此，“卡特尔”每次要恢复[补译：给它]的增量是(p + c) + L的1/14。

当然，应该理解，所有这些只是举例说明。由于整个生产核算控制站在劳动时间计算的坚实基础上，许多道路可以通向同一终点。具有根本意义的是，行政和管理始终掌握在生产者自己手中，而每个工业单位对其再生产手段保持完全控制。

因此，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和个别工厂或车间的平均劳动时间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存在的，但通过“生产卡特尔”或“行业协会”，或人们希望对某一特定工业部门的组合工业单位使用的任何术语，两者之间得到了平衡和消除。这种区别的消除也破坏了考茨基反对劳动时间规定和核算控制方法的另一个论点。紧接着他的上述观点陈述，他继续说：

“事实上，是否有可能为每个单独的产品确定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者）?”（K·考茨基：同上，第319页）

“工人的报酬必须以实际花费的劳动时间为基础。另一方面，产品的价格需要反映其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12。从一次计算到下一次计算，社会消耗的劳动工时的总和需要相同。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K·考茨基，同上，第319页）

考茨基问道，有可能确定每种产品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吗？我们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的！——因为每个工业单位和每个生产部门都完全能够应用生产公式（p+c）+L。考茨基对此无能为力，因为他对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个词缺乏任何具体的或实际的概念，其根本原因是他纯粹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待所有问题。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是根据所有成员工业单位的综合生产力计算出来的。由此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每个单位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生产力的社会标准。换句话说，它的生产力因素被确定了。即使个别工业单位在其个别工厂的核算中可能偏离社会平均水平，但这些偏离是完全已知的，其总和等于零。在整个生产集团中，作为一个整体，生产是按照公式（P+C）+L进行的，这相当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

然而，考茨基认为，即使是技术的发展也会阻碍以劳动时间为基础的调节和核算控制。在宣称不可能“从最初的开始到最后的加工完成，计算每件产品花费的劳动力”之后，他进一步说道：“如果有人完成了这项任务，他将不得不从头开始，因为与此同时，许多部门的技术水平已经发生变化。”

这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吗？考茨基高高在上的从他的指挥所俯视，即所有不同的生产线汇集的地方，准确地观察到所有不同的局部过程之后，终于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计算，它确实准确地揭示了最终社会产品中包含了多少劳动时间。终于完成了，谢天谢地！然后，这个叫做技术的魔鬼出现了，把他所有无休止的计算都搞得一团糟！有些人对生产的观念多么荒谬！现实世界的生产是这样：工业单位的最终产品中，已经包含了劳动时间的衡量尺度。当技术的进步，或者由于任何其他原因其生产力的提高，这个部分过程所需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会下降。如果所讨论的产品恰好是供个人消费的最终产品，那么它就会以一个降低的平均值进入消费领域，事情也就结束了。但是，如果它继续进入其他工业单位的领域，并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它们的生产预算，那么，对有关工厂来说，( p + c )的消耗率就会下降，也就是说，这个工厂的成本就会降低，因此，体现在其产品中的平均社会劳动时间也会下降。其结果是，产品中体现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也下降了。由此引起的生产集团（“卡特尔”）内部的变化，将通过修改生产率系数（Productivity Factor）得到补偿。

考茨基对劳动时间计算方法的反对意见都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无法想象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概念可以被赋予一种具体的形式。然而，只有当生产的管理和行政工作掌握在生产者自己手中并通过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实施时，它才会得到这种具体形式。

**正是在革命阶级斗争本身的实践中，创造了作为其工具的工人委员会制度，同时诞生了作为具体形式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概念。**

[1] *The Marxist Theory of Money*.

[2] K. Kautsky: *Die proletarische Revolution und ihr Programm*, page 318.

[3] K. Kautsky: *Karl Marx' Oekonomische Lehren*, page 21.（《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4] K. Kautsky: *Die proletarische Revolution und ihr Programm*, page 318.

[5] K. Kautsky: *Die proletarische Revolution und ihr Programm*, page 321.

关于现代计算机技术，这里的意见与之前的意见相同。

[6] O Leichter: *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n der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page 54.

[7] O Leichter: *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n der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page 68.

[8] O Leichter: *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n der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page 52 - 53.

[9] O Leichter: *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n der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page 100.

[10] K. Kautsky: *Die proletarische Revolution und ihr Programm*, page 319.

[11] “……而不是与劳动……”（"... and not with the labour... ".）

当然，考茨基在这里的意思不是指劳动，而是指劳动力。斯密和李嘉图的影子还活着！——但也可参见第12章的注释1。

[12] Quotation from K. Kautsky: *Die proletarische Revolution und ihr Programm*, page 319：“另一方面，产品的价格需要反映社会必要的劳动……”（"The prices of the products, on the other hand, would need to reflect the socially necessary labour... ".）

考茨基在这里陷入了“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这两个概念的混淆。请参考第12章的注释1。

# 五. 社会平均生产时间作为分配的基础

## 1. 莱希特认为的产品分配

尽管莱希特的成就是第一次以严肃的方式处理了以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为基础的社会调节和核算控制的问题，但他未能对各种问题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对社会产品分配问题的处理方式仍完全处于资本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范围内。不言而喻，对抗性的产品分配方式的基本前提是有一个支配生产者的统治体系，而这反过来又为莱希特的中央行政和管理机构的概念提供了基础。因此，可以把莱希特在这一领域的尝试描述为基于这样的概念：共产主义的基础确实建立在一个由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控制的生产系统上，但这也是一个由上面来管理的系统。如果我们已经证明了莱希特的信念，即剥削是无法避免的，那么现在我们将以同样的方式来证明这一点的必然结果，即生产者必然会失去对生产制度的一切支配权。**而这一切的产生仅仅是因为他不能接受社会平均劳动小时作为调节分配和生产的单位尺度**。

在一个以劳动专业化为特征的社会中，生产者必须获得许可，才能消费由社会生产但最终面向个人消费的商品。在这方面，这些授权许可履行了与资本主义下的货币相同的功能。然而，从其本质上说，这只是一种毫无价值的材料；它可能是纸，铝或其他任何东西1；以这些许可证的形式工人所得到的与其实际付出的劳动小时相当。在通常情况下，这些许可证被称为“劳动货币”，尽管它不构成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货币。我们暂时不涉及复杂的理论观察，我们可以说，这种“劳动货币”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在这里我还想指出一点，例如欧文的‘劳动货币’，同戏票一样，不是 ‘货币’。欧文以直接社会化劳动为前提，就是说，以一种与商品生产截然相反的生产形式为前提。劳动券只是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2

莱希特在他的意见中也提出将这种“劳动货币”作为分配的基础。他写道：

“实际上，布尔甘（Maurice Bourguin）提出的社会计划，以及这里提出的计划，都是以相对于每个人所付出劳动的实物分配之概念为基础的。劳动货币只是一种特殊的形式，用来决定由于特定的经济原因而选择的国民产品中的份额。”3

尽管莱希特的这些观察似乎没有什么错误，但在草丛中还是潜伏着一条毒蛇，这一点在他写道“分配与每个人的劳动有关”时就很明显了。生产确实是在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但根据他的说法，分配却是在完全不同的原则基础上进行的。在现实中，生产者应根据与任何劳动时间核算制度完全无关的准则，将产品分配给他们以换取他们的劳动能力。相反地，应该由社会统计学家和生理学家来确定人类个人维持生命所需的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和质量，正是他们“确定了与生存所需大致相对应的一定数量的最低劳动小时”（第64页）。正是通过这一方法，确定了“经过科学估计和平衡的生活必需品的标准配给量”（第64页）。这个反映生理生存标准的最低配给，就成为报酬的基础。这与生产中的劳动时间核算制度之间有什么可能的联系？4

答案当然是，这个最低限度是针对非技术工人的，而“受训”和“技术”工人的“工资”则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固定在一个稍高的比率上。这些集体协议决定了基本工资，而“社会主义工厂经理...... 根据不同工人的能力来确定他们的报酬”（第64页）。

很明显，当生产者之间存在这种矛盾时，他们永远不会感到他们的工厂是他们自身的一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永远无法负起对生产过程的责任，这一点莱希特非常清楚。因此，在他的概念中，行使责任的不是生产者本身，不是作为生产整体的工厂组织，而是主管。莱希特写道：“工厂的主管，无论如何任命，都要对它承担唯一的责任；如果没有达到对他的要求，他可以被立即解雇，就像一个资本主义的工厂经理。如果他失业了，他就会得到社会保障的最低收入，否则他就会受雇于一个适当的低级职位，并因此而降低工资。这样，就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工厂经理和厂长中保持‘个人主动性’和责任感的标准——而这些品质也会影响个人的个人利益，从而使他们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第101页）。所有这些都是很明确的。莱希特的观点是，被降低到根据生理或“最低生活标准”规范制定的生活水平的威胁，应该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生产者的头上。

**因此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组织结构也是由分配的基础决定的。**工人与工厂管理部门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工人未能确保他们与社会产品之间的关系是由他们所付出的劳动决定的。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莱希特设想的产品价格。虽然我们本来以为，在这种情况下，至少社会平均生产时间作为产品价格的决定性基础，仍是有效的，但我们发现，事实上情况绝非如此。在这个问题上，莱希特说得极为含糊，但很明显，产品在进入社会交换时**被附加了一个较高的价格**。例如，他谈到了利润的增加，但表明他的意图是，这不是给工厂的，而是归于一般的社会基金——在莱希特的计划中相当于资本主义的“金库”或“国库”。正是从这种利润增长中，一般性基金提供了扩大工业单位的生产基础的手段。因此，这个基金显示出它是**一种积累基金**。我们很快就会回到这个积累基金的问题上，但首先要说明的是，在莱希特那里，生产时间也没有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上。于是真相浮出水面，即“生产系统的中央管理和行政部门”实际上决定了价格。简言之，他们实行**价格政策**，此类措施之目的是获取积累的手段。中央管理部门对产品行使处置权，因此手中有权力按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剥削生产者。由于生产者与产品缺乏确切的关系，由于“价格政策”的存在，资本主义类型的工资关系仍然有效。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定义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三类工资：1.名义工资；2.实际工资；3.相对工资。

**名义工资**是劳动力的货币价格。在以统计学上得出的生理或“最低生活标准”为基础的那类共产主义之下，它应被理解为工人按实际工作小时数（例如40个小时）得到的作为报酬的等量劳动小时数。

**真正的或实际的工资**相当于用名义工资所能实现的产品数量。虽然名义工资可能保持不变，但如果产品价格下降，实际工资就会增加，而如果价格上升，实际工资就会下降。在莱希特那里，中央行政部门推行的“价格政策”当然被认为是符合生产者的利益的。但这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达成了任何的或所有的“集体协议”，事实上决定实际工资还是当局，因为这些协议只与名义工资有关。生产者对这一切没有任何权力，因为对价格政策的控制权保留在“统计局”先生们的手里。

**相对工资**是由实际工资与资本利润总额的关系来界定的。因此，实际工资有可能保持不变，而相对工资则由于实现的利润总额的增加而下降。在这里，莱希特把主要重点放在工业单位的“精简”上。这源于对更高生产率的追求，即用同样的劳动力创造持续增加的剩余产品——换句话说，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不断下降。在莱希特看来，生产者与产品的客观关系并不是由生产过程本身决定的。他只能够设想一种智能的劳动机器，这种机器在统计学上得出的生理或“最低生活标准”的基础上得到滋养，这种机器，尽管它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数量增加了，但却不需要得到任何额外的热量（卡路里）或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投入。或者，也许劳动机器毕竟得到了财富增长的一部分，但即便如此，这种情况真的会发生也没有得到过任何保证。这里的要点是，在劳动时间计算制度下，生产系统的所有者-控制者，即工人自己，对所生产的增长了的大量产品行使完全的处置权。

因此，可以证明，如果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范畴不同时地作为分配的基础，它就没有意义。如果生产者与他们产品的关系直接建立在产品本身上，那么就不存在“价格政策”的回旋余地，生产系统的每一次改进的成果都会直接和自动地归属于所有消费者，而不需要任何人在行政上“下命令”。在莱希特那里，三个资本主义下的工资类别可以被证明是存在的，这一事实证明，**他的生产计划，就像资本主义本身一样，也建立在剥削之上**。

## 2. 沃尔高的国家共产主义作为分配中的一个因素

然而，莱希特并不是唯一在“价格政策”中寻求救赎的人。沃尔高也把它作为共产主义分配制度的重心。他与他的同事纽拉特、莱希特等人的区别仅仅在于，他在原则上赞同社会产品的平等分配制度。在过渡时期，不可能立即消除剥削，因为我们必须预料到，“有一代工人会暂时存在，他们已经被资本主义腐蚀了，他们是在资本主义的贪婪和利己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5，他们反对社会产品的平等分配。众所周知，技术工人往往对非技术工人抱有某种蔑视的态度，而扭曲的正义感倾向于将总产品的较大份额分配给知识分子职业的后代，如医生、工程师等，而不是分配给“普通”工人。今天，人们可能认为这种区分过于极端，但是，“……仍然是与清洁工不同的东西”！在革命过程中，工人阶级会在多大程度上抛弃这个在意识形态上得到支持的残余物，还有待观察。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一旦革命完成，这种再教育必须迅速进行，因为对产品的对抗性的分配方式总是会导致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和争吵。

在上述文章中，沃尔高列出了他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经验和理论观察。匈牙利的历史对共产主义经济的研究极为重要，因为正是在这里，国家共产主义的理论第一次被付诸实践，而且实践比理论更有意义。在匈牙利，人们试图按照国家共产主义概念的规则来建设共产主义，而且确实是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下，“匈牙利经济的转型和组织结构调整比俄国本身进行得更快、更有活力”（沃尔高，第78页）。事实上，经济建设是按照希法亭关于“总卡特尔”的设想进行的（第122页），在这个设想中，国家作为生产和分配的总经理和管理者，对所有产品享有充分的处置权。所有仍然在经济体的“自由”资本主义部门中生产出的商品，现在都被国家买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确实享有对社会产品的完全支配权。

在分配方面，首先是向工业提供原材料和生产资料的紧迫需要，这是一种迫切的需求。为此，最高经济委员会设立了一些原材料的中央分配点，然后向各工厂分配它们所认为是必要和合适的原材料和其他生产资料。然而，这些中央分配点绝不是简单的分配机关；它们同时作为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工具运作，因为它们有意识地通过控制材料供应来促进生产的集中。因为它们有意识地通过控制材料供应来促进生产的集中。“上级机关”决定要关闭的工厂被简单地切断了基本材料的供应，操作人员被遗弃到街上。有第一手证据表明，工人们与这种集中过程进行了斗争，这种过程对他们来说有着与资本主义下的集中同样致命的后果。这种做法给他们上了一课：生产者对生产系统没有支配权。这种权利仍然掌握在最高经济委员会的国家官员手中，因此他们后来与生产者本身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E.沃尔高：同上，第71页）。

对此，我们要补充说，“自上而下”的集中显然比“自下而上”的集中有更快完成的优点，但为这种加速发展付出的代价是生产者本来对生产系统所拥有的权力，也就是：共产主义本身！

我们已经注意到，沃尔高版本的国家共产主义不知道任何决定原材料和生产资料分配的用于衡量的经济尺度。工业对当前生产所需材料的分配完全是“根据有关部门的命令”进行的，绝不是由生产过程本身客观地决定的。从社会和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工业生产导致了彻底的失败。在社会政策方面，因为生产者最终完全依赖于分配产品的当局；在经济政策方面，因为处在基于主观行政评估的分配制度下，再生产的需要得不到保障。因此，沃尔高在本质上是一个“商品经理”，归根结底，他倾向于纽拉特所主张的集中的生产分配制度，这个制度没有任何经济控制单位的运作。的确，他说“目前存在对货币价格和货币工资的需求”，但他被迫补充说，这必须通过更充足的商品生产来克服。但这样一来，就完全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来评价生产设备不断增长的生产率。于是，在任何实际基础上的真正的计划生产就停止了，而且不可能为下一个生产周期测量和分配与前一个生产周期所用的同样多的产品——也就是说，甚至不可能确保简单的再生产。

为了克服沃尔高式国家共产主义的混乱局面，最终必需在一个控制单位的坚实基础上建立生产，而根据这种情况的性质，这个控制单位只能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单位。但这同时也将终结任何基于主观行政决策对社会产品进行任意分配的制度。一旦工厂采用一种以劳动时间计算其消耗量的制度，根据(p+c)+L的公式，那么这个制度就变成了这样一种制度：客观的生产过程本身决定了在下一个生产周期必须向工厂提供多少生产资料和原材料形式的产品。在这个体系中，主观因素和对生产设备的集中支配权一起被消除了，因为生产和分配的管理和行政都在生产者手中。

在沃尔高的体系中，决定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分配的规范也反映了根据主观行政决定进行分配。事实上，我们不能期望有什么不同，因为生产和分配在功能上是相互关联的。在他眼前飘忽不定的理想情况是“自然的”分配（即以物易物的方式）且没有任何经济措施，这与客观生产过程完全一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为所有消费者规定了各种主食产品的固定配给，然后可以在消费合作社获得这些产品。“但是，由于货币工资和货币价格必须暂时保持运作”，我们现在必须把注意力转向“由国家定价”的问题（沃尔高，第147页）：

“国家产品的价格应该固定在什么水平上？如果国营企业生产的商品按成本价出售，就没有经济来源可用来维持上述非生产性的人口部分。这里指的是军人、官员、教师、失业者、病人、残疾人等——作者）。另外，也不可能有任何生产资料的真正积累，而在无产阶级国家，为了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比在资本主义国家更迫切需要生产资料的积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原则上，国家单位生产的所有商品都应该以‘社会成本价格’出售。我们的意思是，成本价格加上一个额外的增量，借此以**支付维持人口中的非生产性部分的费用，再加上一个可以为实际积累提供资金的增量**（沃尔高的强调）。换句话说，销售价格的固定方式必须使国家不仅不出现赤字，而且实际上还能支配盈余，从而为新的生产设施提供资金。原则上，这就是解决办法。”（E.沃尔高：同上，第147页）

## 3. 生产机关对生产者的支配

因此，“定价”的做法就变成了国家实行“价格政策”的做法了。毫无疑问，沃尔高的意图是，这应该是一种阶级政策，这就是他建议对面包和糖等对工人相当重要的产品制定低价，对奢侈品制定相应高价的原因。但是，应该指出，他认为这些变化更具有宣传意义，而不是经济意义，因为他非常清楚，国家所吞下的巨额资金，归根结底必定来自群众，也就是无产阶级。

这种“阶级政策”，无论其初衷多么善意，实际上揭示了国家共产主义分配方式全部的腐朽性。它非常清楚地表明，生产者并**没有**——正如生产者**本应**通过劳动行为而——同时决定在社会产品中的占有份额，而是通过主观的行政决定，在行政的高层中确定了这一份额。因此，争夺政府职位的旧政治斗争会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事实十分清楚地表明，谁在国家中处理政治权力，谁就拥有社会产品的全部，并通过“价格政策”的手段，支配着分配。这不过是为争夺权力地位而进行的古老斗争，而这种斗争是踩在提供劳动的消费者的背上进行的。此外，如果我们记住，工资也是由最高经济委员会确定的（E.沃尔高：同上，第75页），那么，国家共产主义奴役大众的画面就完整了。中央生产管理部门拥有完全的权力，可以通过其价格政策使任何以斗争方式实现的工资增长无效。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随着国家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工人阶级努力创造了一个生产体系，然后将自己抬高到生产者之上，并与其对抗，它成长为一个巨大的压迫引擎，要与之斗争甚至比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斗争还要困难。

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通过分配组织所采取的民主形式得到了适当的掩盖。例如，1919年3月20日，俄国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整个俄国人口必须组织在消费合作社中：

“所有在其经营范围内行使一定独立性的合作社都被合并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消费者则通过他们的会议和代表大会控制分配过程；他们是‘自己家里的主人’。虽然消费者合作社的组建及其合并背后的启动力量是国家，但在组织成立后，产品分配的责任就留给了广大民众。”6

根据俄罗斯通讯社，我们应该相信，完全是通过国家的组织性劳动，才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内建立了这个巨大的分配机关！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俄国共产党的专政在这方面完成了一项巨大的任务，并提供了一个光辉的榜样，说明消费者如何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他们的分配机器。然而，即使消费者真的是“自己家里的主人”，但如何在共产主义下开展生活，特别是如何确定生产者与产品的关系，并不是在那里决定的。这些决定是在中央政府办公室做出的。然后，消费者可以“独立地”分配产品——当然，前提是他们的“独立”受到足够程度的限制，以使其符合价格政策规定的规范！

[1] “...它可能是纸，铝或其他任何东西。”

或者，实际上是一个塑料制的计算机控制卡！

[2] K.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

[3] O Leichter: *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n der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p. 75.

[4] 段落结尾：这与生产中的劳动时间核算制度之间有什么可能的联系？

然而，这里揭示了劳动券（或其计算机化的等价物）的另一个基本功能：即确保用于个人消费的分配对每一类生产者来说都是按照一样平等的规模进行的，同样，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好处也平等地传递给每一类生产者。正如《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则》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只有通过一种分配条件由生产条件决定的制度，而且只有通过这种制度，这一目标才能作为整个经济过程的一个自然和有机的要素来实现。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手段是以社会平均劳动小时为代表的完全客观和公正的用于个人消费分配的单位。

[5] E. Varga: 《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政策问题》（*Die wirtschaftspolitischen Probleme der proletarischen Diktatur*）, p. 42.

[6] *Russian Correspondence*（俄罗斯通讯社，Rosta，“罗斯塔”）, (*Imprecorr*), 20th January 1920, quoted in: E. Varga, p. 126.

# 六. 一般社会劳动

## 1. 一般社会用途（GSU）单位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考虑了那些通过其生产活动提供有形或可测量的产品的工业单位。然而，我们已经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某些单位中没有创造出物质或实物产品，但同时它们仍然是社会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在这方面，我们提到了经济和政治委员会、教育系统、卫生服务等——总的来说，这些单位与文化和社会需求有关。它们不生产有形的产品。它们活动的结果是，其服务被直接吸收到社会中，因此，在它们的情况中，生产和分配是同时进行的。这些单位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它们“免费”提供服务。只要有需要，它们供所有人免费使用。在这种类型的单位中，这样就实现了“按需分配”的原则；分配的实现没有经济手段。我们将这种类型的单位命名为**一般社会用途单位**（General Social Use establishments，GSU单位）或简单的**公共机构单位**。这与那些不进行无偿生产的单位形成了对比，后者被称为**生产性单位**。

应该清楚的是，经济功能的这种差异给共产主义的经济调节和控制体系带来了复杂的问题。如果所有单位都生产有形产品，那么人们对共产主义生产就不需要说什么了。只需要在P、C和L方面对生产单位进行正确的分配，生产就能顺利进行，而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个人之劳动力的全部收益”，在工厂里以劳动券的形式支付。这样，劳动时间就成为社会产品中用于个人消费的那一部分的直接衡量标准。

然而，这并不反映制度的实际情况。尽管一般社会用途（公共的）单位消费生产资料、原材料，也为在其中工作的工人消费商品，但它们没有为社会可支配的产品总量贡献新产品。因此，一般社会用途（公共的）单位消费的所有这些使用价值必须从生产单位生产的大量产品中扣除；也就是说，工人没有得到生产性单位支付的“他们劳动的全部收益”，而且劳动时间不是决定社会产品中用于个人消费的那部分的直接尺度，因为工人必须为诸如公共（一般社会用途）机构单位类型的机关交出他们产品的一部分。这使人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与社会产品的确切关系被打乱了，而且确实可以在这里找到困难的根源，它使经济学家们感到如此头痛。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找到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对于所有关心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敏感点。此外，正是由于试图解决这一反常现象，诸如纽拉特关于生产者和分配者的中央机关的计划首先产生了，因为正是这个中央机关决定了每个人应根据“他所习惯的生活方式”享受社会总产品中的种类和分量。还有一些国家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不太一致，试图通过间接税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俄罗斯）。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对究竟应该把什么和多少分配给工人-生产者来进行个人消费的问题的回答，只是在黑暗中摸索。然而，在一个问题上，大家一致认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对经济进行来自中央的管理和行政管理，这就意味着不可能在生产者与产品之间建立确切的关系。塞巴斯蒂安·富尔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也不得不抓住受到“从上而下”管理的经济提供给他的稻草，这意味着在这个体系中，基本动机也可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既然可以由此证明，**国家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根源在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中**，那么我们就必须对它给予特别的关注。事实上，只有在1917-23年革命时期开始后，解决这个问题才成为可能，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实际上也是巴枯宁主义的原则——“不是国家，而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联合体的联盟”代表了建设共产主义的积极原则，这个原则在工人委员会制度中具体化为其第一个形式。

## 2. 莱希特的价格政策

第一个使这个问题接近解决的是奥托·莱希特，原因很简单，他是第一个把共产主义经济建立在“成本会计”的物质基础上的人。然而，他的工作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因为在最后的结果中，他不知道如何始终一致地将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一范畴应用于生产和分配。莱希特对整个经济体的概念是一个巨大的托拉斯，即希法亭的“总卡特尔”。对他来说，这个问题随后以变成另一个问题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即从何处获取一般的公共账目（我们称为一般社会用途服务）的来源。他反对间接税的方法，并寻求其他手段。他甚至找到了这些方法......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把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范畴排除在外。时考茨基失败了，由于他无法感知工厂平均时间和社会平均时间之间的差异而处于一个异常的境地，莱希特也未能解决这个同样的问题。但是，在他的例子中，他不允许这一点使他完全脱离劳动时间计算的方法。他没有计算整个“行业协会”或生产部门的社会平均水平，而是根据效率最低（或最昂贵）的单位的生产力来确定每种产品的“价格”，从而迫使其余的工业单位以盈利的方式经营，而这种利润则流入整个社会的国库。关于这些盈利设施，他写道：

“然后，这些设施将产生一个差额，或者——用资本主义术语表达——剩余利润，当然，这些剩余利润不应该只归于这个或那个工厂，而是——再次用资本主义术语表达——必须通过税收来消除。”1

虽然莱希特发现，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其中的具体花费”（第38页）对产品流实行控制的方法是最方便的，但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他没有把这一点贯彻到其逻辑结论中。最重要的是，他没有认识到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一范畴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我们稍后会看到，他试图弥补这一点，但不管怎样，他用这种方式在他的分析中揭开了困惑和晦涩的第一层面纱。

......与此同时，这种“收入来源”被发现是一种不适当的手段，而且坦率地说，对莱希特的体系来说不是根本的必要条件。在他后来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他试图更精确地阐述这个问题，他在尝试中取得了一个根本的进步，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这一领域所有的其他工作。他计划的第一步是将所有的公共成本合并到一个标题（heading）下，然后确定所有生产者每年花费多少工时来实现这一目标（很明显，这需要一个共同的社会簿记系统）。通过这种方式，他得到了两个数值，当它们相互联系起来时，就产生了一个差值。由于整个计算依赖于对劳动时间的计算，他通过这种方法揭示了一个数值，该数值表示每人必须贡献多少劳动小时给一般社会用途的或公共的工程。因此，他也发现了在生产单位里直接耗费的劳动力中，有多少必须加到产品价格中，以支付这些一般社会用途的（公共的）社会支出的“成本”：

“因此，每年在为整个社会编制总的生产预算时，每个生产单位都有责任在其具体的工厂或车间预算中引入与整个社会生产系统有关的范畴（第65页）。于是，所有经济项目的总和——当然这就成了整个生产系统的费用——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最终的数量，大概与生产和分配领域的劳动总小时数量有关。然后，当合计所有社会（‘公共’）开支的起始成本时，所得的差额就加到支付给个人劳动报酬的总和（‘工资’）中，这样，商品成本中就包括了代表社会一般成本的一个要素。当然，如果对所有商品，对最主要的商品和最奢侈的商品，对最必要的商品和最小众的商品，都加上同样的社会总成本增量，那就相当于一种不公正，而且几乎会产生与间接税相同的效果。因此，经济议会或最高经济管理局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为每个工业部门或每种产品确定适用于一般社会成本的正确增量类别，并始终以包括社会总的非生产性成本的方式确定这些增量。这样也就有可能按照中央当局的观点来影响价格政策......”(奥托·莱希特，同上，pp68)

莱希特的这一构想确实很了不起。为了避免被指责为采用间接税的方法，他建议教育、卫生服务、分配等费用不由社会所有成员平等承担。显然，他的意图是，与统计学家和生活生理学家认为应处于有利地位的“较贫穷”工人相比，收入较高的工人应承担较重的负担。然而，我们必须公开表明我们的观点；即这种措施恰恰会通过这些手段获得间接征税的性质。我们在这里考虑的恰恰是维持一般社会用途单位所需的那些费用之类别。为什么要认为“富人”在这方面的贡献要比“维生工人”（subsistence worker，见生存工资论——译注）多，而后者的需求是根据基于统计艺术的所谓“科学的”社会学方法来评估？莱希特的内疚感是否代表了一种对立的社会产品分配方式？

然而，现在让我们从他的分析中删掉一切多余的东西，并提出具体问题：莱希特是怎么得出他的一般社会成本的数值的？我们就会发现，答案只有一个：一方面来自生产单位生产的剩余，另一方面来自间接税。他似乎希望为所有产品的价格增加一个特定的增量，但实际上他的解决方案变成了“对每个行业部门或每个产品”确定具体数额。确切地说，这些产品的具体类型，**仅能通过莱希特的阶级社会中潜在对抗的权力关系来决定**。而这又只能由工人们在反抗“他们的”最高行政管理当局的斗争中所能发挥的力量程度来决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莱希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他的“精确关系”的实际结局是完全破产。

## 3. 产品的分配

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采取间接税和价格政策的办法来解决这种对立的产品分配方式，也完全不是必需的。总的来说，这个问题一开始就表述得很正确。一般的社会成本只能由直接消耗的劳动力来承担。如果我们从空中俯瞰整个简单的经济过程，这一点就会立即显现出来。将其简化为最简单的术语，可以表述如下：

**社会在其生产活动中产生了千姿百态的产品。这些产品上印上了在其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多少小时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在这大量的产品中，生产设施首先更新其已用完的生产资料和原材料。接下来是一般社会用途（公共）设施它进行同样的过程。最后，剩余的产品被所有工人消费。这样，整个社会产品就被社会消费了。**

因此，在第一阶段，生产单位从产品中取出它们在p和c中用掉的东西。这无非是说，所有设施，每个设施都单独计算了它们用掉的p和c的数量，并把这些数量纳入其产品的成本计算中，现在也正好以有关成本计算所确定的数量更新所有这些产品。如果我们再次为所有生产设施制定生产示意图，合计起来，我们有：

(P + C) + L = 大量产品

100 m + 600m + 600 m = 1300m L-Hrs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这些设施加在一起将消耗700m个劳动小时（P和C）。因此，从社会总产品中抽出了这些劳动时间，这样就留下了包含600m劳动小时的大量产品。从这些剩余的产品中，一般社会用途（公共）单位现在拿出了更新其生产资料和原料所需的东西。然后，剩下的东西可供个人消费。

为了具体地表述这种分配方式，一般社会用途（公共）单位的总消费量必须是一个已知的量。如果我们把这些设施所需的生产资料称为Pu，把原材料称为Cu，把劳动力称为Lu（下标u代表“普遍的(universal)”，即公共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所有一般社会用途单位的总预算表述如下。

(Pu + Cu) + Lu = 社会服务，或

8 m + 50 m + 50 m = 108 m L-Hrs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从生产单位应得的600m工时的产品中，首先抽出58m工时，用于支付一般社会用途单位的（Pu-Cu），因此，总共有542m工时用于所有工人的个人消费。那么问题来了：每个工人个人应得的数量是多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确定，一般社会用途（公共）单位消耗了劳动力总产量的多少比例。做到这一点，问题就解决了。

在生产性单位中，工作的工人付出了600m个劳动小时，在一般社会用途单位中付出了50m劳动小时。就所有工人而言，这相当于650m个劳动小时。然而，对于个人消费来说，在劳动力的总产量中，只有542m个劳动小时可用，也就是说，比例为542：650=0.83。因此，在工作场所本身，可以支付的并不是全部的劳动成果，而只是其中的0.83，或83%。

由此得到的数字，表示在各个工业单位可作为劳动券支付的全部劳动力的比例，我们称之为**报酬系数**，或**个人消费系数**（Factor of Individual Consumption = FIC）。在我们的例子中，它等于0.83，由此我们可以计算出，一个工作了40小时的工人将从劳动券中获得相当于0.83 x 40 = 33.2劳动小时的劳动券，这表明工人根据其选择在社会总产品中占有的份额。

为了以更普遍的形式表达这一点，我们现在将编写一个FIC的公式。首先，我们取L的值，从中减去（Pu+Cu），这样就剩下L-（Pu+Cu）。余下的部分除以L+Lu所代表的劳动时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看到每个工人所获得的用于个人消费的劳动小时数：

现在，为了清晰起见，我们将公式中的符号替换为例子中的实际数字，并把报酬系数重新称为个人消费系数（FIC），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一计算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所有工业单位都对它们的p、c和L的消耗进行了准确的记录。一般的社会簿记系统，通过一个简单的交换会计控制体系来登记产品流，直接处理了确定报酬系数所需的所有数据。这些数据用符号L、Pu、Cu和Lu表示，并可通过汇兑账户(exchange account)的简单求和获得。

这种生产和分配制度下，供任何个人支配的社会总产品的比例不是任何机构主观“分配”的。我们所拥有的不是一个由官员任意决定的分配制度；相反，分配是在生产系统本身的客观需要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者与社会产品的关系客观地体现在这个系统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没有在动机上存在主观性的当局承担“分配”责任。因此，这也解释了国家机器在经济中的作用变得多余的“奥秘”。整个经济，包括生产和分配，都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因为正是通过这种关系，生产者和消费者被赋予了自己管理和经营整个过程的权力。

在围绕上述主题举行的各种会议和讨论中，有时各方都表示担忧，认为一般社会簿记制度在一定情况下会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剥削机构，因为它被赋予了确定FIC数值的任务。例如，它可以把这个系数计算得太低。

但是，应该记住，现在已经不存在任何剥削的基础了。整个共产主义经济只由工厂或劳动组织构成，而且只有它们才能“支配”（” govern”）它。无论这些组织履行什么职能，它们都是在其预算的范围内进行的。一般社会簿记机构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工业组织（一般社会用途类型的），它也只能在规定的框架内运作。它不能对经济单位行使任何权力，因为经济的物质基础已经把对经济体系的控制权完全交给了现在构成整个社会的工人手中。然而，另一方面，任何经济制度，如果不是建立在生产者与产品准确规定的关系之上，而且如果这种关系是由官方机构的官员主观决定的，那么，即使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已经被消除，也必会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一种压迫的机器。

## 4. 社会化的分配

在继续我们对报酬系数的观察的同时，我们现在想在我们的讨论领域中引入另一个问题，一个与它直接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向共产主义更高阶段发展的过程。**

我们已经看到，一般社会用途（公共的）单位的最大特点之一在于，在它们身上实现了“各取所需”的原则。在这里，劳动时间的计量在分配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随着共产主义向更高阶段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类型的经济单位变得越来越普遍，以至于它包括食品供应、客运、住房等部门，简而言之：消费的满足一般都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这种发展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至少就任务的技术方面而言，可以相对迅速地完成。社会越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产品按照这个原则分配的程度越大，个人劳动时间作为决定个人消费的尺度就越少。尽管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个人劳动时间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履行这一职能，但随着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地从它脚下摧毁将它产生的根基。在这里，我们想起了马克思关于分配的观点：

“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

我们在观察中所表明的是，通向更高形式分配的道路是明确而全面的。在分配方式逐渐变得越来越社会化的同时，劳动时间仍然只是衡量社会产品中依旧受个人分配规范制约的那一部分。

分配社会化的过程不是自发发生的，而是与工人自己采取的主动行动有关。也有很多机会可以用来表达这些倡议。如果整个生产过程进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生产供个人消费用的最终产品的某一部门完全顺利、没有干扰地运作，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将该经济部门纳入完全公共的（一般社会用途）单位的范围。这些企业的所有会计程序保持不变。在这，工人们不需要耐心等待，直到他们的国家官员阁下满意，才决定让某个部门的控制充分地巩固在他们手中。由于每一个生产单位或生产单位的综合体在控制预算方面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生产者本身完全能够完成分配的社会化进程。

自治的行政管理系统确保生产系统极为灵活——这是一个倾向于加速其无阻碍增长的因素。例如，不言而喻，分配的社会化进程在不同的部门和地方会以不同的速度发展，原因很简单，在一个单位中，对文化设施的需求会比另一个机构表现得更强烈。生产系统固有的灵活性使它完全有可能适应这些增长速度的差异。例如，如果某个地区的工人希望建立更多的公共图书馆，他们就可以毫无障碍地充分行使权力。然后在一般社会用途单位的系统中建立新的机构，提供更大程度的地方主动性，因此必要的开支也必须由有关地区承担。在这种情况下，FIC的数值将被修改，而不侵犯生产者与社会产品的基本关系。这样，工人们就获得了塑造自己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的能力。

我们称之为“按需消费”的制度的发展过程是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和发展的，代表了整个社会所采用的有意识的过程；而这种增长的速度主要将取决于消费者本身所达到的社会发展水平。他们越快、越早地学会经济地管理社会产品，即不浪费地消费它们，就有可能越快地实现分配的社会化。控制预算的目的是调节生产的总量，而运营中的一般社会用途单位的数量是多是少，关系不大。只要一个以前根据劳动券将其产品供给个人消费的生产性单位转入一般社会用途领域，一般社会用途的总预算就会变得更大，同时，为了使有关的生活资料以劳动券这种形式被消费而提供的劳动券的总量就会越来越少。因此，个人消费系数（FIC）变得越来越小，其程度与共产主义的发展成正比。

然而，个人消费系数（FIC）形式的报酬系数似乎永远不会完全消失，因为社会消费的本质是，只有那些提供用来满足**一般**需求商品的生产单位才有可能转变为一般社会用途类型的单位。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在完全社会化的分配体系中，几乎不可能包括那些反映由各种特定的个人兴趣所决定的品味特殊、多种多样的物品和货物。然而，无论人们对此持何种观点，这都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主要的一点是，通往完全社会化的分配方式的道路已经明确指出。

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将上述看法描述为“纯粹的乌托邦”，与马克思毫无关系。至于这个“乌托邦”的情况如何，我们将在结语中考察。至于马克思的相关观点，我们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我们的观点与他的完全一致。在谈到我们称之为完全社会化分配的“共产主义的更高阶段”，他写道：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哥达纲领批判》）

但在这里，马克思也认为，这必须是整个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全部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各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的一份。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同上）

## 5. 混合型工业单位

我们对报酬系数或个人消费系数（FIC）的看法是，生产性工业单位完全有能力进行自己的再生产，而一般社会用途（公共）单位的投资需要（投入）则由生产性单位的劳动力（labor-power）承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设计了L - (Pu + Cu)公式来表示可供个人消费的劳动小时。然而，随着共产主义向更高阶段的进一步发展，这个公式必须进行修改，因为必然会有许多经济单位投入运营，它们的生产部分是为了个人消费，部分也是为了满足社会化生产向共产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比如说，考虑一下发电厂的例子。光和热是为了满足国内个人消费者的需要，但产品——电力，也是作为光和功率以工业原料的形式被消费掉，以满足进一步的生产。如果社会在生产和社会两方面都达到了足够成熟的发展阶段，使采用无偿供应电力满足个人需要成为可能，那么随着这一步骤的实现，一种新的经济单位就会出现，它部分属于生产单位的范畴，部分属于一般社会用途（公共）单位的范畴。这些单位我们称之为**混合型工业单位**。分配的社会化进程越是发展，这种类型的混合单位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不言而喻，这种发展必须在工业控制预算制度和 FIC 数值的确定中体现出来。为了制定会计控制制度，混合类型的工业单位必须被归入两个主要类型中的一个项目下：生产性单位或一般社会用途（公共的）单位。然而，将其归入两者中的哪一类型，这件事并不重要；为了会计控制的目的，所有混合型单位都可以归入生产性单位或一般社会用途单位；也可以根据需要将一些单位归入一个类别，另一些则归入另一种。因此，预算控制制度不妨碍生产和分配的灵活性。我们将首先考虑将混合工业单位分到生产企业类别的情况，以查明这对确定FIC值的影响。

在以前的制度下，我们的发电厂作为一个完全的生产性单位，其提供的所有千瓦时都被记入汇兑账户，因此，它完全有能力进行自己的再生产。然而，随着向“无偿个人供给”转换时，在汇兑账户中就会出现与个人消费量完全相等的一个借项（debit）额。因此，发电厂为满足个人光、热和功率的消费而需要的工时必须从FIC的总量中恢复给它。这笔借项是GSU总预算的一项支出，因此由FIC支付。现在把混合单位的业务产生的所有借项加在一起，然后得到全体借项或总借项额，这些借项同样必须由FIC支付。用字母D表示这个总借项额，我们得到以下公式：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电力工程作为一个一般社会用途单位的功能。一般社会用途单位没有收入，因此，它们的再生产需求代表了对生产性单位之劳动力的一项总体费用。然而，混合型工业单位通过向其他单位提供生产资料或原材料，在汇兑账户中会得到一个贷出额（credit）。也就是说，它有部分能力自己进行再生产；它的（Pu + Cu）+ Lu的消耗总量不是从生产性单位的劳动力中扣除，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满足自己对生产资料和原料的需求。如果我们现在用字母G（Gain，[增益，或许用贷出额，credit表示更好——译注]）表示来自它本身再生产的那一部分，那么对每个生产单位之劳动力量的收取就只有（pu + cu）+ Lu - g。我们现在把它与所有混合型企业的总数联系起来，那么，必须由FIC支出的数额就是（Pu + Cu）+ Lu - G。我们最后得到了这个公式：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例子是在会计控制预算的实际运作中产生的，现在还有一项任务，即为了控制预算的目的，把一类混合单位归入生产性单位下，而另一类归入一般社会用途（公共）单位下。这种情况里，混合的生产性单位要从GSU预算中收取D（借项）的工时，而GSU单位则将G（增益）所代表的工时恢复给生产性单位。因此，作为对FIC的费用收取，仍有D - G。个人消费系数因此变为：

（上式为简化形式。如果有必要对与会计控制预算有关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数学研究，就必需用（P+C）来表示G和D，这种操作可以毫无困难地进行）。

[1] O. Leichter: 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n der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 七 .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

## 1. 生产者与产品的关系

在上述所有内容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可以比较迅速地处理分配问题了。当然，这里的基本问题仍然是确保生产者与产品的确切关系。我们已经看到，所有关注共产主义社会中商品和服务分配问题的经济学家，都没有把这种关系看作是在生产领域本身决定的，而是把它作为消费者之间竞争或对抗性的政治或经济关系的结点。然而，这只意味着在国家中对权力的争夺，在生产者与产品的关系中争夺主导地位的斗争，依然在社会的中心燃烧，并继续发挥其腐蚀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只要生产者直接通过劳动决定与社会产品的关系，价格政策就完全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这时，国家“消亡”（”withering away”）的条件第一次出现了，我们可以说：1

“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2（《家私国》）

“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3（《反杜林论》）

一旦生产者和产品之间的决定性关系被牢固地固定下来，就只剩下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对工业单位进行整合，以便以最合理的方式构建生产过程了。这种整合是一个过程，其起点是生产者本身。如今，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是利润动机导致了经济问题的合并——信托公司（托拉斯）、价格控制集团、卡特尔和类似组织。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当利润动机被排除在外时，问题就在于将工业单位彼此联系起来，使产品能顺利的从一个单位流到另一个机关，或者从一个生产单位到一个分配合作社的顺利流动能够完全展开。准确计算所有这些以劳动时间表示的价值，这些价值流入和流出工厂和其他经济单位，确保了整个分配过程的顺利运行，这样，生产者就可以承担起责任，而无需国家当局的干预。对社会总产品大部分的分配，即对以生产资料为代表的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不断地重新流向每一个生产单位或工厂），也毫无保留地属于生产者自己的责任范围。

如果我们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在供个人消费的产品的分配问题上，就必须强调生产和分配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如同从指挥中心进行经济管理的模式需要根据反映行政判断的主观规范进行分配的方法，同样地，自由和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也必然会产生一个自由和平等的**消费者**的相应联合体。因此，分配也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集体进行的。我们已经证明，至少在这方面，俄罗斯提供了一个光辉的例子，说明消费者如何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来，以便能够独立地分配产品，也就是说，独立于国家。然而，我们也已经证明，俄罗斯的这种独立只是一场闹剧，因为生产者与产品的关系已经在行政部门的更高范围内确定了。然而，这样实现的分配形式本身仍然是一个积极的成就。

我们的任务不是在这里说明导致分配合作社合并的过程。这肯定会因当地条件和要分配的产品类型而有所不同。然而，我们有必要明确分配的一般原则，因为这些原则是由经济调节和会计控制的社会制度之特点所规定、决定的和发展的。这种必要性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基本责任是证明分配制度不应以任何方式侵犯生产者与产品之间确切关系的原则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研究以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为基础的经济调节和会计控制制度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这种关系的发展、力量的增长和在社会中的移植，不受社会施加的一般费用的影响，从而确保“他们的劳动力的全部收益”归于全体工人。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分配所涉及的成本必须作为GSU总预算的一部分。**商品分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职能**。

因此，分配的成本不能由每个独立的分配合作社单独承担，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作为其最终结果，这将违反生产者与产品之间的确切关系的原则。如果这样做，分配组织的集中管理部门就会被迫实行“价格政策”，这就会导致根据任意行政决定进行分配的原则从后门溜进来。如果我们从分配组织作为P和L两个量的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那么很明显，必须把它归类为**一种GSU类型的经济组织**。作为这种GSU单位之活动结果的产品或服务，正是对产品的分配。

从这个特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组织受到适用于所有GSU单位的相同规则的约束。像所有其他单位一样，他们也准备了一份预算，其中显示了有多少的（P+C）+L=服务（即相当于x数量的产品小时可用于分配）。在这个示意图的框架内，分配组织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并且“在自己的屋子里做主”，同时我们也确保了，同时我们也确保了，在分配领域，生产者和产品的确切关系原则没有被违反。

## 2. 市场

虽然我们已经指出了分配应该建立的基础和应该采取的结构，但仍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但仍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这涉及到消费者的需要总量是否可以用于分配的问题；换句话说，生产必须符合并反映出人口的需要。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这些需求的范围和质量；然后才能对生产单位的产出——适当时也包括GSU单位的产出——进行调节，使之与这些需求协调一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我们的反对者选择了这一点作为他们批评的重点。他们直截了当地宣称，共产主义试图用使用经济（an economy of use）取代价值经济，它没有办法确定社会的需求是什么。当然，资本主义自发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要对某些产品的需求增加，这就会在市场上以相关商品价格上涨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由此产生的较高利润会吸引投资者，资本就会倾向于流向生产这些产品的生产部门，从而使增加的需求得到相对迅速的满足。当然，需求的减少会对生产产生相反的影响。这样一来，**市场机制**就发挥了需求调节器的作用。4

众所周知，这种市场机制并不是乍看之下那么单纯的工具。因为正是这种机制构成了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危机将自己表现出来的众多节点之一，这些危机使成千上万的人过着饥饿和匮乏的生活，也构成了帝国主义竞争的根源，使数百万人在战场上死去。5然而，市场是，而且在过去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下需求的指示器。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对市场一无所知，价格的形成和供求关系对它来说也是未知的，所以它不得不在没有这些众所周知的机制的情况下行事。正是在这个领域，臭名昭著的“共产主义的吞噬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赢得了他的荣誉，并得到了他那些可敬的同辈的雷鸣般的掌声。他用下面的话证明了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

“没有自由市场关系，就没有价格的形成；而没有价格的形成就不可能有‘经济调节’。”6

对布洛克来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仍然是一个非常晦涩难明的问题：

“只要消除了个人交换，生产就会成为社会必需，因此，产品本身就会成为社会必需的对象。至于用什么方法来达到和确定被认为是社会必需的东西，马克思并没有进一步关注。只要不能证明有办法取代市场机制，就不可能在实践中设想出社会化经济中的非货币调控体系，也就是合理的社会主义形式。”7

因此，布洛克没有提供任何解决方案。对纽拉特和其他人提出的解决方案，他认为是不可行的——我们可以赞同这种观点。所有这些对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都是按照同样的希法亭式配方“利用有组织的统计的应用提供的所有手段”，因此对社会产品的集中处置权再次具备了必要性。

在我们能够更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分配方式（mode of distribution）分别拥有的两个不同的特征。在上述段落中，我们已经承认，在资本主义下，市场作为需求的指示器发挥作用。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这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的真实。在资本主义下，劳动力是一种商品，有一个或多或少的明确的市场价格。这个价格是围绕着工人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而展开的。从出售特定单位的劳动能力（即工资）所产生的价格中，该劳动能力得到再生产，而事情就这么结束了。社会产品可能增长到一个巨大的程度，但工人仍然只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当然，需求可能会变得更大；当然，它们（译注：指需求）受到大量可用产品的刺激，而其中许多产品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获得。资本主义可以用它喜欢的慷慨措辞来夸它宝贵的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被认为是需求的指示器；实际上，它不会把这些需求纳入考虑，或者至少比那些试图用统计机关取代市场的人对它们的了解程度要低得多。对资本主义来说，甚至没有必要精确地了解市场，因为在最后的情况下，特别是就无产阶级而言，它不是为需求而生产，而是为利润而生产。换句话说，就无产阶级而言，著名的市场机制只会在**最低生活保障**规定的狭窄范围内活动，而对共产主义意义上的需求的任何了解都是无法想象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很清楚这一点。布洛克在这一点上说：

“价格形成的过程确保只满足最迫切的需求，也就是，要求最大程度购买力得到满足的这些需求。”8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社会只知道社会产品在所有消费者中的平等分配规模。有了这种制度，劳动能力就不再是一种有价格的商品了。随着社会产品的增长，如果在每一种产品中，生产者与产品间直接关系的原则得到充分体现，那么每个人应得的份额就会自动变大——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再也不会有任何意义。因此，我们现在看到，把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确定为调节和控制经济的单位，其必要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把生产机关（apparatus）对非个人部分[产品]的再生产放在可靠的基础上；二是安排消费品的分配。

在对资本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社会产品分配方式进行了这些观察之后，我们应该清楚，在共产主义下，完全不存在形成价格和使需求有效的市场。因此，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在一开始就建立起那些能够表达消费者愿望和要求的单位。资本主义没有确切相关知识的东西，即工人的需求，在共产主义下将成为**生产的全部决定性基础**。

因此，在布洛克等人提出用什么来取代市场机制的问题时，我们的回答是，它**根本不会被取代**！共产主义社会，以分配组织的形式，建立了那些使**个人**需求和愿望得到**集体**表达的机关。

必须在各种分配组织之间建立的合作的联系与形式，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这只能在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生活的严峻考验中解决。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己采取的主动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如工人的解放只能来自工人自己的斗争，同样，在共产主义社会的背景下，这也意味着生产与分配性组织之间的整个组织关系（实际需求通过这整套关系得到表达），同样只能是生产者-消费者自己的工作。

那些代表市场机制是任何社会不可缺少的特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不断地提到一个所谓的事实：如果没有市场，需求就不可能确定。然而，这种需求是指那些主观的、变化无常的潮流，它可以如此突然地改变，因为大众口味的反复无常往往体现在他们真实的或想象的需求的反复无常中。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需求可以很突然地推到前台，或者另一种同样突然地消失。在“时尚”领域经常出现的跳跃和曲折提供了这方面的有益例子。据称，市场为生产机关提供了适应所有这些曲折变化的手段，并以这种方式满足了通过需求表达的各种奇思妙想。

上述批评者对共产主义有一个强有力的论据，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将使社会生活中自发的创造性因素变成僵化的静止和最终死亡。当他们对官方品牌的“共产主义”进行论战时，他们也有一定程度的正义感，即试图“用高度有组织的消费统计的一切手段”来衡量需求，其特点是对生产和分配实行集中的行政管理控制。当然，事实是，社会生活中创造性能量的流动是无法进行统计控制的，其丰富性恰恰在于其多样性和多面性。用统计学的形式来涵盖社会需求的目的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统计学只能够确定最一般的社会趋势，而完全不能涵盖体现在特殊和特别中的无数细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说，由消费统计控制的生产方式不可能是按需生产，而只能是按照中央行政部门根据我们熟悉的那些老家伙——生存或“最低生活标准”的社会专家们所指导制定的某些规范进行生产。只要生产和分配掌握在生产者自己手中，我们的批评者的反对意见就会像风中的稻草一样散去。在其消费合作社中的，和处在与生产组织的直接沟通中的消费者组织，是一种允许完全流动的关系。这种流动性将包括并直接理解个人不断变化的需求，他们将把这些需求直接传递给生产机关(productive apparatus)。这种直接联系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没有专注于“价格政策”的国家机器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插手。每种产品都将被赋予它自己的特定再生产时间，然后它将带着这个时间在社会经济体中旅行。无论产品以何种形式被创造出来，适当的需求都会由分配组织传达给生产单位。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生产怎么让市场机制变得多余的全部秘密。

如果我们现在想把整个分配方式作为一个整体来表达，**我们就会看到，社会总产品**（total social product, TSP）**实际上是很自发地在各种消费者群体中进行分配的**。生产过程的运作本身决定了从生产领域向分配领域过渡的方式和精确比例，从而使自己能为整个社会所用。暂时不考虑“积累”这个类别，每组消费品从消费者那里获得的数量为（P+C）+L，作为其在社会产品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并且与它最初对社会总产品的创造做出贡献的比例相同。这可以毫无困难地实施，因为每个产品上都清楚地注明了适当的生产时间。

在生产过程中，每个生产性单位通过生产公式（p+c）+L来计算其消费需求。总的生产过程由所有生产性单位的总和构成，我们用公式（P+C）+ L = TSP来表示。对每个单独的生产单位有效的系统，对总的生产系统也有效。如果对每个生产单位和每组单独的生产条件都计算了社会平均生产时间，那么所有生产时间的总和必须以同样的方式表示在总产品（TSP）中。下面的原则适用于TSP的分配：每一个经济单位，无论是生产型的还是GSU型的，首先从TSP中提取在其生产预算中为其计算的p项。一旦所有经济单位都这样做了，它们就次取代了它们对p的消耗，因此p就以完全正确的比例得到分配了。

更进一步，每一个经济单位从TSP中提取在其生产预算中为其计算出的c。一旦所有工业单位或其他单位都这样做了，那么，c也就按正确的比例分配了，并回到了总生产体系中。紧接着，每个单独的工业或其他单位都有责任向工人提交关于可通过劳动券这一媒介来消费的社会产品数量的指令，其数量与在L项下的生产预算中为它计算出的数量完全相等。这些指令的总和是L.(x)，x代表上述机构单位的总和。然后，消费者可以从TSP中提取与贡献的劳动时间总数相对应的大量商品。

这样，TSP就完全被社会所占有，同时，各消费群体之间的关系和所采取的分配措施也完全由生产过程本身决定。在任何情况下，控制都不依赖于官方和权威机关颁布的主观规范（其前提条件是对生产和分配集中处置的权利）。

[1] 段落结尾：国家“消亡”的条件第一次被给出，我们可以说：“（段尾引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中的一段话）。” 这也最清楚地表达了共产主义生产的第一原则的必要性：“建立生产者与产品之间的明确而公开的关系。” 只要这个原则得到遵守，并且仍然是所有社会生活的基础，那么由一个在初期可能控制经济生活的阶层以不平等和阶级特权为基础来建立一种异化关系就将是不可能的。

[2]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3]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

[4] 段落结尾：“市场机制就发挥了需求调节器的作用。”当然，阻碍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遗产中这一最基本板块顺利运作的最基本障碍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简单的“需求”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被限制为有效需求。工人——或者就这一点而言，任何其他阶层的人——都可以“需求”他们所需要的商品，无论这些商品是工人阶级的主要生活必需品，还是资本家的资本货物和原材料，直到他们喊得声嘶力竭——如果购买这些商品所需的货币商品不能出现，或者至少没有足够的数量，那么非有效需求就如同不存在或缩减的需求。虽然以上描述的是经济运动的表面或结合层面（conjunctural level）上的矛盾，即市场层面上的矛盾——但这并不影响它的真实性！不应该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积累和危机理论以任何方式接受粗暴的“消费不足”理论作为危机的根本原因。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这种原因存在于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或两者的结合（几乎总是如此）：a）每次循环剩余价值的下降，低于它能有效维持利润率的水平，以对抗资本的有机构成同时上升的趋势；或者：b）同样地，在有机构成上升的情况下，绝对资本周转率（the rate of absolute capital turnover）下降到一个点或低于这个点，此时它无法补偿每次循环剩余价值率的不足。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危机的原因不是产生在分配领域，而是产生在生产领域，剩余价值和利润在那有其产生的根源。例如，在劳动力就业率下降之前，通常会有资本利用率的下降，资本利用率下降的原因是资本难以找到有利的生产条件，因此导致“它的”工人被赶到大街上。这就是“有效需求”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像资产阶级“经济专家”轻易开出的处方那样，相反地，是有效需求下降导致生产下降，从而导致当前劳动力就业率的下降。因此，“有效需求”下降是危机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5] “......也构成了帝国主义竞争的根源，使数百万人在战场上死去。” 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最终导致战争，当然也是一种“表面上结合而生的趋势（surface conjunctural tendency）”因此，指出它与市场的关系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有效需求”，尤其不是为了提高工人阶级的需求。相反，它们的“积极”目的是赢得对市场和“势力范围”的控制，即促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它们的“消极”目的是大规模地消灭那些“人类劳动能力的单位”——即工人阶级的成员——他们由于生产技术的不可阻挡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成为社会资本的剩余，否则就会形成一支庞大的、昂贵的、还可能是永久性的“劳动后备军”；同时也要摧毁大量有关的、技术落后的生产资料。

[6] L. Mises，《社会经济》

[7] M. Block: *La Theorie Marxiste de la Monnaie*, pp. 121-122.

[8] 同上

# 八. 扩大规模的生产，或共产主义的积累

## 1. 积累作为一种社会职能

到此为止，我们只把社会生产视为简单的再生产。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是这样进行的：用掉的所有生产资料和原材料再次被取代，而个人消费占了剩余部分。这种分配方式中，社会生产的总量保持不变，生产的商品净额不变；也就是说，社会并没有变得更富有。然而，“按需消费”原则所趋向的内在最终目的（这也是由人口的自发增长来推动的），它要求对生产设备进行必要程度的扩大，以便足以实现这两个目标。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到目前为止被认为是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数量会减少；现在必须把一部分产品投入到扩大生产设备的工作中去。**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个体生产者不能再从社会中获得个人劳动的全部收益。**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扩大生产设备或积累，是个别资本家集团的动机和责任。生产设备是否要更新以及更新到什么程度，只有它自己决定。于是，社会本身决定在未来的生产周期中从总的劳动成果里扣除多少产品或多少劳动时间，并投资于生产设备的进一步扩展。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进行这种扣除。普遍采用的解决办法，如在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匈牙利这两个例子中实际应用的办法，以及在理论文献中被赋予明确地位的办法，是通过在产品价格中增加考虑到的积累需要得到实施的。如果我们已经不厌其烦地证明，价格政策违反了生产者与生产者的劳动产品的直接关系的原则，1这与资本主义下发生的情况相同；如果这可以作为掩盖经济生活的真实状况的手段，那么现在就可以用完全类似的方式证明，通过这种手段，生产预算数目和控制积累的指数都会被掩藏在神秘之中。如果必需确定在简单产再生的需要之外，社会还需要部署多少劳动，以便投资扩大生产设备，那么，首要条件就是必须知道有多少劳动被用到了简单再生产中。

莱希特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努力，他把生产放在劳动时间计算的基础上，主张每个部分过程的生产时间都应该被精确计算。然而，由于他鼓吹价格政策，对整个劳动时间计算系统的可行性产生了偏见，他自己的观点已经变质了。生产单位可以对所有的局部工序实行最精确的簿记制度，并把折旧、原材料等所有因素都纳入其会计制度的范围——然而，最高管理层实行的“价格科学”必须庆祝它的狂欢，从而使所有这些必要的簿记毫无用处，使社会再次无法知道每个部分工序实际消耗了多少劳动时间。换句话说，不可能确定在全部再生产过程中消耗了多少劳动时间。因此，也就必然无法确定必须留出多少劳动时间来投入扩大生产设备。如果目的是把积累过程提高到自觉执行的程序的水平，那么，首先必须使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成为一个已知的数量，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察表明，只有通过普遍适用的公式(p + c) + L，才能确切地揭示和知晓这个问题。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这变成了：

在共产主义的未来，扩大生产设备的问题将成为社会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它是决定工作日长度的一个因素。例如，如果工人委员会经济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将生产设备扩大10%，那么这就要求从个人消费领域中撤出0.1\*(Pt + Ct)的大量产品。一旦与这些特殊积累措施有关的建设任务完成，生产就会按照1.1\*(Pt + Ct)+Lt的公式继续进行。

下一个要问的问题是：在实践中如何做到实施10%的积累率的一般决定？换句话说，如何从个人消费领域扣除？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我们研究简单再生产过程时，已经证明，如果个人消费按照以下公式进行，社会将消费整个社会产品：

（为了简化表述，我们在公式中没有包括混合型单位；原则上这没有什么区别）。

但现在，在新的情况下，个人消费必须减少0.1\*（Pt+Ct）的系数，因此，相当于L- 0.1\*(Pt + Ct) - (Pu + Cu)的大量产品仍可用于消费。在生产系统扩大10%的情况下，个人消费系数（FIC）将被修改如下：

通过这种方式，积累的过程被纳入到个人消费的因素中，从而形成了数量上等于0.1\*(Pt + Ct)劳动小时的一般社会基金，随着该基金的完成，工人委员会经济代表大会最初通过的总决定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充分执行。

## 2. 积累基金的应用

上述意见的意义不外乎是理论上的概括，即它们表明积累如何能够而且必须与个人消费系数充分、有意识地加以调节和整合。如果不这样整合，价格的增加将不可避免——换句话说，实际的生产时间将被掩盖。另一方面，在达到较高积累率的年份，例如10%，则需要比下一年（例如只有5%的积累）更长的生产时间，在一般生产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波动的生产时间，会在生产预算和产品分配方面造成无法预见的复杂情况。因此，对积累实施扣除的手段和方法是在经济过程本身中决定和解决的；它们是由支撑产品流生产本身的运动规律所规定的。因此，它们的运动被限定在明确的范围内。

另一方面，确定积累**比率**不是通过生产的物质过程本身来实现的，而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确定。在上述例子中，我们假定生产设备普遍扩大了10%。因此，从一般积累基金中可以得到0.1\*（P+C）的系数，用于扩大每个生产单位的生产资料。不需要某个当局的特别指示。生产的客观过程本身就很清楚地反映了任何一个生产单位提出的要求提取的积累基金数额。

然而，设想以统一的积累率扩大生产设备，是一种不真实的假设。在现实中，有些生产部门不需要任何扩展，而另一些生产部门的积累率则必须高于平均的积累率。因此，只有那些需要扩张的生产单位才应该被分配一笔积累基金，作为总GSU预算的一部分，这将被视为一项有用的原则。

然而，在共产主义初期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如果无产阶级在不成熟的时期偶尔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么它就必须紧紧抓住自己的权利，即使是以不合理的模式来决定和分配积累。决定性的因素是，在没有中央机关对**生产**行使控制权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有中央机关对**积累**行使控制权——在这个领域的控制权也必须掌握在生产者自己手中。

例如，一个不合理的分配积累的模式的例子是，假如每个生产单位都得到10%的（P+C）增长，而不考虑在经济发展的任何特定阶段，这种增长有多少是真正必要的。如果这样的工业单位构成一个生产集团或“行会”的一部分，那么，实施这种措施的实际结果将是，相关的工业单位将共同采取措施，为整个行会形成一个积累基金。然后，相关的工业组织将决定以何种方法和对哪些工业单位应用这个基金。在一种情况下，他们可以决定对生产力低下的企业进行更好的装备，以便使它们达到平均生产力水平，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更合理的决定可能是不增加任何新的物质资源，而是采取措施完全消除相关的企业。然而，如果要避免像在匈牙利发生的那种破坏生产力的情况，制定这些决定的权力必须掌握在生产者自己手中。在每一种情况下，生产的扩大或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设备量的扩大或其技术水平质的提高存在有机联系的因素——必须是生产者自己有意识地采取措施的结果。

此外，也有可能整个生产集团不需要扩大其生产工厂和设备，因为它已经完全有能力满足社会可能向它提出的一切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有关的工业组织就有可能作出决定，把它们全部的积累基金交给那些需要特别大幅度扩张的工业单位使用。

在共产主义经济的初级阶段，不进行积累的决定可能会经常发生。因为共产主义将需要一种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对工业资源的处理方式。许多类型的工厂将成为多余的，而另一些类型的工厂则太少。随着共产主义经济的建立，生产服从于实际需要的问题被推到了关注的前沿；于是，庞大的组织的和技术的劳动开始了，这几乎不可能没有分歧和摩擦。由于资本主义所钟爱的、非常幸运的“市场机制”（据说几个世纪以来，它使生产与需求相匹配），无产阶级在获得社会权力的那一刻，就背负着一个生产机关，在这个机器的运作中，至少有一半需要消耗的劳动能力是浪费的和非生产性的，而且它与数百万工人的实际需求不匹配，而只匹配他们内在的有限购买力：

“同样，在那些从事一般加入收入的消费品生产的工人中，将有较大一部分人用来生产供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及其仆从（国家、教会等等）消费——即花费收入——的物品，而较少一部分人则用来生产用于工人收入的物品......如果工人居于统治地位，如果他们能够为自己而生产，他们就会很快地，并且不费很大力量地把资本提到（用庸俗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他们自己的需要的水平。”（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第十八章，“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见《马恩全集》二十六卷，第二册）

因此，生产向满足需求方向的转化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整个生产机关的转变。那些只为满足资产阶级短暂的奢侈要求而工作的工业单位被关闭，或尽快进行重组，以便使它们能够满足工人的需要。在战争期间和结束后的几年里，我们有机会观察到这种重组是如何迅速进行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大部分生产设备被转用于生产战争物资，只是在1918年后为了“和平生产”的目的再次进行了重组。此外，让我们顺便指出，每当任务变成组织生产以满足其“特殊需求”——尤其是战争需求——时，资本主义本身就会关闭其著名的市场机制!

尽管伴随着巨大的困难，向共产主义经济的组织转型可以相对迅速地完成，这时，满足衣服、食物和住房等主要需求就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首先，特别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总的生产性资源的相当一部分可能会直接用于生产那些用于建造住房和居住设施的材料——在资本主义下，这是无产阶级生活中常年稀缺的资源，而在共产主义下，这种资源需要尽可能迅速地扩大。简而言之：整个生产机关根据需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一点通过消费合作社的工具性质表现出来。

因此，共产主义生产的第一个阶段和最初阶段的特点是经济中某些部门的显著增长和其他部门的显著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年轻的共产主义经济的所有部门来说，都不可能有积累率同质（homogenous）而统一的问题。然而，无论经济基础的急剧转变可能带来什么麻烦，无产阶级都不应该受到诱惑而放弃自己与生俱来最重要的权利：对生产机关（apparatus）和积累基金的支配权。即使一种对后者不经济、合理的分配方式，如果发现是服务和应用这一更高原则不可避免的结果，那也是合理的。

## 3. 积累的特殊形式

除了工业组织向积累基金提出要求，以这种标准形式扩大生产机关外，还有其他特殊的工业任务，如建造桥梁和铁路，扩大主要公路干线，建造海防屏障等。这些任务一般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在这期间，社会提供了最多样的产品、材料和消费手段，以满足从事这些工作工人的需要，而与此同时，却没有生产出可能补偿社会所提供资源的产品。这种特殊形式的生产机关的扩展，消耗了社会总产品的一小部分。因此，在经济代表大会上有大量的辩论将是必要的，它们需要就这些建设任务的规模做出决定。这样，整个社会在迈向更高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巨大的步伐，因为生产设备的生产力越能得到提高，社会需求越容易得到满足，社会履行最复杂和最发达职能的能力就越强：

“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一样，在劳动期间较短的生产部门，工人将照旧只在较短时间内取走产品而不提供产品；在劳动期间长的生产部门，则在提供产品之前，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取走产品。因此，这种情况是由各该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造成的，而不是由这个过程的社会形式造成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第十八章）

“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末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二篇，第十六章）

在上述段落中，问题被阐述得非常清楚，同时也给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解决方案。然而，这不过是一个松散和笼统的解决方案，它仍然需要被赋予更具体的形式。在这里，争论的观点之间又一次出现了分道扬镳。一边是社会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的国有化或中央经济管理方案的捍卫者，另一边是自由平等生产者联合体的代表。正如当代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是为必要的社会成本做准备的重要工具一样，它也认为这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必要条件。

根据社会民主主义或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整个经济的中央管理机构相当武断地决定整个生产和分配制度所要采取的发展方向，因此也考虑了上述的那些特殊情况。事实上，这个问题形成了一个主要论点，实用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倡导者相信，通过中央集权的控制部门，即国家，来管理整个经济的必要性已经得到了证明。他们指出，只有当整个生产体系由一个专制而主观的权威自上而下地监督和控制时，才能避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因执行这些任务而发生的危机和其他社会动乱。而且，这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无论是在资本主义还是在国家社会主义下！因此，对于这类“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就证明了国家必须在所有技术、组织和经济方面管理和经营整个经济。国家为了控制生产和分配而采用的、为了随后解决它所面临的上述问题而通过用纯技术性-组织性的手段——即补充性的方法——所组成的装置来代替它（应当指上述的问题——译注）——这些方法我们可以在经常引用的希法亭的方案中找到：

“依据现有的自然和人工的生产条件决定制造新产品的方式、地点、数量和手段的，是家长或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方的和全国的委员会。他们或者由现身经验而熟知家庭的需要和资源，或者借助有组织的生产统计和消费统计的一切手段把握社会的需要，从而以自觉的预见、按照他们自觉地代表和领导的共同体的需要，组织整个经济生活。”（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第一篇，第一章）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这种统计数字在多大程度上和在什么目的上是足够的，在理论领域里，它们只不过是一个集中营式共产主义的蓝图，而在实践方面，它们又必然会因此而崩溃。然而，除此之外，很明显的是，这种统计数字只有在通过社会簿记的方式建立在经济调节和控制体系的基础上时才会有作用。一个表明消耗了多少吨煤、粮食、铁等的统计系统，无论是按数量、按重量还是按任何其他计量单位，以及就任何商品而言，对于社会调节生产和分配的目的来说，都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出许多复杂的指数和公式，如果基本的计量单位不是一个基于社会关系的单位，不是表达了**生产者与产品的关系**的单位，那么，为调节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而设想的每一种统计方法只能是**毫无价值**。社会革命的全部意义和目的恰恰在于，它关注的是改变，实际上是颠覆，并将现有的资本主义下生产者与产品的关系**颠倒过来，踩在脚下**。卡尔·马克思的伟大成就在于，他认识到这种关系的全部历史意义，并把它发展成为一门应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确科学。随着社会秩序的转变，生产者与产品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而新的生产方式恰恰需要对这种社会关系进行新的定义。

社会革命确保了这种新的关系，并将其置于坚实的基础之上，它向每个工人提供了与该工人交由社会支配的劳动时间相一致的社会产品的要求。这场革命在整个社会建立了劳动时间计算和核算制度，作为实现这种新关系的工具。

统计机关的主人们甚至一刻也不考虑建立新关系的可能性，因此他们甚至没有想到要引进劳动时间计算系统。相反，他们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旧有的类别和方法，如市场、价格、商品、货币——用这些工具甚至不可能确保对简单再生产的控制。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对某一特定生产部门消耗了多少劳动时间没有丝毫概念，更不知道为了实现简单再生产而消耗了多少劳动时间！

一个国家共产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也许能找到一种方法来预先计算“它可以使用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而不对任何其他经济部门造成任何干扰——例如，在较长时间内建造铁路而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或其他有用的社会服务的补偿供应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这对这样一个社会制度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些问题必须而且一定会用资本主义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通过混乱和武断的经验法则。因此对其他生产部门造成的损害必须通过手头的任何手段加以弥补；显然，这没有提供任何解决方案；事实上，这相当于让事情保持在旧制度下的状态。

共产主义不能采用这种方法，而且它也没有必要这样做。通过精确的计算方法，有可能计算出每一种商品或服务的再生产所需的确切时间，无论是一公斤糖还是一场戏剧表演，无论是整个生产部门还是整个经济生活本身；与此同时，公开宣布的积累率沿着坚定和明确的路线进行。通过同样的手段，社会就有可能准确地确定它能在大型工程中投入多少劳动时间，同时排除任何主观因素的影响，使其无法获得社会控制。此，这个问题也在一个系统中找到了具体的解决方案，这个体系建立在对生产者和产品间关系的精确定义的基础上，通过一个劳动时间计算系统来实现，并通过工厂和其他工业组织——工人委员会——的代理来实现。

例如，如果证明有必要建造一条新的铁路，那么第一步就是制定预算，在预算中说明这项工作将消耗多少劳动时间，以及将在多少年内完成。如果工人委员会经济大会决定启动这项行动，那么社会就有责任提供必要的资源。当然，这项行动将被归入GSU类别，要完成它将需要，例如，3-4年时间，因此，在这期间，将消耗各种产品而没有任何补偿能力提供任何服务作为回报。但是，一旦知道了每年要花费的劳动时间的数量，就可以从GSU账户中的个人消费系数（FIC）中扣除，社会就从一般生产中提供了相当于预先生产这一特殊积累单位所需的劳动时间的总产品。这样就避免了对其他生产领域一切可能的破坏或干扰，同时又不侵犯生产者与产品之间的确切关系的原则。

单从涉及的经济因素看，问题也就解决了。有待解决的只有组织和技术问题以及人力资源的适当分配。在这里，我们只能提出最一般性的意见，原因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解决方案不再属于共产主义经济理论的范畴，而是有无数形式和不断变化关系的人类社会实践中的一种。因此，我们不可能事先准确地确定包裹在一般性中的特殊性会采取什么形态。

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只满足于这样的一般看法：一旦社会决定开始进行特殊的建设工程，如修建铁路等，并通过将必要劳动时间的社会产品纳入GSU账户中，它就同时决定了对必要人力劳动资源进行相应的重新组合。

为了使这一范畴具有可理解的形式，我们首先必须在头脑中设想以简单再生产为基础的简化的共产主义经济模式。从分配组织提交的定期发生的需求中——它当然行使了将整个经济中传达到自身的无数个人需求结合起来形成单一组合的总体的责任——产生出了一个适合于满足这些需求的生产机关。如果在我们的简化模型中同样假定，由于生产的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引起的生产机关的变化不会发生，那么，许多有关工业单位的这种相互结合和对彼此需要的调整，将使人们有可能设想这种生产机关处在一种**实际上的静止状态**（*virtual immobility*）。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资源的分配也将是固定的，因此，作为一个自然的过程，个人从一个工作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工作地点似乎很有可能，而且是例行的。

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出现这种情况，当然纯属想象；现实就意味着它将不断远离这种状况。当然，这就是在标准积累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一般认为标准积累是以有规律的和均匀的比率进行的。生产设备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并使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发生必要的相应变化。在不规则和不均衡积累的情况下，这些变化将具有波动性；但是，在劳动力资源的分配方面几乎不可能出现社会困难。资本主义从工业后备军的蓄水池中通过强制条件获得的东西，共产主义将通过自由生产者行使的自然活动冲动和创造性的主动获得。

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有理由认为，像上述这些的特殊建设活动不会给共产主义社会带来像它们带给资本主义的那些困难。当然，这与生产者进行这种特殊工程的意愿有关。毕竟，是他们自己通过他们的相关组织做出必要的决定。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用资本主义术语表示，是否有足够的劳动力资源来进行这种特殊的建筑作业。我们特意强调“用资本主义术语表示”，因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通过工业后备军利用剩余劳动力的储备，而这种东西在共产主义下将是一种病态。因此，每当共产主义试图组织这种特殊的建设活动时，它也必须鼓励将劳动力资源从一个或另一个就业领域重新部署到新的就业领域；换言之，必须发生劳动力资源的重新组合。

然而，这种重新组合的程度和要释放出这些劳动力资源的生产领域，属于开展有关建筑工程并相应减少个人消费系数（FIC）这一事务的有关方面，而这项事务已经在工人委员会经济代表大会的相关决定中得到了体现。因此，个人消费领域减少了对生产的需求，减少的是计算出的每年为手头进行的特定特殊建筑工程的预生产（pre-production）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总数。因此，可以从这些受影响的领域中获得获得预定的铁路建设工程等所需的劳动力资源。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就这些特殊的建筑工程而言，它们所需要的工业资源的范围和规模，以及这些资源所属的生产领域，从长远来看，将成为经济程序标准化的对象。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在分配生产资源时就不会出现任何明显的转移，从而使这种特殊建筑工程所需的劳动力资源或多或少处于永久可用的状态。

[1] O. Leichter: *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n der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p. 31.

# 九. 一般社会核算体系作为经济过程整合的模型方法

## 1. 劳动时间作为生产预算的基础

我们已经多次提到过希法亭的观点，即社会生产机关的集中模式，这是资本统治本身的结果，也就是说，总卡特尔。如果我们再次重复这一点，那是因为我们在其中发现了社会生产的最纯粹的可能表现，那是因为我们在其中发现了通过一个有组织的单位进行社会生产的可能最纯粹的表现，因为这将根据社会民主主义和国家共产主义经济学家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所阐述的学说而形成。相关段落如下：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将由一个主管机关自觉地进行调节，这个机关决定它的所有领域内的生产量。于是，价格决定成为纯粹名义上的，仅仅意味着总产品在卡特尔巨头为一方和大量的所有其它社会成员为另一方之间进行分配。那时，价格将不再是人们之间发生的物的关系的结果，而成为物在人们之间进行分配的单纯的计算方式。于是，货币失去了作用，因为要完成的是实物的分配，而不是价值的分配，所以货币会完全消失。随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消失，物的外观的消失，商品的价值对象性消失，从而货币也消失。由卡特尔分配产品，物质生产要素被再生产出来并用于新的生产。在新产品中，一部分分配给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其它部分留归卡特尔随意使用。这是一个以对抗形式进行自觉调节的社会。但是，这种对抗是分配的对抗。分配本身被自觉地调节，从而使货币的必然性消失。这样，在它的完成的形式上，金融资本脱离开它赖以产生的土壤。货币流通变得不必要了，货币的不息流动达到了它的目的地，即被调节的社会。流通的永动机找到了它的最终归宿。”1（《金融资本》，第十五章）

这段话大胆的用轮廓对一个经济体进行了生动的描述；生产和再生产在一个单一的组织中融合在一起。这在今天资本主义巨头财团的指导下存在——明天国家接管这种结构的指挥权又有什么障碍？但希法亭也宣称，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范畴——价值、价格、货币、市场——并通过建立在这种体制基础上的经济组织而变得毫无意义。但同时，他也没有说什么来代替这些范畴。然而，他确实宣称，在“总卡特尔”的情况下，资本巨头将通过对金融资本的控制进行统治，而在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国家专员将“利用所有统计科学的手段”2来决定和管理经济过程。尽管希法亭不愿在这些问题上明确表态，但人们还是必须把他列入“自然”3经济学派，纽拉特、沃尔高等人也必须包括在内，他们将试图通过臭名昭著的生产统计和消费统计的来控制生产和分配过程，而这种制度不需要应用任何社会调节和控制的经济单位。当我们考虑富尔的《普遍幸福》体系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品牌的“社会主义”将拥有哪些特征。

没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这种经济的不可能性；我们只需要补充一点，即哪怕是希法亭所描述的“总卡特尔”，也无法在缺少对经济调控的计算单元的情况下进行管理。如果希法亭已经清楚地证明了，在一个自觉运作的经济中，金钱是怎样变成多余的，那么同样清楚的是，只有劳动时间可以替代金钱。共产主义经济必须建立在劳动时间计算的基础上，因为任何其他单位的会计控制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必需计算“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编，第四章）。正如我们对考茨基的批评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不可能从中央经济部门的办公室进行的。因此，与劳动时间计算有关的程序必须通过工作地点——工厂、车间、办公室等当地组织本身的机构来实现。一种以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计算为基础的、毫不妥协地实施并应用于有形产品和服务的社会会计制度，为生产者-消费者的整个经济生活的系统安排、指导和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4

社会平均生产时间的范畴，正如这里所阐述的那样，完全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运动和发展起来的，严格应用这一范畴就可以使经济生活整体有机地结合起来。经济有机体作为一个系统出现，在这个系统中，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所有对抗性的动机都被消除了，也就是说，作为一种专门为促进整个人类同达尔文主义丛林的力量作斗争而设计的制度。在这个体系内，产品流完全按照劳动等价物所确立的运动规律进行运动：“一定数量的另一种形式的劳动可以换取同等数量的另一种形式的劳动”。在生产链的末端，可供消费者处置的成品，其生产所需的，从一开始到最后的全部生产时间，既不多，也不少。

调节产品流所需的簿记程序，目前还没有延伸到它所属的个别工业单位或生产部门的范围以外，而且主要只与投入和产出有关，也就是说，与通过工厂的产品流有关。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要指出，这与以工厂为基础的成本会计方法没有任何关系，近年来，这种方法本身已经成为一门科学。为此，必需对不同工业单位的不同具体生产过程进行专门的了解；这旨在为借贷类型的会计科目记录系统（an entry recording system of the debit and credit type）提供所需的数据。然而，在一个由合格的技术人员确定生产时间的系统中，办公室工作人员只需要记录借项和贷项的变动。

在不同的生产单位之间进行费用结算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预先发展起来了，其形式是通过银行或结算所进行的简单的转账核算（transfer-accounting）。关于适用于共产主义经济的结算方法，莱希特宣称：

“由其他生产企业提供给一个生产企业使用的所有被生产所需的材料、所有半成品材料、所有原材料、所有辅助材料，都计入后者的费用。至于是通过用劳动券表示的劳动时间的形式进行现场结算，还是采用总分类账控制（ledger-controlled）的收费方式，即免除‘现场结清（spot-payment）’的总分类账控制收费方式，这个问题最好通过实践本身来解决。”5

在这个问题上，实践确实会有决定性的发言权。然而，原则上必须说，通过劳动券实现的“现场结算”的支付方式将是一个根本上错误的解决方案。首先，它没有实现根本目的，其次，现场或“现钞（cash）”的结算方式会严重阻碍社会对生产的监管和控制体系。

劳动券介入生产单位之间关系完全是多余的。在每一个工厂交付其最终产品的情况中，它都将(p + c) + L数量的劳动时间传递给了被部分完成的使用价值组成的链条中。然后，接收单位必须立即以新的p、c和L的形式加工处理这些劳动时间，以便下一个劳动或生产过程可以开始。因此，根据这一制度对生产进行管理，则只需要对产品流进行登记，因为它流动于整个社会生产系统中。劳动券的唯一作用是作为一种手段，使所有类别的个人消费都能根据劳动时间的尺度进行调节。在日常经济生活中，任何单个劳动单位的总“产出”的一部分已经通过社会化分配即再生产的过程被消耗掉了，而这一总量中只有一定的比例能够以劳动券的形式进入单个消费者手中，并按照印在各个消费产品上的生产时间来消费。我们已经注意到，随着分配社会化过程的进行，发放的劳动券的数量将不断减少，最终将达到零。

个人消费系数的确定是最真实意义上的社会簿记。一方面，在社会的贷项（credit）出现了代表生产单位直接花费的劳动时间的数额：L。可以在一般社会簿记系统中的结算账户的标题下立即找到这个数字。另一方面，Pu、Cu和Lu的数目在这里作为借项（debit）出现。因此，社会从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整体中建立了一个社会一般簿记系统。（credit使社会的财富增加，对应会计中的贷项，debit使社会财富减少，对应借项——译注）

正是通过这些方法，马克思的以下段落变成了现实：

“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6

这是纯粹而简单的簿记，只不过是记账而已。虽然它是所有经济过程的各个环节汇集在一起的中心点，但它对经济体系没有任何权力。一般社会簿记系统本身就是一个GSU或“公共”类型的经济组织，它的职能之一是通过计算报酬系数或个人消费系数（FIC）来调节个人消费。它既没有赋予经济系统任何管理或行政的权利，也没有赋予任何对经济系统进行处理的权力。这些职能完全掌握在生产者-消费者手中。位于负责一般社会簿记的单位中的当地工人委员会只在一个这样的单位中拥有权力，那就是这个单位自己。然而，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或那个法令，甚至也不是因为它以任何方式反映了在交换和结算所工作的工人的任何善意，而是由经济过程本身客观地决定的。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是因为，每个经济单位或生产部门都对自己的再生产负责，而且每个工人个体通过个人的劳动贡献，同时决定了他或她与社会产品间的关系。

[1]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十五章

[2] 同上，第一章

[3] “......‘自然’经济学派......”这是指那些主张在易货贸易或实物交换的基础上建立新经济关系的社会主义或安那其工团主义理论家。

[4] 段落结尾：“一种以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计算为基础的......社会会计制度，为生产者-消费者的整个经济生活的系统安排、指导和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考茨基——实际上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中几乎所有其他的专业知识分子——对经验主义的间接经济控制方法的偏爱，体现在庞大的官僚国家机器中，其基本特征是外部强制的方式，通过这些形式实现生产和分配机器对生产者的统治，这本身就是这一阶级特有的小资产阶级的、决定论的世界观之症状，而且是表明其与资产阶级本身密切相关的一种症状。当然，后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实现了对完美的社会和经济管理机器的渴望，这种渴望充满了这些机械决定论的国家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梦想。

[5] O. Leichter: *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n der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p. 68.

[6]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篇，第六章

# 十. 一般社会簿记制度作为经济过程的控制制度

## 1. 主观行政决策的控制方法

在一般社会簿记系统的各种功能中，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提到了产品流的登记；报酬因素或个人消费系数的确定；以及劳动券的发放。现在，我们还将把对生产和分配的控制职能纳入其一般权限范围。

很明显，这种控制手段所采取的形式与整个经济的基础密切相关。在国家共产主义的情况下，整个经济生活受制于主观规范和统计数字的调节，控制也作为行政决定的一种职能出现。在以自由平等生产者协会为基础的制度中，劳动时间的计算是生产的基础，所有产品的分配是由生产过程本身客观决定的，实施控制的过程也具有确切的形式。这样的控制系统考虑到了生产、再生产、积累和分配所代表的所有独立要素，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进行。

沃尔高在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政策问题》（*Die wirtschaftspolitischen Probleme der proletarischen Diktatur*）一书中，向我们描述了在国家共产主义制度下是如何实施控制的。他写道：

“对工程管理和国家财产方面的日常事务管理进行控制，这将是集中组织起来的管理层之责任范围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在俄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轻率地对待国家财产，对待资产阶级不被征用的财产，首先是源于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利己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长期战争特别削弱了道德意识。然而，在这方面起作用的另一个因素是，普遍存在的对新的财产关系不清楚的现象。那些负责管理被征用的工厂的无产者，很容易认为这些工厂是他们自己的财产，而不是整个社会的财产。这就使得顺利运作的控制系统更加重要，因为它同时也是一种极好的教育手段......”

“社会控制的问题在匈牙利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以前为资本家服务的巡查官，由于接受法官和中学教师的这一职能的培训，人数有所增加，这些巡查官作为国家雇员，被汇集到人民经济委员会下的一个特别部门。这一部门被划分为若干专业小组，以便同一巡查官对属于特定工业部门的工厂永久负责。控制的范围不仅包括财政费用和物资税，而且还涉及劳动力的正确配置，以及对业绩不佳或一般不令人满意事项的原因之调查。负责的巡查官定期和当场对工业单位本身及其相关的簿记和其他办公室进行检查，并起草一份报告，其中不仅包括所发现的缺陷，而且包括可能的改革建议。巡查官本身对分配给他们的工厂没有任何处置权，而只是将他们的报告提交给主管的组织机关。与此同时，巡查官、生产委员和工厂委员会之间很快出现了合作形式。巡查官的建议往往被自觉遵守。甚至还出版了一份杂志《视察员公报》，所有被征用的工厂，对澄清工人本身工厂管理的组织问题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系统性控制的结构不仅扩大到工厂，而且还延伸到所有人民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内。”（pp67-68）

沃尔高在这里所说的“对生产的控制”，实际上是将两个完全不同的职能合并在一个标题下的结果。一种是簿记意义上的控制——对账本的控制。这仅仅是一个借方和贷方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也与技术控制问题有关；这涉及到持续不断地在所有阶段提高生产的经济合理化（rationalisation）程度，与此相关的是在每个生产单位中实现尽可能高的效率。

在沃尔高那里，这两种根本不同的职能都被统一在一个控制机关中，这对于共产主义经济来说是根本错误的。这一点将不言而喻——顺便揭示了沃尔高所描述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真实特征——当我们考虑到对生产过程的控制系统清楚地表明它由两种不同的职能组成：一方面是经济合理化措施，另一方面是以簿记的形式记录这些措施的结果。控制卡片系统、时间表、泰勒制和速度越来越快的生产线构成了标志着这种经济合理化制度进展的里程碑，这种系统同时也是一种控制系统——但这种控制系统是为一种优越的权力服务的，使其有效地控制处于其支配下的劳动。在这些条件下，对生产的控制意味着对生产者的控制，以确定他们的劳动成果是否有足够的利润，是否产生了足够的剩余，满足统治经济的指挥者的目的。这种控制形式具有支配生产者的制度的特点。

## 2. 客观的控制方法

在一个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社会中适用的生产控制方法是一个根本不同的方法。也会有与工作过程和劳动过程的机械化有关的措施，如生产线，但现在这些将是实现和实施最佳工作方法的技术措施，工人们自己也希望在他们各自的生产单位中使用这些方法。情况就是这样，因为不是中央指挥机关挥舞着鞭子站在这些措施的背后，其动机是实现尽可能多的剩余，而是工人自己的自主利益，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每一次提高，同时也增加了可供整个社会使用的有用物品的总量，所有劳动者对这些物品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正是在这里，负责社会管理和控制生产的单位开始执行任务。社会簿记系统，当然是各生产单位所有收入和支出的清算所，必须监督产品的流入和流出，以确保它们符合为每个生产单位确定下来的生产力标准。由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经济秘密，而且由于社会簿记办公室定期发布的报告相应地公开了每个独立生产单位的生产情况，因此控制的问题就解决了。它不再是一个问题。

哪些组织负责在既定程序失败或偏离的情况下进行干预，以及哪些组织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该采取的措施，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它应该属于技术-组织方法的范畴。

**因此，在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生产者社会中适用的生产控制系统，并不依赖于官员和当局的主观决定，而是通过对客观生产过程本身发生的运动或取得的进展进行公开登记而变得有效；*换句话说，生产是由再生产控制的。***

现在，我们将试图通过一个示意图来说明会计控制体系将采取的确切形式。让我们首先从基于社会平均生产时间的生产过程开始考虑。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范畴的具体实现是类似生产单位的横向协调。我们将属于一个特定生产集团的单独的生产单位称为工厂1、工厂2、工厂3……等等，到工厂N，并把它们的生产总量=t，然后下面的和给出了他们的总生产率：

工厂1 ... (p1 + c1) + X1 kg产品

+工厂2 ... (p2 + c2) + X2 kg产品

+工厂3 ... (p3 + c3) + X3 kg产品

+工厂n ... (pn + cn) + Xn kg产品

=

总生产率 (Pt + Ct) + Xt kg产品

因此，每千克产品的社会平均生产时间为：

社会平均生产时间 =

即使在一个生产单位生产多种产品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适用于每种产品的生产成本系数，轻易地计算出这些产品。

因此，社会平均生产时间（ASPT）这一单位作为衡量生产力的单位是有效的，而适用于每个单位的生产力因素（productivity factor）则由偏离平均生产时间的程度决定（见第四章）。从上述公式中还可以得出许多其他数据，例如，P、C和L的社会平均使用量，其本身就允许在比较性的评价单独生产力因素的准确性方面有一定的余地。因此，在这方面，生产集团不需要国家控制员或审计员，因为需要调查的因素属于联合生产者本身的能力范围内。因此，社会平均生产时间单位本身就被证明是一个完全可行的控制工具，供整个生产合作社使用。

现在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当生产合作社成立时，生产者是否不可避免地要失去对生产的控制权；换句话说，一个中央集权的集团权威是否必须理所当然地把对生产的一切权力归于自己。毫无疑问，危险在这里潜伏着，因为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仍然存在着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承下来的强大倾向，使控制权集中在一个中央权力机关中。例如，在生产合作社的例子中，几乎肯定会有人试图把使用积累基金的权力交给一个中央管理机构。如果这真的实现了，独立的生产组织将不再有任何决策权。也有可能有人会尝试为每个生产集团建立这样一个中央管理机构，然后这个中央当局将有权把生产任务分配给各种相关的单位，以及对最终产品的控制权。这样一来，本地的工厂或工厂组织将仅仅成为中央行政部门的执行机关，对他们来说，这将意味着维持单位内部的簿记制度才是它们唯一必要的任务。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将取决于生产者本身的洞察力和力量。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同这些倾向进行激烈的斗争，就不可能取得进展。不管有什么好听的口号，独立的管理和控制仍然是强制要求，自由生的产者绝不能放弃。

因此，生产单位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出现，它与其他生产单位和消费合作社的关系得到了巩固。这样，生产者就把全部责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也就有了使独立的行动和呼吸得以自由的必要余地，解放了的劳动群众的创造性力量能够充分发挥。因此，横向协调制度的意义不过是一个会计控制的问题，它对于确定社会平均生产时间，以及与此相关的组成合作社的各独立生产单位的生产力之程度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让事态在这个发展阶段保持静止，还必须建立一个技术上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的过程。无论这个过程本身多么重要，它都必须从属于对独立控制的决定性和原则性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同意莱希特的说法：“乍一看，人们会认为每个独立的生产单位或多或少都是独立的；但是，只要再仔细看一下，就会很清楚地认识到，每个独立的生产单位......都有一条脐带与经济的其他部分相联系。” 然而，在现实中把“每个独立的生产单位与经济的其他部分结合起来”的这种普遍的、具有全面调节作用的纽带是**生产和再生产的公式**（formula）。正是这一点将所有工业单位置于同一基础之上；为确保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而进行的生产，是联合一切生产单位的共同基础。

## 3. 通过对产品流的登记进行控制

现在，我们有必要暂时回到生产的社会控制问题上。随着社会关系的革命性转变，生产资料中的私有产权被消灭了，这些财产变成了共同所有。工业组织的法律关系于是变成了工业组织以行政能力接受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这意味着，工业组织要公布它们的库存，然后说明它们打算如何配置它们的生产资料；这相当于它们向社会簿记办公室提交一份以“（P+C）+L=X千克产品”的形式制定的生产预算。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簿记制度的需求随后发现，其实现形式是生产预算的总和：“他的账本（即社会——本文作者）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如果社会总库存是以各种生产预算的总和的形式提供的，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很明显，各种参与单位也随之处于社会控制之下。工业单位的生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方面，作为投入，各种产品流入单位（包括劳动力），另一方面，它们可以以一种新的形式离开单位（产出）。然而，这种物质价值的每一次转变，都以产品交换的形式登记在一般的社会簿记系统中，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随时了解任何特定单位的收入和支出、借方和贷方的情况。单位所消耗的一切，如生产资料、原材料或劳动券，都作为入账出现，而转移给社会的一切则作为出账出现。作为连续的流，这两者必须完全对应，必须相互抵消。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随时对生产是否顺利进行以及顺利之程度进行即时检查。

例如，如果在任何特定的生产部门出现不正常的盈余，社会簿记办公室可以随时向适当的控制实例（instance）（也许是一个联合生产委员会）立即进行报告。过剩不可能是由于有关工业单位在交付产品时计算的时间超过了正确的社会平均生产时间而产生的，因为后者是公开的。因此，它必是由于生产预算中的一个错误造成的。如果证实错误确实存在于此，那么就同时确定了这一事实，即有关单位一直在比生产预算中估计的更高生产力的水平上运行；因此，须向上修正其生产力因素。

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社会簿记系统显示，某个工业单位的产出出现了赤字。这就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导致对生产力因素和该单位的单独生产要素p、c或L的修正。这些因素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的广泛利益起作用，可以通过公式来确定：

与该单位的生产预算相关联。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的适当单位在实践中证明，在生产控制方面发生了实际疏忽的情况，那么就会根据社会规定的适当法律条文，对有关单位的行政部门采取措施。

（原文：in association with the establishment’s production budget. Should it be shown in practice and proved by the appropriate organ of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that an actual casse of negligence in production control has occurred, measures would then instituted against the establishment administration in ques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ropriate legal enactments laid down by society.）

在这种基于社会簿记的简单控制系统之中，作为生产过程本身的必然结果而自动进行的，还出现了另一个控制机构，它的运作是相当无情和不灵活的：再生产的过程。如果我们假设一个生产单位把它的社会平均生产时间计算得太低，那么我们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生产过剩的单位能够有效地进行再生产，但它们却无法弥补生产不足的单位的亏空。后者发现自己无法进行再生产，于是在根据现有数据重新计算社会平均生产时间的真实数字期间，社会就有必要进行干预，从GSU总预算中补足缺失的资源。

反过来，如果由于采用了过高的社会平均生产时间的数字而在一个或几个单位中出现了过剩，不需要很长时间，这种错误就会被发现；相反，它将相对迅速地被揭示出来，这正是因为该系统将两个相反的流，一个传入和一个传出，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相对于彼此进行测量。在给定的持续时间内，这两者必须准确地对应并相互抵消，然而在较短的时间段内，这只在一定的限度内才会如此——这种程度可以通过实践相对容易地确定；然而，在所有的情况下，自动控制系统是通过再生产系统发挥作用的。

只要我们通过这些观察进行了研究，表明社会簿记系统如何能够立即对生产过程进行全面调查，我们现在就可以深入了解它将生产方式的其他不同类别也置于其控制之下的手段。

首先，通过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控制生产公式中以字母L表示的劳动力范畴。有关工业单位只同意发放那些代表了被自己直接消耗的劳动量的劳动券。如果我们考虑到生产预算也是由社会簿记办公室维持的，那么以下几点就会立即显现出来：（1）所显示的与发行的劳动券有关的支出数目是否在预算规定的范围内；或者（2）所发行的劳动券与所消耗的原材料或所交付的最终产品的数量之间的关系是否与生产预算中所表明的关系一致。例如，我们已经知道，比如说，每个矿工将生产多少吨煤，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生产单位将直接消耗多少劳动时间。

对生产资料的有效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困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区分固定生产资料和流动生产资料。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则是，流动资料被完全吸收到产品中，而固定资料在任何时候都只被部分吸收。然而，完全相同的使用价值在一种情况下可以出现在p类中，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可以出现在c类中。那么，社会簿记办公室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该特定的条目应该被归入p类还是c类。例如，如果作为一项规则，在订单上附加一个说明，指出有关项目应记入p类还是c类，就会消除这个困难，就像目前习惯于在支票付款或汇款时指出汇款的目的一样。

然而，这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而是社会簿记办公室关心的问题。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构成生产公式（p+c）+L的各个范畴可以顺利而不受阻碍地进行适当登记，以便在必要时对每一类别分别进行监督和控制。特别是c类只能在生产预算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并且必须与L类以及生产的最终产品保持正确的关系。因此，原材料的任何浪费都可以被揭露出来，不仅是有关的生产部门，而且还有社会簿记系统。

如果我们现在考虑p类，我们会发现，正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困难。像机器、建筑物等这样的物品，只有在经过大约10到20年的时间后才会被吸收到产品中，同时，在这段时间里，它们通过维护工作、修理等手段，保持着可利用的状态。如果我们假设平均折旧期为10年，那么每年都要注销总生产时间（production duration）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每年都有部分要流进公式（p+c）+L。只有在十年之后，固定的生产资料才会被完全折旧，并再次到期更新。

如果我们现在简单地考虑一下社会控制系统的特点，那么就生产单位而言，就一些不同的类别而言，生产实际上是自己控制自己。首先，生产预算（p+c）+L的计算是否普遍正确，以及每一单独类别是否在预算指定的范围内变动，这些都是可以立即确定的指标。其次，对生产的产品数量进行控制；其结果表现为对有关生产单位中有效的平均生产时间的控制，以及对整个社会适用的平均生产时间的控制。从前者与后者的比值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数字：在这种情况下，该数表明了对生产力因素的控制力。

因此，整个控制过程无非是各种使用价值的转让和同意对劳动券的发行，也就是说，**生产的客观过程本身**，对生产方式进行了核查和控制。接下来，我们有生产的最终产品，即客观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使个别工厂或车间的平均数、社会总体平均数以及由此结果表明的生产力受到整个社会的公开核查。此外，由于把相当于被发行劳动券的数量和所生产使用价值被的转移量也计算在内——也就是说，通过生产过程本身的客观过程——分别构成公式（P+C）+L的每个范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最后，代表和包含了**整个客观生产**的再生产过程（扩大的积累），保持着准确的最终或后续控制手段。

在社会平均生产时间被计算得过低的情况下，有关的生产合作社将无法进行再生产；另一方面，在它被计算得过高的情况下，将出现不可能通过当前生产吸收的盈余。

# 十一. 对一般社会用途单位(G.S.U.)或公共机构单位的控制制度

对GSU（公共）单位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与生产单位的控制平行。这尤其适用于对组成生产公式（p+c）+L的各个范畴的监督，这种监督是通过登记使用价值和分发劳动券进行的。在这种程度上，控制是自发地产生于客观的生产过程本身。然而，这些单位生产的产品无偿移交给了社会，因此，他们在单位的账簿或社会簿记办公室中都没有得到贷方记录。在这些情况下，生产的产品数量——也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平均生产时间（ASPT）——和再生产过程（扩大的积累）都没有发挥控制因素的作用。因此，那些在没有任何经济措施的情况下将产品提供给个人消费的企业，只在一个方向上受到自动控制：那就是仅由生产过程的客观或非个人方面提供的控制，因为没有测量花费的劳动时间(L)的方面。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出无数种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可以系统地控制这些单位，以确保尽可能节省和经济地管理社会资源。但是，关键不在于从人的头脑中设计出一种控制方法，这种控制方法可能与所讨论的特定单位的具体特征相符合；相反，任务恰恰是确定那种有机地反映整个社会生产特点的、对所有单位都通用的特殊控制形式。

在共产主义经济的初级阶段，可能只有那些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单位属于GSU或“公共”单位，例如经济和政治委员会、卫生服务机构、教育系统等。然后，下一个发展阶段可能是将货物和乘客的运输纳入无偿消费的领域。在一个更遥远的阶段，“按需消费”的原则可能会扩展到用于个人消费的可物理定义和测量的产品。因此，在进行社会革命的过程中，首先关注的不是立即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执行“按需消费”的原则，**而是在生产单位方面实现独立管理，并实行独立的生产会计与控制制度**。一旦生产在这方面得到保障，经济进一步发展到免费和无偿消费的阶段就会变得相对简单。

在所有那些只允许在一个方向上进行自动控制的单位中，很可能会通过现场调查比较的方式来弥补缺失的控制领域。例如，为了确定在一个或另一个公社中有多少劳动时间用于教育，各个城市有多少劳动时间用于提供和维修一公里的公共道路，将对关键指标（operative indices）进行比较。对那些物理上可测量的产品在社会上分配的情况——例如，电力——通过消耗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进行控制将再次适用。但是，现在必须记住，控制不会作为社会簿记办公室工作中的一个计划要素自动进行，而是必须在有关单位的记账部门进行。

作为控制公共机构的一般制度内的一项附属任务，现在还**需要对消费品的分配进行控制**。消费者通过他们合作社的代理独立地分配产品，他们是“自己家里的主人”。因为个人的愿望在这里得到了集体的表达，所以正是他们决定了分配什么和多少。他们的执行单位是一个GSU类型的单位，它制定运营预算，确定其消耗的(p + c) + L，并规定其职能服务在于分配x个劳动小时。

对生产公式的控制也只是为了一个目的：确定为组成生产公式的具体范畴规定的限制是否得到维持——作为副产品，这两种情况都会产生数据，从而证实或否定生产公式最初是正确制定出来的。

对产品分配数量的控制也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因为所有的货物转移都在一般社会簿记系统中登记，而且产品进入消费领域的时间与它们的生产时间完全一致。在社会簿记办公室里，每个消费合作社的账户上有多少产品，也就是说，有多少劳动时间，都有准确的记录。必须向社会记账办公室交出与劳动小时价值完全相同的劳动券。

当然，这个程序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例如，分配组织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一部分可用的产品会丢失、被毁或损坏。由于这个原因，实际上不可能出现交出的劳动券数量与社会簿记处的相应借项完全相同的情况。然而，在实践中很容易确定这些赤字的限度，因此，例如，可以作为一个范畴纳入分配组织的运营预算中。原则上，对分配过程的控制不会因为这些不可避免的产品损失而受到损害，生产者与产品间确切关系的原则也不会因此受到破坏。

通过这种方式，对生产和分配的控制是完整的。生产-再生产公式的每个范畴都可以被社会准确地核查。控制被简化为最简单的形式，经济过程是如此清晰可辨，以至于**公开记账**制度使社会所有成员的直接控制成为可能。

随着生产和分配的组合机器，即整个经济体系，牢牢地、永久地掌握在生产者-消费者手中，共产主义经济体系的机器已经找到了它的最高和最理想的统一形式，这种统一形式只有通过一切生产力的综合运行才能实现，而事实上也只能是这样。因此，社会成为**自由和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在社会政治领域，这在工人委员会制度中得到了最高的表达，而在经济领域则是一般社会簿记制度。

# 十二. 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

## 1. 基本范畴

如果我们对SNL（社会必要劳动）这个范畴进行更仔细的研究，两个完全不同的因素在这里被扔到了一个标题下。一方面，它包含了一个简单的决定性因素，即特定形式的劳动满足了特定的社会需求，因此是社会必要的；另一方面，就时间方面（劳动**时间**）而言，它表现了经济调控的因素。例如，考茨基谈到了社会必要劳动，这种劳动包含在一个特定的产品中，“从它的最初起源到它的最终完成，包括运输和其他辅助操作”，而且“即使在最庞大和最完善的统计机器的帮助下”也无法估计。考茨基认为，即使在理论上完全有可能计算出这一范畴，但在实践中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就预算控制的任何目的而言，考茨基认为它实际上是无用的，必须予以拒绝。

现在来谈谈沃尔高，他的意图是，社会必要劳动（SNL）也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监管和会计作用。他甚至希望，这应该在这个术语的名称中得到体现，为此他谈到了“社会固有成本价格（inherent social cost price）”：

“我们的理解是，**固有的成本价格附加一个额外的增量，用于维持人口中的非劳动者部分，再加上一个增量，这用于实现社会积累**。这就是原则上的解决方案”。（沃尔高的强调）（*Die wirtschaftspolitischen Probleme der proletarischen Diktatur*, p. 147）

这个“原则上的解决方案”确实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提议。把沃尔高的“社会固有成本价格”纳入整个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然而，不幸的是，沃尔高没有提供任何信息，说明如何确定GSU单位和积累的额外增量，或在多大程度上，它们将与原理图的其余部分相关联。因此，不可能对该公式进行任何进一步的检验。笼统地讲，我们只能在这里看到考茨基遇到的困难，为了实现这些“固有成本公式”需要一个巨大的大脑，就像绘制拉普拉斯阐述的著名的“世界方程”所需要的那样；用简单的语言表达，这就等于说这些“固有成本公式”完全是胡说八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毫不奇怪，备受赞扬的“原则上的解决方案”在匈牙利无法得到任何实际应用，而且现实的要求强加给他们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实践中，社会固有成本理论被价格政策赶到了一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固有成本的范畴也被推翻了，并被证明是无用的。

看来，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学家们把社会必要劳动（SNL）这个术语应用得太广了，而且他们还把所有的行政管理等一般成本都包括在之中（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这些费用根本不属于生产领域；或者，在另一个极端上，他们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共同的最终产品上，结果是附着在数百种不同产品上的无数不同的生产时间被无法挽回的混合在了一起（见考茨基）。在这种特殊的形式下，社会必要劳动的范畴确实是非常无用的。然而，所有在再生产和分配中进行的劳动都是社会必要的。因此，它们必须被再生产。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每个经济集团独立生产，从而使整个社会必要劳动得到再生产。

那么，我们看到，社会必要劳动这个范畴只能应用于生产实际使用价值的劳动力的方面，而不是在任何行政管理-会计职能方面。因此，社会必要劳动的再生产是建立在并反映了经济中每个生产作业的再生产，因此，适用于每个单独的工作活动或劳动过程之特定分工的根本不是SNL范畴；相反，适用于每个单独活动的决定性范畴是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ASRT）。所有“生产者”都可以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应用这个类别，而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问题正是以这种方式同时找到了它的解决方案。

## 2. 生产时间和再生产时间

我们现在必须进一步研究，为什么这里适用的是再生产时间而不是生产时间；此外，我们还必须澄清这些术语在何种程度上是同义词，在何种程度上是对立的。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回顾我们原来的规定，即每个独立的生产单位必须通过应用公式（p+c）+L来计算其产品所需的生产时间；也就是说，它要确定该特定产品中包含多少小时的平均社会劳动。然后，我们的大纲继续说明了社会平均生产时间是如何从所有加入单一生产团体或“行会”的生产单位的总和中计算出来的。这种计算方法保证了整个生产集团同时的再生产，因此，我们把它称为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而不是社会平均**生产**时间。这样一来，两者实际上是重合的。各个（工业）单位的生产时间与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之间的差异，被归入**生产力因素**。

## 3. 生产资料的折旧

对于资本家来说，他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否则他们就会被挤出市场。为此，他们必须努力使工人的工资尽可能地低，并始终使用最具生产力的机器。因此，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仍然能够用于生产性工作的机器经常被报废了。当然，这是对生产资源的巨大浪费，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从严格的经济观点来看，这种情况意味着，就配备了过时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单位而言，生产时间将多于社会平均水平；或者反过来说，自从有关的特定资本主义机关成立以来，由于社会平均生产力的提高，工业经济的这个特定部门的社会平均生产时间已经下降，从而导致了适用于上述过时机关的生产时间相对增加。

当然，不断减少社会平均生产时间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自觉目标。这样做的结果是，再生产时间普遍下降。用资本主义的术语来表达，这就等于说，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个别生产单位的生产资料都已经过时了。因此，我们现在必须研究这种趋势在共产主义经济中是如何表现的。

例如，让我们以一个工业单位为例，其中的固定生产资料被计算为10万个劳动小时；让我们进一步假设这些生产工具在10年内折旧。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估计把每年1万个劳动小时计入产品中。但是，如果生产工具的平均社会再生产时间（ASRT）下降，其结果将是，企业在再生产中能够购买同样数量而质量更好的机器，或者购买更多的同样质量的机器，也就是说，企业的生产力将得到提高。换句话说，这意味着积累，或生产设备的扩展，将在不增加劳动支出的情况下发生。

对这个单位来说，适用于其生产资料的ASRT的下降，会导致其生产时间的变化，从而也会导致其生产力因素的变化。原因很简单，在最终的分析中，ASRT必须包括在总计算中。因此，整个生产集团的ASPT与ASRT保持一致，原因同样很简单，作为统计平均值的生产资料被用完了，并作为一个不间断的流而“流过”各个单位。在任何一个时刻，这个特定单位都会得到现代化和更新，在另一个时刻另一个单位也是，以此类推。因此，最低限度的社会再生产时间，在任何给定的时刻，都将不断地被生产过程所占据并反映出来。

因此，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ASRT）是共产主义生产的决定性范畴。正如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价值（必要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个范畴是整个经济的中心，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中，**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这一范畴是一切都围绕着的焦点。

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的基础是**社会平均劳动小时**（**average social hour of labour**）。当然，这个范畴在资本主义下也有一定的有效性。然而，个别使用价值的单独和独特的特征无法以商品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在市场上，产品被换成了货币，也就是说，变成了消灭了所有个别特点的普遍商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将所有的个人特征纳入其中，那些速度较慢和较轻松的工人，那些能力或强或弱的人，那些用手或用脑劳动的人。因此，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是一个范畴，作为一种自在物，作为一个具体的参数，它没有物质存在，就像自然法则，它只表达了所有具体现象所栖居的普遍性，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在具体层面上不存在，它表现了物质的社会形态变化（social metamorphosis of materials）中无限多面的普遍性。

# 十三. 无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与一般会计控制制度

无产阶级的经济控制，这对许多勇敢的小资产阶级——甚至对大量的无产阶级本身来说——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幽灵啊！他们忘记了，资本家阶级是以最残酷无情的方式行使其权力的。然而，历史并不是围绕着小资产阶级的恐怖而展开的，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由于这个原因，其有意义的生活的源泉不断受到威胁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将被迫起来反抗资本的专政，以便建立自己的社会秩序、劳动秩序，以反对所有资产阶级分子的抵抗。这一行动所需的决定性力量，必须出于必然，从集中在大工业和中等规模工业的工人群众中产生。在社会中掌握公民权力的是他们，也正是他们将承担起制定新秩序的任务，而社会的其他部分，即非无产阶级分子，将不得不遵循这种秩序。这不是通过法令，更不是用刺刀来实现的，而是必须通过最广大工人群众有组织的活动来实现。

西欧革命事件的进程将是这样的：无产阶级占有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并宣布它们是社会所有。这样一来，国家本身就会逐渐被削弱，最后被摧毁。然而，在实现了这一点之后，工人们将不得不决定是否要效仿俄罗斯的做法，屈服于长期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影响而帮助建立一个通过国家行使压迫的新机器，而国家此后将作为生产的经理和行政管理发挥作用。或者，另一方面，如果工人的共产主义意识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使革命行动成为可能和必需，就强行把工厂和工业要素置于他们自己的行政管理之下，而为此目的利用工厂组织或委员会作为他们权力的主要机关。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那么只有在本书所概述的共产主义经济原则成为社会生产制度的基础时，这才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社会总产品中最重要的部分将被带出市场轨道内不受控制的自由流通范围之外。社会生产中较少的剩余部分，即小农经济，将被客观条件本身说服，与集体组织的工业联系起来。这样一来，“无产阶级的经济专政”就会出现，这是胜利的工人阶级最强大的武器。

很容易看出，在经济领域进行社会革命是一项在很大程度上由一般社会簿记系统承担的任务。新的经济法律在那时将生效，使完成这一任务成为可能。共产主义的工业生活对货币流通一无所知，也没有市场。它通过社会簿记办公室来管理有记录的交换流（Giro-Centre，直接转账中心）。通过这种方式，所有那些与社会簿记办公室无关的生产者都陷入了被消极说服的境地。他们无法为自己的企业采购任何原材料和生产资料。如果他们希望这些单位继续从事工业活动，那么他们制成品的流通就必通过社会簿记办公室（OSB）建立的交换控制（Giro-Centre）来进行。他们必须服从并参与社会生产的一般制度，必须将生产置于一般控制体系的约束之下，通过实施规定的公式（p+c）+L，而这一工具将他们的生产被置于社会的控制之下。

通过这种方式，社会上分散的、支离破碎的小规模工业通过纯粹的经济手段被强迫使其生产与无产阶级的一般秩序保持一致。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具有类似规模和体量的工业单位将联合起来组成生产集团。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为了确定各种ASPT及其相关的生产力因素，这是必需的，这还与采购材料的计划等原因有关。**然而，这种集团联合的方法不一定会以任何方式剥夺小工业或农业单位的自我管理权利**；相反，实践将表明，生产者自己的生产组织在这个领域也会以一种模范的（exemplary）方式发展。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自由平等生产者的联合体”发挥了它的经济实力。它拒绝承认一切剥削的权利，并将不承认这一共产主义首要原则的每一个因素排除在其社会之外。但是，小规模生产将被迫加入到共产主义的生产体系中。然而，正是通过这种结合，无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才直接将自己转变为它的对立面（指经济联合让小生产突破原有局限——译注）。只要生产者自己把工业单位的管理权和行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把生产置于社会控制之下，通过这一行为，“专政”就被废除了，所有生产者都成为了他们联合体这个大共同体中的平等成员。

# 十四. 土地问题与农民

## 1. 面向商品生产的发展

每一个新社会都是在旧社会的子宫里诞生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则。在其激烈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一个日益强大和集中的生产机关，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对这个机器的控制权集中在资产阶级的工业所有者手中，他们的数量数量会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无产者的军队不断增长到一个前所未闻的程度。这种发展同时创造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条件。无产阶级人数不断增长的必要前提，是剥削率的不断提高，同时，物质生活的普遍不安全感也与此保持同步。（见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在这些条件下，无产阶级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共产主义。

然而，如果我们在观察工业发展的同时，也观察农业的发展，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的情况。尽管所有的预言都说，同样程度的集中也会成为农业经济的一个特点，小农和中农也会越来越多地被大农业集团所破坏和消灭，但实际上几乎没有看到这种发展。不仅是中农，连小农也设法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而没有看到任何类似于上述的发展。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近几十年来，小规模农业的持有者数量实际上有了很大的增长。

农业发展的进程给国家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们带来了巨大的失望。在工业中，劳动过程获得了越来越明显的社会特征，而在他们看来，农业经济仍然是封闭和落后的。在工业中，生产单位对共产主义来说变得越来越“成熟”，正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在农业经济部门，生产关系只是拒绝变得“成熟”以准备让国家中央管理。

在国家共产主义者的眼中，由于这个原因，农业现在和将来都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积极障碍。相反，我们的观点是，资本主义正在最彻底地为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在农业和其他经济领域都是如此。这完全取决于人们的观点：是设想把农业生产管理的责任放在中央政府办公室的手中，还是理解为由生产者自己来执行。

首先，必须非常仔细地研究现代农业。毫无疑问，我们没有在这发现像工业中那样有生产的巨大集中。然而，尽管如此，农业种植已经彻底成为资本主义的了。

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标志。商品是生产者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别人生产的使用价值。商品生产者恰恰创造了他自己不需要的商品，而他消费的恰恰是他自己没有生产的商品。商品的一般交换是在市场中进行的。只要商品生产者不是为自己使用而是为社会使用而生产，他的劳动就是社会劳动。在庞大的社会交换过程中，所有的商品生产者都被捆绑在一起，他们生活在完全的相互依赖中，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

然而，在过去的小农经济中，商品生产只是一种附属活动。农民封闭的家庭经济实际上是依靠自己的资源来满足他的全部需要。农民为自己的家庭劳动。他的生产不在社会中相互依赖。只要他能够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生产所需的工具，他的生产力的范围就仅限于他的农场。只有那些不需要他自己使用的，他的剩余生产，才会被运往市场上，从而使这些产品获得商品的性质。因此，农民经济不构成一般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这也是对农民典型的独立生存条件的解释。

工业规模的商品生产打破了这些孤立的经济条件。一方面，资本主义在整个土地上散布了多到过剩的廉价产品，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租金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国家要求更高的税收。我们在这的任务并不包括追究孤立的小农经济遭到破坏的过程（见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我们在这只需要注意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结果：**农民发现他需要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以便能履行他的经济义务**。然而，他只有通过激励自己成为商品生产者，通过向市场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才能获得这些货币资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两种方法可供他选择：要么他必须减少消费，而生产力保持不变；要么他不得不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像旧时代的农民那样减少消费，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因此，提高生产力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正是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们开始在对未来的猜想上误入歧途。他们假定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与工业的相同。工业的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这是通过许多资本的合并，是通过生产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现代化的机器而达到的，而这些机器只能在大型企业中得到应用。按照这种设想，小农和中农基本上注定要消失，而农业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将是由庞大的农业联合体。

那么，在这方面，我们的经济学家犯了错误。这也许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错误，因为他们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已知的可能性之上。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的计划中，正是工业发展本身，注定要在农业经济中带来经济集中，这实际上为农业发展所采取的完全不同的进程奠定了基础。特别地，**汽车、人工化肥和农业科学的应用**，是使农业生产率提高到如此显著程度的主要手段。由于采用了现代施肥方法，土地本身的肥力开始起次要作用，每公顷的产量大大增加，这意味着农民能够向市场提供比以前多得多的商品，与此同时，现代的通讯方式提供了一般的交通工具。随着每公顷产量的增加，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开始起作用。一旦生产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专业化的现象就会成为一种强制需求。“专家，就像穴居人一样，在整个宇宙中只看到一丝光，但这一丝光他看得非常清楚。”穆尔塔图里（Multatuli——荷兰小说家，译注）曾在某处说过。因此，我们看到农民安排他事务的方式是，他只提供一种特定的产品，但在这个狭窄的领域，他达到了现代科学和他自己的财政资源所能达到的最高生产力水平。他在这种狭窄的专业化基础上组织自己的生产，也就是说，他只采购他为这种特定产品所需的工具和设备。

上述情况描述了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上述特点在荷兰和丹麦最为明显，而法国、英国和德国在走向专业化方面紧随其后。就大城市周边地区的牲畜饲养和蔬菜种植而言，上述国家已经完成了向这种农业类型的过渡。因此，农民已成为最完整意义上的商品生产者。他不再仅仅把他的剩余产品带到市场，而是把他的全部产出带到市场。他生产他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他消费的正是他自己没有创造的产品。因此，他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他人、为社会劳动，随着这一过程的完成，他的劳动已完全与一般的社会劳动结合在一起了。封闭的家庭经济已经被专业化所摧毁，农业经济已经转变为**工业生产**的一个部门。

即使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他自己那一小块土地的主人，他的总体经济状况也随之急剧恶化。然而，在有利的市场条件下，他仍然可以进行有利可图的交易。不同的是，他现在完全依赖于市场的波动。此外，他现在非常容易受到自然变化无常的影响，某一年的恶劣天气或下一年特定作物的病害，或任何一个他无法控制的因素，都可能彻底毁掉他。

经济经验的不确定性确实也可适用于工业生产领域——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后者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不那么强。在工业方面，生产力提高到这样的程度，通过使用更多的生产性机器，加快的积累成为可能，其最终结果是工业资产的集中过程。然而，在农业方面，生产力的提高对农民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但这也取决于技术水平与个别农场企业的具体生产条件相结合。就农业而言，积累是通过供应人工化肥、机动车和拖拉机以及围绕专门产品的生产组织而实现的。

与上述发展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现象。为了在市场上获得尽可能强大的地位，农民组成了农民合作社，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对价格政策进行更密切的控制，从而能够以集体的方式购买改进的机械进行整地和收获。因此，例如，牧民能为自己建立乳品农场（dairy farm），这成为这一行业与牲畜养殖业直接结合的手段。因此，乳品业现在已经成为主导一系列附属生产方式（forms of production）的焦点中心。通过这种方式，农民们创造了一个将他们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单位。通过这些手段，不仅农耕业和牲畜养殖，而且园艺也变得非常高度集中，同时，还不可能发生任何工业意义上的企业合并问题。

综上所述，必须注意到，当代农业的特点是高度专业化，并已发展到完全为市场生产商品的阶段。现代技术使生产的增长成为可能，但没有同时带来任何同等程度企业所有权的集中。一个平行的发展是农民合作社的增长，它通过创造有共同经济利益的领域将各种独立的农业企业联系在一起。同时，这也导致农民丧失独立性（例如，经常丧失按自己意愿处置自己产品的权利）。

# 十五. 农民与革命

上述的发展过程阻碍了众多农业无产阶级的形成。即使这个无产阶级在数量上比农民业主的数量多得多，但它离工业无产阶级群众对资产阶级的相对压倒性的规模，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还需要注意的是，农村的阶级矛盾之所以没有表现得如此尖锐和突出，正是因为中小农民与家庭其他成员一起工作。在城市里，所有权的形式导致了纯粹的寄生性，而在中小农民企业中，情况并非如此。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农村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比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前景面临着更多的困难。然而，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前景绝非像乍看之下那样毫无希望。不言而喻，农村有大量的农民业主，但这些人非常清楚，他们的角色不过是银行资本的代理人，同时，经济不安全的负担对他们来说非常沉重。另一方面，毋庸置疑的是，农民业主永远不会成为共产主义斗争的先锋。然而，他所处的经济地位迫使他与那些任何时候都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联系起来。然而，这样做的前提是，他不被赶出他的房子和农场，他不被排除在对他的生产资源的管理和行政之外。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与租金或抵押债务扯上关系，因为只有产品的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ASRT）才是所有经济关系的基础，至少在这个程度上，农民问题采取的形式，就“自由平等生产者的联合体”而言，也许并不像所谓“成熟的”工业单位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那样反常。

农民已经成为商品或市场生产者的事实，对于革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对农民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对当代农民真实地位相当大的误解。例如，人们常常提到无产阶级依靠农民提供粮食，因此，对他们采取过于公开的明显的社会经济手段是不明智的。

然而，这些担心是建立在对农业经济状况的估计之上的，这种估计是由现在已经过去的一个时期造成的。这个问题往往被这样理解，即农民仍然是早期的农民，而不是今天发达市场的生产者，他们不仅将其孤立的家庭经济产生的剩余产出带到市场，而且将其全部产品带到市场。在今天的社会中，无产阶级不再依靠农民；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如果农民不能把他们的产品交付给无产阶级，那么他们自己也会和无产阶级一样成为饥饿的受害者，不管这看起来多么矛盾。最终的结果是，农民被迫出售他的产品，原因很简单，他只生产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并被迫消费自己不生产的东西。

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农民宁愿把自己的产品喂给动物，也不愿意在被迫的条件下出售产品。这也是一种误解，是建立在反映旧的孤立家庭经济的过时观点之上的。除了辅助性的附属品，养殖牲畜的农民除了牲畜一无所有，而种地的农民拥有粮食但没有牲畜，养鸡的农民有几百只鸡但没有牲畜，种菜的农民只有一定数量的蔬菜品种，等等。他们都是专业人员。

除了上述情况外，人们还经常听到有人担心，如果发生革命的社会变革，农民会拒绝继续耕种土地；换句话说，他将试图回到早期历史时期的孤立的家庭经济。但是这条道路也是对他来说是封死的。即使是最聪明的农民，也很难聪明到能够倒退100年，用自己的劳动生产他所需要的一切。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既没有必要的技能，也没有必要的工具。一旦劳动的社会化过程完成，社会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退出这个过程。任何开历史倒车的行动都是不可能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农民都是社会这艘大船船员的一部分，他们将随船沉没或继续航行。

# 十六. 俄罗斯和匈牙利的土地革命

## 1. 俄国

俄罗斯对土地问题的解决与西欧土地革命的发展没有多大关系。那里的农业仍然处于前资本主义关系的阶段，其典型特征是大地主庄园，常常与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相结合。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口号“所有土地归农民所有！”意味着自由和平等的实现......就像1789年法国农民赢得这些权利时，这对他们的意义一样。对他们来说，这些权利的意义在于他们为自己获得了一块私人土地，他们可以在上面以任何方式生活。俄国农民所要求的权利是作为资本家出现在社会舞台上，既是商品的转让者，又是生产的受益人。当然，这也是他们很快开始煽动反对苏维埃政府，从而为自己赢得内部贸易完全自由的原因。

由此，俄国开始了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我们这里的西欧早已过了这个阶段。俄罗斯人以夸张的姿态提到了他们所谓的共产主义在这片土地上的增长。他们的意思是说，农民已经联合起来成立了合作社，以便有效地利用现代技术的优势、共同的价格政策和集体的大宗购销机制。通过这些手段，俄国农民完全遵循他在西欧的阶级同志们所走过的道路，其动机是必须为自己在市场上赢得强有力的地位，从而获得尽可能高的利润。从这一切我们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大肆宣扬的农业“共产主义”，实际上已经在西欧发展的比在俄国先进多了。

因此，在共产主义意义上的土地经济关系问题上，我们找不到什么值得向俄国人学习的东西，这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不存在委托农场组织对自我实行经营管理的问题，正是因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仍然是私有的。

## 2. 匈牙利

匈牙利苏维埃为革命所采取的发展路线提供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在这里，小规模的土地财产没有受到影响，而大中等规模的土地则通过法令被没收，但却没有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匈牙利的情况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转变，是因为那里的农民就像新生儿一样，没有在革命中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沃尔高对此做了如下描述：

“在匈牙利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可以说，权力在一夜之间合法地、或多或少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膝上（laptop）。农村只存在极小的革命运动，但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武装抵抗。因此，可以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合法地没收土地，而大宗地产也得以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我们强调**合法**一词，因为必须公开承认，在大多情况下，没收是通过纯粹的法律手段进行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几乎没有带来什么社会变化，以至于农村人口往往不清楚征用是否已经发生......在这些情况下，前庄园主仍然控制着被没收的庄园，作为国家雇用的经理，至少目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从前的业主仍旧住在同样的高级住宅里，坐着同样的四轮马车，允许别人像以前一样称呼他为‘先生（Sir）’。整个过程只是因为他不能再随心所欲、无所阻碍地占有其地产，而是被迫服从地产管理部门的指示。对此，农业工人很少注意到；革命对他的唯一意义是，现在收入比以前高得多了。”（沃尔高，《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政策问题》，p. 103）

然而，事情并不是到处都是这样。一些大地产被宣布为生产性协会，其中有一种表象，好像经营和行政管理显然置于工人的控制中。

“独立的庄园被组成了生产合作社。某一地区的合作社被合并到一个共同地区的管理之下。所有这些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省级管理中心’，然后直接由最高经济委员会的耕种部门管理。选择这种特殊形式的生产合作社，是考虑到农业工人的社会落后性。如果我们简单宣布大庄园是国家财产，那么工人的工资要求将是无限的，而劳动强度将降到最低。但是，通过采用这种手段，就有可能施加压力建立一定的劳动纪律和劳动强度，理由是庄园的净收益归工人自己所有。采用这种方法的另一个结果是，农业工人想把土地的法定所有权转变为个人所有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这些让步在实践中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会计程序（簿记）是在中央行政部门主导下进行的。当然，其目的是，当工人经历足够的教育启蒙时期后，要公开宣布没被没收的土地是国家财产，工人将成为国家雇员，与产业工人的地位完全相同。”（沃尔高，同上）

## 3. 结果

这样的声明是在批评自己！沃尔高开诚布公地说过：“给工人们一种生产是由他们自己经营和管理的表象。实际上，这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支配着中央管理机构，而正是这个中央管理机构通过价格政策决定了工人的净收入是多少。”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生产者与社会产品的关系必须**在客观的生产过程本身中**获得确定，以确保在民主的面具下不会出现新形式的阶级统治。

详细讨论匈牙利苏维埃农业经济的具体特点是没有用的。可以得出的唯一结论是，俄国和匈牙利为“共产主义”生产提供的例子呈现出了一幅令人沮丧的画面。在俄国，农民的行为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农民分配了土地，带走了农业生产资料，因此，最富的农民而不是最穷的农民得到了最大的份额”（沃尔高，p. 103）。在匈牙利，他们根本没有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农业无产阶级和中小农在西欧条件下可能会如何对待无产阶级革命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哪种意识形态会成为主导？他们是否也会以有组织的方式参与革命，如果是的话，又会以什么形式参与？我们不知道。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研究他们对1918-1923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态度。

# 十七. 德国革命中的农业无产阶级和中小农户斗争的开始

## 1. 斗争开始

1918年11月帝国统治在德国崩溃，这在一开始并不是工人群众革命活动的结果。前线已被攻破，成千上万的士兵正在开小差。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海军的领主们想出了在北海进行一场殊死搏斗，最后展示一次实力的办法。水手们相信，无论这正确与否，他们都将在这场战斗中死去，这在军舰上也引发了大规模的抗命。一旦采取了这一行动，水兵们就不得不将其进行到底，否则叛变的船员和他们的船只就会被“忠诚的”部队打成碎片。为此，他们打出了红旗，这成了水兵们普遍起义的信号。这样，决定性的行动付诸实施；木已成舟，水兵们被迫继续他们已经开始的斗争。一个行动导致了另一个行动，这是它自身的铁的逻辑。他们以这种方式向汉堡进军，以便向那里的工人们求助。他们会受到怎样的对待？他们会被击退吗？

在接近汉堡的时候，革命的水手们没可能受到任何阻碍。成千上万的工人宣布声援他们，所有的革命活动都在工人、士兵和水兵委员会中得到表达，德国革命的凯旋之路开始在整个德国展开。在这里，这一革命发展的一个特殊特征开始显现出来：尽管自 1917 年以来，军事审查控制了所有关于俄国革命的报道，尽管由于这个原因，委员会的概念绝对没有得到过任何宣传，尽管德国工人完全不了解俄国工人的委员会结构，但在几天之内，一个完整的工人委员会网络就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德国！

## 2. 革命蔓延

随后发生的内战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一边是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社会民主主义。它将社会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之特有集中过程的简单延续，并将在大工业的**合法国有化**中达到顶峰。在这样的一场运动中，作为工人群众自我活动表现的委员会运动，必然会被社民党视为一种必须被摧毁的威胁。另一方面是新生的共产主义，它认为只有通过非法手段才能将生产资料中的私有财产转化为社会化财产，也就是说这一过程要嵌入劳动群众的自我活动中。目标是一样的，但实现目标的方法完全不同。

在整个革命时期，虽然无产阶级占领工厂是普遍进行的，但这种占领并没能达到“以社会的名义占有”。工厂继续由旧业主经营管理，它们仍是其财产，即使各处都处于工人的有效控制下。

## 3. 僵局

革命没有进一步发展，主要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部分，仅仅是为了维持其反对反革命的立场，就使用了它全部的力量。反革命，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想阻止“社会混乱”发生，阻止实施自主的（“野猫式”）国有化。由于这个原因，无产阶级革命是极其薄弱的。许多社会团体都被革命所压倒，被迫选择站在胜利的一方，无论这一方是好是坏。但是，到最后他们都被推到反革命的怀抱里去了，因为无产阶级内部仍然是分裂的，还在忙于自己的问题。

虽然现在不是全面概述德国革命内战进程的恰当时刻，但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一些简短的讨论，因为农民无产阶级和中小农民对革命的态度，是同内战的过程和整个革命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 4. 农民的作用

这里需要注意的第一个特点是，农民在革命进程中并不构成任何重要的战略因素。例如，它们无法发展自己的独立组织，进而发挥独立作用。他们也未能成立自己独立的委员会，除巴伐利亚外。在后一种情况下，农民被迫采取了一种立场，这种立场造成了与无产阶级的情况中相同的现象：他们未能作为一支团结的力量来维护自己。一部分农民选择了革命的一方，另一部分则反对它。不幸的是，我们没有任何关于那些在站在革命一边组织的社会特征的资料，也没有任何对有关势力的准确数字估计。

除了巴伐利亚以外，农民在革命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他们不可能给予任何直接的支持，而且普遍的情绪显然是冷漠的。“一切土地归农民”的口号在这里显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中小规模农业占了决定性的主导地位。在与俄国类似的农业落后的状况下，农民得到一块土地作为他的私有财产可能就够了，但西欧的现代经济条件使他提出了相当不同的要求。除了土地所有权外，还需要以生产资料和原材料的形式提供可观的资本资源，以便农业也能达到工业和经济的平均社会生产力水平。如果不能达到这些水平，这些土地就不能实现盈利，他们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在高度发达的农业条件下，在俄国能释放出如此巨大社会力量的口号，在这对小农根本没有意义。

然而，在德国仍然存在着以大规模土地所有制为主的广大地区。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这里的无产阶级愿意或倾向于效仿俄罗斯的土地分配模式。我们必须十分坦率地说：这类事情明显不存在。德国以大规模土地所有权为特征的生产关系有效地防止了这种倾向的出现。如果在农业经济落后的情况下，缺乏土地的贫苦农民的思想世界自然是围绕着对大地产的强制分配而进行的，同样，鉴于德国的大农庄实行以高度专业化为特征的科学耕作方法，在这种条件下，唯一能够独立发展并把自己表现为一种独立社会力量的意识形态，仅会是采用共同经营方法的公有制。

另一方面，对这一观点可以提出的反对意见是，特定的技术发展水平并不总是或必然表现为持有土地人口的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因素，因为传统的力量总是在后者的动机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刻联系是我们所描述问题的根源。

在德国大规模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有组织的生产是作为一种工业来组织的，因为它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使用现代化机械耕作的大面积耕地，粮食储存在大型筒仓里，并通过机械加工。在养牛地区，放牧的草地面积巨大，配备了能够容纳数百头奶牛的挤奶棚，同时还有鲜奶厂用于制备牛奶。德国北部的土豆地专门组织了这种农业形式的专业化，酿酒厂直接与之相连。在萨克森省，一切都专门用于生产甜菜作物，以便在邻近的马格德堡、亚琛等地的糖厂进行加工，这里的情况也非常类似。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土地归农民！”这个口号在俄国分田地的意义下找不到任何根基。农业工人对如何处理这些土地没有任何概念。在畜牧业领域，他们也许可以为自己争取到一块土地和几头奶牛，但由于他们的住所不具备农场，他们将无法在那里从事任何牛类或奶牛养殖活动。此外，也完全没有开发其土地所需的农具。这些条件在德国整个大地产地区都是有效的，而且，由于上述所有原因，我们可以确定地得出结论，农业的高度发展让任何分配土地的措施变得无效。

在这种庄园工作的农业工人构成了真正的农业无产阶级。他们所面临的前景与产业工人所面临的前景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以社会的名义占有整个工业”的前景。如果工业无产阶级在实践中被证明太弱，而不能认真地处理与实现共产主义有关的革命任务，那么农业无产阶级的情况下，问题甚至没有发展到可以提出这些任务的程度。土地生产关系本身就使成千上万的无产者无法在一个小职业范围内获得团结的必需品质，结果是只有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才能形成共同的斗争阵线。由于这个原因，农业无产阶级不具备成功组建，或几乎没有能力组建自己的委员会，因此它在德国革命中的作用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另一方面，所谓农村的半无产阶级的态度也值得注意。在德国，农村有相当多的工业存在，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出现。这可能是由于有廉价劳动力，土地价格和税收较低。由于所需的劳动力是从邻近地区的农民人口中招募的，而且这些工人经常在业余时间在他们所有的相当大的土地上工作，他们往往处于一种直接的地位，我们称之为半无产阶级。他们所追求的农业类型是封闭的家庭经济。它们作为市场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不足以产生任何整体的经济意义。

在这一点上需要注意的特点是，这个半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代表了一种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或吓倒的力量。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成为运动的先锋；正是他们在起义中走在前面，并向所有邻近的城市进军，以使斗争有更广泛的基础。图林根州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此外，这些工人在为城市提供基本食品的任务中履行了模范作用。在革命初期，当委员会仍然掌握着权力时，农民往往会囤积这些食品，以便尽可能地抬高价格。为了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情况，城市里的委员会同邻近农村中工厂的委员会进行了接触，充分了解那边情况的半无产者采取手段，劝说农民按固定价格发放产品。这就是发生在汉堡地区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总的来讲，德国的农业无产阶级和德国农民都没有参加革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农业无产阶级中即使可能已经存在，但它们仍然异常薄弱，在革命实践中还无法得到表达。这似乎说明，在无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时候，广大农民往往采取“观望”的态度。他们采取的一般立场，往往是由革命势力的力量所决定的，也取决于大农业企业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融入了新生的、发展中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

# 十八. 农民和工人委员会

无产阶级革命认为，建立共产主义不是将“成熟的”工业企业国有化，而是在实践中贯彻一项原则，即**所有生产者自己主动采取措施，将自己的劳动纳入共产主义生产体系**，从而为同时将整个农业作为总生产的一个特定部门纳入共产主义的经济体系提供基础。这种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可能性之唯一的统一原则，在于建立和巩固一个经济调控管理的单位，这个单位记录了社会中不断运动的产品流。这样一个单位是通过确定每种产品所需的**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来实现的。通过这一制度的作用，**每一个生产单位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个活跃的细胞**，无产阶级的自治主动性（autonomous initiatives）和自我能动性在其中得以展开和发展。

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一旦不可逆转地扎根于委员会制度中，它就不能以除此外的任何其他方式，将同样的组织原则扩展到农业领域。在每个经济体系中，生产在运作上依赖于它在其中移动和发展的结构的组织完整性；然而，委员会制度在农村会采取何种形式，只有在未来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尽管委员会制度运作的一般原则对农业和工业都是一样的，但有许多情况决定了这种一般制度在具体情况下会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实践本身，例如，几乎肯定会揭示这样一个事实，无产阶级意识在产业工人中的发展比在农业无产阶级中的发展要充分有力得多，而对委员会原则应用方式不同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工农业普遍不同的自然生产条件。

无论如何，决定性的因素将是农民合作组织为乡村公社，归根结底，这只不过是把目前以各个农庄的形式存在的生产组织结合起来的结果。但是，农民自己是不会做到这一点的，因此，除了开展非常有说服力的宣传运动外，无产阶级的经济控制必须采取手段保证实现这一发展。这些手段将确保诸如农具、种子、人工化肥、汽油等基本用品只供应给那些采取决定性措施合并为乡村公社的农业组织。工业无产阶级掌握的权力越强，农民内部自治组织最终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此，农民和产业工人一样，有责任利用公式(p + c) + L计算其产品的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把农民变成商品生产者首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功劳，我们必须感谢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它让这一任务变得极具可行性。现代所谓的成本会计在农业和工业中都得到了一样频繁的应用，这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计算方法应用的现实性。（见J.S. King: *Cost Accounting Applied in Agriculture* [标题由Mike Baker插入]）

然而，事实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正站在一个长期发展的门槛上。考虑到这门年轻的科学是在1922年才开始，观察到这些对工业和农业生产领域都有效的一般原则建立的多么迅速，这是令人吃惊的。这首先证明，在现实中，两个生产领域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而且农业生产早已过渡到工业。的确，传统的分量在这里仍然是一种抑制因素，但在西欧大部分地区普遍存在的不利于农业的财政状况将很快破坏这种影响。凡是与农民密切接触的人都知道，在他们那里，许多旧的“真理”正迅速地变成幻想，而新的“真理”却在不断地取而代之。当然，这与共产主义生产没有任何关系，但它确实在经济合理化、现代工业管理和组建合作社等措施中得到了应用。就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而言，其意义在于，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制度的在多方面实施的客观条件正在迅速发展。

当然，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之间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不同的自然生产条件造成的。例如，降雨或干旱，植物或动物的疾病等等，都在农业中起作用，因此不可能像工业那样准确地预测和估计农业单位的生产力。然而，独立单位间生产率的比较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见J.S. King: *Cost Accounting Applied in Agriculture*），而且这种比较甚至在今天也在进行。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对农业单位经济合理化的严峻考验。至于确定各种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不是凭空想出一些方法来解释如何在每种情况下实现这一任务。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一范畴的实现将导致整个农业经济的全面重组。此外，将被视为自然必需的一个因素将是，再生产周期（而非生产周期的延长）将包括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例如，10年。正是由于自然现象的反复无常和它所带来的条件使之成为必要，因为由这种不可测因素引起的变化和波动更容易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被平均化；这样，在计算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时，就必须克服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而不可避免造成的生产波动。这样一来，由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就会自然下降。

# 十九. 后记

## 1.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现在是革命无产阶级对它要用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有一个明确概念的时候了。用诸如“胜利的工人阶级一旦摆脱了目前束缚他们的桎梏，就会发展出迄今为止做梦也不敢想象的力量”之类的轻率的言论来把这项任务推到一边，这已经不够了。首先，这是一个极其不确定的未来前景。更重要的是，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无关紧要的。实际上，事实恰恰相反。每天都有新的证据证明，资本主义经济正在集中化的道路上大步前进，只有那些被蒙蔽的人才会不承认，资本主义迟早会在国家中找到它的最高和最完整的形式。这就是资本的力量达到其最集中程度的发展道路（指国家——译注），它同时也作为联盟的形式，把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包括旧工人组织的领导阶层联合起来，一块反对无产阶级。正是在这个方向上，社会民主党与工会代表了“经济民主”在最广泛的基础上进行了宣传——最好把这种宣传说成是开放手段，使旧工人组织的领导层能够通过国家机构对经济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旧的工人运动正在展开它的经济计划，它所建议的计划经济，它的“社会主义”由此获得了形式和结构；但是，随着这些揭露出来的事情越来越清楚，提出的这些建议只不过是在新的幌子下继续进行雇佣劳动。现在也可以肯定地说，所谓俄罗斯的国家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实施这种新的雇佣劳动形式的一种更为激进的手段。因此，我们革命无产者没有别的选择。广大工人群众此刻已经被指明了一条他们行动和斗争的道路，这条道路据称将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引向他们的解放。我们必须把这些工人群众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必须向他们表明他们自主的目标，因为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革命，也不可能有共产主义。而只有当我们自己对我们为之奋斗并准备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结构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时，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更多的话要说。甚至资产阶级科学家也认识到了即将到来的灾难，他们甚至正在准备将资本与社会化经济的理念进行调和。他们认识到，私人经济管理的日子已经不多了，现在应该考虑通过新形式的社会化管理来维持剥削的任务。这种倾向的特点体现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Erich Horn的作品中《社会化经济的经济限制》（*Die ökonomischen Grenzen der Gemeinwirtschaft*），其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生产资料中私有财产的废除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总之，消除生产资料中的私有制至少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好怕的，因为根据他的观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得到维持。对他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而在于如何淘汰生产资料中的私有制。

像Horn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当然必须要证明共产主义的不可能性。事实上，他试图参考庞巴维克开发的边际效用理论来做到这一点，这使我们不必再去讨论它了。在我们看来，尼·布哈林的《食利者政治经济学》已经足够反驳这一理论了。但Horn批评官方共产主义经济模式理论的方式值得我们注意。他将其描述为一种具有**否定性特征**的经济秩序，因为在那个官方理论中，共产主义是由它**不是**什么来定义的，而在任何情况下，从来都没**根据过这个经济秩序所依赖的实际范畴来定义**。共产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没有市场，没有价格，没有货币**。换句话说，所有东西都是否定性定义的。

纽拉特回答说，作为生产者和分配者的工人，其自发活动将填补这一否定性特征所留下的空白；希法亭则把这项任务交给国家委员及其用来管理生产和消费的统计机构；作为最后的手段，他们过分地引用“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创造力”来寻求庇护，“轻轻一挥手……”就能解决问题。我们在这恰当的地方可以回顾一下那句古老的格言：“当概念与现实不一致时，在关键时刻，想象力会提供适当的言辞。”（”When concepts fail to correspond with reality, at the critical moment the imagination supplies the appropriate word”）

乍一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共产主义经济的范畴关注得如此之少，这可能令人吃惊，尽管马克思本人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以一种或多或少完整的、即使是极其精炼的形式阐述了他对共产主义经济的观点。但也只是初看了一眼。马克思的“门徒”们不知道如何理解他的宏伟设想，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发现，共产主义经济的行政管理的基本前提将沿着与由马克思设想的完全不同的路线发展。他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政府国有化”，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中有机资本的集中过程不是绝对肯定会导致这一结果吗？然而，1917-1923年的革命岁月向所有人揭示了无产阶级用来夺取生产资料控制权的形式，而俄国革命则证明，在革命发展的中心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要么工人委员会成功地保持他们在社会中的权力，要么这种权力落入国家的集中式经济机关手中。因此，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大致的发展路线再次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有关《哥达方案批判》，下列资料是很重要的：1875年，一系列措施得到采取，为实现全德工人联合会（一般遵循费迪南·拉萨尔宣传的理论）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合并，一份纲领为此被起草，供在图林根小城哥达举行的统一大会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这份草案进行了彻底的批评。马克思在给威·白拉克的信中表述了他的批评，并随后将这份手稿命名为《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Marginal Notes on the Coalition Programme*）。直到1891年，恩格斯才在《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18期（原文为第9卷，pp. 561-575，可能笔误——译注）上发表了这一批评，使其广为人知。许多年来，没有再听到关于此事的消息，直到1920年、1922年和1928年，这个文本的新版本才得以出版（所有相关日期都取自*Program-Kritiken* (*Critical Notes on the Programme*)，或者，用英语更好地称呼它为《哥达纲领批判》）。事实上，直到我们完成研究后，我们手头才有了这些“批注”。它们与我们在这给出的提纲是如此的一致，以至于我们的工作程度上似乎不过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阐述。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紧密的对应关系就够了，那就是在马克思的文本中，马克思反驳了《哥达纲领》的观点，即每个工人都应该获得“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

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末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应该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根据公平原则无论如何是不能计算的。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

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

**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没有直接关系。——《马恩选集》译者注］**的一般管理费用**。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只有现在才谈得上纲领在拉萨尔的影响下偏狭地专门注意的那种“分配”，就是说，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我们在任何一位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找不到的东西，在马克思的表述中直接映入眼帘：与资本主义一样，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过程，其核心是一个受法律支配的循环（law-governed circuit）。对已消耗生产资料进行恢复和扩大的经济必要性，是设想对全部产品进行分配的基础。此外，马克思从来没有想过，这一必需的再生产过程可以成为国家委员的个人责任，也就是说，可以完全主观地规定。相反，**它是一个客观过程**，其调节控制的计量单位手段必须从生产本身开始，这是不言而喻的必然。继而，在考虑那些只有社会才能满足的、从“全部劳动所得（full proceeds of labour）”中扣除的一般社会支出——如维持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时，在马克思那里，完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大量的统计数字！相反，这些支出是由生产本身决定的。相反，这些支出是通过从个人消费品中简单扣除得到的。如果回想一下，他建议用个人贡献的劳动时间作为这种分配的衡量标准，情况就变得完整了。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认为自己完全有理由说，我们所进行的工作只不过是对马克思自己的理论方法的一贯应用。

## 2. 从货币到劳动时间的计算

在我们关于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则所作的各种讨论中，批评我们的工作的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个论点与劳动时间计算制度有关，第二个论点认为，本研究中概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基础是“乌托邦”。我们现在打算说明历史本身是如何驳斥这两个论点的。

废除货币并以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即所谓的“劳动券”——取代货币，是一种革命行为，只要工人阶级能够运用必要程度的社会说服力，就能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的几个月内实现。这不过是一个社会权力的问题，一个阶级的社会权力——**阶级权力只有整个无产阶级才能充分地发挥其作用**。

要做到这一点，政党专政是绝对不适当和不充分的工具。政党专政只能是国家共产主义发展的产物。

在其存在的第一阶段，新的无产阶级社会几乎不可避免地需要大量的货币，它很可能会通过跟战后不久中欧资本主义国家使用的相同手段来为自己获得这些货币：通过印钞机。当然，其结果将是剧烈的货币通货膨胀，所有产品的价格飙升。在这方面要问的问题不是这种有意识的通货膨胀是否可取；如果它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无产阶级政权肯定会尽一切努力来阻止。然而，货币贬值的现象是每一次一定程度上成功推翻现有社会之革命运动的必然结果。正是革命如何进一步发展——无论它是导致国家共产主义还是自由平等生产者联合，无论是一个政党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专政，还是无产阶级成功地通过委员会建立了自己的权力——无论发生哪种情况，通货膨胀都将是社会动荡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然而，到一定时候，社会关系将一定程度上变得规范，而这反过来又使货币稳定成为可能。在俄罗斯，引入了作为新货币的切尔文；奥地利以这种方式有了先令，比利时有了Belgar，在德国是金马克。法国和意大利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但货币保留了原有的名称。

在所有民族中，德国人民在货币变化的意义方面得到了最具启发性的指导。在这里，人们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决定，即从某个日期开始，10亿马克的旧货币将对应于一个新的金马克。经济生活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条件，新的货币单位得到采用，社会上几乎看不到任何动荡。

只有不怀好意的不满者才会指出，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的小资产者财产被征收，因为他们的财产贬值使他们彻底破产，以至于他们的债权人不得不取消抵押赎回权，这是他们获得欠款的唯一途径！

在引入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作为经济调节控制的单位时，基本上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因此，一旦生产开始或多或少地平稳进行，就宣告了一种“稳定”的局面，也就是说，从某个日期开始，所有的货币都将被宣布为毫无价值，只有凭借劳动券才有资格获得社会产品。只有在合作社的商店和仓库才能兑换这种“券币”。货币的突然废除将带来一种情况，即所有货物需要同样突然地在它们上面印上适当的ASRT（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当然，这不可能是心血来潮，也不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做到这一点，目前是通过纯粹的经验法则得出的。这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它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被估计的过高，另一些时候太低。然而，随着劳动时间计算制度的普遍采用，真正的再生产时间很快就会显现出来。

同样，由于生产者自己现在将把生产的管理和行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在也将由他们负责完成从货币价值到劳动时间单位的转换。他们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唯一工具是一套转换表或关键指标，这是一种在大战时期为大家所熟悉的简易参考形式。

求得这种转换近似形式的一种方法是计算出适用于那些生产大规模产品的或所谓关键工业的国家的ASRT，例如煤炭、钢铁或钾肥。可以从工厂成本会计部门的数据中获得在给定的时间内生产了多少吨产品的数据，并从中得出以前的内在成本价格。不考虑银行贷款利息等纯粹的资本主义因素，就有可能计算出生产那样数量的产品花费了多少劳动时间。根据这些数据，就可以计算出一小时的铁产量（“铁/小时”），或一小时的钾肥产量（“钾肥/小时”）所代表的货币价值。这样，所有这些行业的平均值就可以作为临时的一般平均数来采用。在提出这一点时，我们并不是要表明，这种得出转换密码的特殊方法是唯一确定的方法，而是说这是可能的——相反，有许多道路通向同一目标。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突然改变经济交换单位的可能性。在发达的工业国家，已经证明有可能在没有任何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完成“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和最困难的金融行动”（*New Statesmen*对引入金马克的评论）。

例如，如果我们的计算结果显示，有关的ASRT等价物为0.8马克=1个劳动小时，那么，每个工业单位就有可能计算出其产品的临时生产时间。在所有这类工业单位中，库存将采用此标准比例，以马克为单位编制清单。随后是估计工具和机器的折旧费——顺便说一下，这些价值在所有工业工厂都是众所周知的。这项工作完成后，一切都将根据指标中的数字进行转换。以靴子和鞋厂为例，计算结果可能如下所示：

折旧后的机械等 = 1000马克 = 1250劳动小时

皮革等 = 49000马克 = 61250劳动小时

劳动时间 = 62500 小时

因此总数等于：125000劳动小时 = 40000双靴子

ASPT是：125000/40000 = 3.125劳动小时/双

## 3. 所谓的乌托邦思想

我们的批评者针对我们提出的第二个论点是所谓的“乌托邦思想”。然而，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没有为未来设想任何想象中的结构。我们只考察了共产主义经济生活的基本经济范畴。我们的唯一目的是**表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调动力量，在社会上实行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制度；如果在这一点上失败了，那么革命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国家共产主义**。然而，任何这种形式的国家共产主义都不可能被直接引入或公开宣布，因为这往往会使它过于公开地妥协。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这些倾向将从某种形式的行会社会主义中发展出来，英国作家科尔（G.D.H. Cole）在他的*Self-Government in Industry*中对此进行了描述，而莱希特则以更确切的形式对其进行了阐述。这里的一切都是伪装起来的国家共产主义。特别是，这项工作代表了资产阶级最后的努力，以阻止建立“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则”中最基本但最不被理解的原则：建立生产者与社会产品之间的确切关系。

相反，我们的经验是，引起我们注意的迄今为止每一份声称代表了共产主义生产分配的原则性观点，声称以历史上的有效现实为基础的作品，实际上却是以最纯粹的乌托邦为基础。对于如何组织各种产业，如何通过某些执行委员会（commissions）和委员会废除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对立，通过什么机关限制国家权力，等等，都做了许多规划。每当一个又一个有着美妙计划的作者在智力上翻筋斗而掉进幻想的角落里，或者他编造的设想遇到任何困难时，例如在整合各种行业的方面……解决办法很快就有了：一个新的委员会或一个特别委员会“应运而生”。科尔的**行会社会主义尤其如此**，**其历史前身是所谓的德国工会社会主义**（trade-union socialism）。

任何生产分配制度在组织方面的基础设施在功能上都与决定其活动的经济法则有关。因此，关于这种基础设施的任何概念，如果不反映其制度所固有的经济范畴，就不过是乌托邦式的猜想。这种乌托邦思想只是为了转移对真正基本问题的注意力。

在我们的观察中，我们并不关心这个猜想领域。就经济生活之组织结构的领域而言，我们只是在各处提到了工业单位和合作社的组织。这是有理由的，因为历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些形式的存在，从而使它们不会被过度想象。我们之所以讨论农民组织问题，正是因为西欧运动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少。农民将如何组织自己，这必须等待历史的裁决。就农业单位而言，说明资本主义本身是如何为计算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ASRT）准备好条件的，这已使我们满足。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研究由此产生的一些后果。

如果把对无产阶级有力量建立共产主义的信任等同于乌托邦，那么这不过是一种主观的乌托邦主义，无产阶级需要通过大量的宣传来消除它。某种在表面上合理的对乌托邦思想的指责，与对经济生活规范的控制制度有关。例如，有人可能会认为，莱希特为发展的可能性提供了更多余地，因为他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独立工业单位之间的核算制度是否应该以劳动券作为中介在各单位之间单独进行，或者是否应该通过簿记中心的简单复式记账来进行，而我们无条件地坚持集中式复式记账的方法。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断提请注意社会簿记系统作为无产阶级经济力量之武器的首要意义，同时它也为对经济生活的调节、社会控制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这个簿记系统的组织结构，它与整个社会的具体联系点——这些问题自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当然，无产阶级在其革命中，有可能无法产生必要的力量，使其能够使用这一促进其阶级力量的决定性武器。然而，这就是无产阶级必须达到的结果，事实上，这与无产阶级的社会权力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原因很简单，共产主义经济要求精确计算消费者将得到的无偿产品的数量。换句话说，必须确定计算个人消费要素（FIC）所需的数据；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数据，或者只是没有得到足够的数据，那么就不可能实施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的范畴，届时整个共产主义经济就会崩溃。那么，除了**价格政策**，就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了，我们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对群众的统治制度。我们将直接驶入国家共产主义的陷阱。因此，不是我们的想象力认为一般社会簿记制度是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相反，是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客观有效性提出了这种无条件的要求。

如果对我们的观察做一个简短的总结，我们会得出以下的情况：

这一论述的基础是建立在经验上的，即：随着无产阶级掌握社会权力，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转入工人的工业组织手中。共产主义意识的强弱，反过来又与对这些生产资料之社会用途的明确理解有关，将决定这种用途所包含的经济体系是否能维持下去。如果无产阶级不能使自己的权力生效，那么剩下的唯一道路就是通向国家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制度只能在工人的背上进行它建立计划生产制度的各种无望的尝试。那么，最终成功地把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交到生产者自己手中的第二次革命就成为了必要。

然而，如果工业组织成功地使自己的权力生效，那么他们就只能在社会平均再生产时间的基础上对经济进行管理，并同时废除货币。当然，也可能出现工团主义的倾向，其力量之大，使工人们试图对工业企业实行自己的行政控制，同时又想保持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作用。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其结果只能是建立一种行会社会主义，而这种社会主义又只能通过另一条道路通向国家共产主义。然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定性节点在于建立生产者与社会产品的确切关系，而这只有通过普遍引入劳动时间计算制度才能实现。**它是无产阶级可以向历史提出的最高要求**……但同时，它也是最根本的，无疑是争取权力之斗争的决定性因素。**它是权力的一个方面，在这一方面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自己的斗争才能赢得，在这场斗争中**，它决不能把自己的主要依靠放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帮助上。

因此，工业组织权力的维持是基于对独立行政和管理的主张，因为这是实行劳动时间核算制度的唯一基础。来自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大量文献证明，社会平均生产时间的计算已经在资本主义的怀抱中准备就绪。在共产主义下，(P+C)+L的计算就像现在在资本主义下，一个不同的经济调控计量单位所起的作用那样容易——在这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子宫里也孕育着新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为确保每个工业单位的再生产条件而所必需的各工业单位之间账目的结算，是通过会计中心的复式记账进行的......就像现在一样。这也是资本主义如何孕育着新的共产主义秩序的又一例子。只是必须记住，共产主义未来的工业重组（regrouping）的类型很可能是不同的，因为它们将追求不同的目标。那些我们指定为GSU类型的工业单位，即所谓的“公共”机构单位，今天也存在，然而是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具。这些企业将从国家中分离出来，按照共产主义原则融入社会。我们在此还在处理对已存事物的重建和扩展。但国家因此失去了它目前的虚伪性，最初只是单纯地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的机器而存在。它的任务是击碎资产阶级的抵抗……但就经济管理而言，它没有任何作用可言，**从而同时为国家的“消亡”提供了前提条件**。

公共机构单位与国家的分离，它们与整个经济组织的结合，这就要求必须确定社会总产品中仍然要按照个人报酬的标准进行分配的部分，为此，我们精心制定了个人消费系数（FIC）。

至于分配领域，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机构也在资本主义内部出现了雏形。由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分配将按照不同的路线进行，因此，今天的消费合作社作为新共产主义经济的机构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又是另一个问题。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大量的经验甚至现在正在当代的消费合作社中得到积累。

如果我们把这一切与国家共产主义相比较，首先要注意的是，在国家共产主义的情况下，货币不可能被废除，因为只有那些达到必要的“成熟”程度的生产性企业才会成为国家所有。因此，很大一部分生产仍将掌握在私人资本手中，从而排除了货币以外的任何其他经济控制形式的可能性。**商品市场仍然存在，劳动力也仍是一种商品**，必须在市场上实现其价格。这就意味着，尽管有很多与事实相反的漂亮话，但在实际上**消除雇佣劳动是不可能的**。随之而来的“国有化”计划，被认为是开辟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事实上，它所开启的只是一片无尽的无望前景。塑造发展中共产主义社会的权利被从生产者手中剥夺，而赋予国家官僚机关，他们将使经济很快陷入完全停滞的状态。从他们的中央办公室这个孤立的角度来看，将由管理者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它会（更可能的是**应该**！）用多长时间，以及用什么水平的工资来支付劳动报酬。

在这样一个体制中，民主也必须发挥其作用。只有通过选举产生的能负责任的机构和委员会，群众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然而，这种民主将在一个又一个领域受到侵犯并变得无效，因为从本质上讲，它与其后不可避免出现的集中型管理不相容。后者将不可避免地演变成许多独立的独裁者的统治，而社会生活的进程将由民主制度内的专制统治形式决定。因此，在这里我们还将看到另一个例子，说明民主将如何成为掩盖少数人对数百万劳动人民的实际统治的外衣，这与资本主义下的情况完全一样。在最好的情况下，工人将不得不满足于受到高度重视的“共同管理权”，这是掩盖真实权力关系的另一种形式的伪装。

然而，拒绝一切中央集权的对生产的行政和管理形式并不意味着我们只采取联邦式结构的立场。只要管理权和行政权掌握在群众自己手中，并通过他们的工业组织和合作社来实施，强大的工团主义倾向就会毫无疑问地存在；但如果从一般社会簿记系统的角度来看，经济生活就会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这个战略角度来看，经济与其说是被管理，不如说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得到调查和计划。在经济过程中，人类创造性能量的应用与同时的转化给社会带来的所有各种变化都被登记在一个记录有机体中，形成了所有经济生活的最高总和。人们把这称为联邦主义还是中心主义，仅仅取决于人们看待同一现象的有利视角。它同时是此与彼，这意味着，就整个生产系统而言，这些概念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意义。联邦制和中央集权制的相互对立已被归入其更高的统一体中；生产有机体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 AAAP网站的编辑注释

1. 在德语中：“Hie Sozialdemokratie - Hie Staatssozialismus”，两次被错误地翻译成了“forward to”。

2. “社会监管与会计控制（social regulation and accounting control）”在德语中简写为“Verrechnung”，这是一个“改进”翻译的好例子。

Vico编纂于2016年2月4日，最新增补于2016年5月5日

Libcom版本特有的一个总结：

# 总结——对《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则》这部作品理论基础的总结 一项补充工作（AAAP版附带）

published by Neue Arbeiterverlag, Berlin 1931 Grundprinzipien kommunistischer Produktion und Verteilung von der Kollektivarbeit der Gruppe Internationaler Kommunisten - GIK [Allgemeine Arbeiter Union Deutschlands - AAUD]

1930

## 工人委员会作为共产主义生产的组织基础

在我们的《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则》一书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的看法，与以前工人阶级运动中所习惯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俄国革命所采取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因果前提，把对共产主义经济生活问题进行更仔细研究的必要性坚定地写在了日程上。

只要读一读俄国的“工厂法令”，就可以认识到，那里的工人对经济生活的进程没有任何影响，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样的结论：对生产机关的支配权掌握在有主观动机的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手中，而俄国国家共产主义下的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此外，如果不看到利润动机是俄国生产的基础，不看到生产的组织不是为了确保满足生产者的需要，就像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那就是瞎了。

迫使我们仔细研究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农业生产方面出现的新情况。在我们的作品*Perspectives of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中，我们已经表明，农业生产现在已经完全“社会化”——农民经济现在已经完全转变为“工业生产”，但是，农业问题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它将使反映了这些社会传统观念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任何尝试成为不可能。农业生产在本质上是不可能被有机地纳入“共产主义经济”的，即纳入国家管理。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的整个设想**一定是错误的**。

第三个，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使得有必要对共产主义生产的问题进行研究，这在于革命时期的工人阶级需要其他的组织形式，而不是在和平的“改善工作条件”时期的工人阶级运动中普遍存在的那些组织。于是，在**工厂组织和工人委员会**中，革命工人运动的组织结构发现了它的最终形式。

然而，在一个运动的组织结构和各种思想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这些思想体系，此运动在有意识的社会实践方面表达了自己。这种相互联系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可以把各种组织结构定义为服务于思想体系的功能工具，在意识方面，工人阶级运动就是通过这些思想体系被定义的。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各种倾向所采用的组织结构，沿着不同的思想体系平行发展，通过这些思想体系，当时盛行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定建设模式在概念上得到了表达。如果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就可以肯定地认为，在各种思想体系的领域中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甚至在当时，这些变化也在以这种方式寻求其合适的组织表达。

在**革命**时期，思想领域会发生重大变化，其发展速度之快，是人们闻所未闻的。工人斗争的动机完全改变了，变得完全激进化了。从1917-1923年革命时期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是，当时经历了变革的思想概念，获得了与旧工人运动所采用的完全不同的组织表达。然后，革命要求最激烈的斗争与旧运动对抗，甚至延伸到血腥的冲突，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些旧组织反对现在激进的工人和他们的新运动所采用的新目标，而这些新运动又反映了新形成的思想体系。**工厂组织和工人委员会**是工人借以进行革命的组织武器。

例如，在革命时期初期工人委员会概念的重要性可以从D J Struik在当时荷兰共产党通过关于工人委员会的决议时所做的一项调查中看出。

我们在那里读到：“没有什么比我们关于委员会制度的宣言更清楚地揭示了我们在理解社会革命的规律方面取得的进展。” 仅仅在两年前，这个宣言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回到三年前，即使是当时在国际（应该是第二国际——译注）上工作的最清晰的头脑，对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形式的委员会的意义，也几乎无话可说。[D J Struik : *Extract from a review published in 'De Nieuwe Tijd'* [New Times] for the year 1919 p 466]

要在战前的文献中找到表达这种精神的意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的时候，各种声明都只限于对政治和经济形式进行变革的简单声明，这些变革被认为是革命表达自身的必要形式。我们所知，没人尝试过进行任何比这更确切的说明，至少在Welchsel河的这一边没有。[那是在当时的社会民主运动中。在当时德国人的心目中，Welchsel河标志着“东方”或欧洲殖民的界限。——出版商] 在罗莎·卢森堡关于“大规模罢工”的整本小册子中，她只顺便提到了一次关于1905年工人代表会议（the Council of Workers' Delegates of 1905）的内容。

托洛茨基在他有关俄国1905革命的书中，详细论述了这第一个工人委员会的历史、意义和力量，但他并没有对委员会制度本身进行类似的深入研究。甚至在世界大战前半段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中，例如*Der Vorbote*、*Der Lichtstrahl*等，也完全没有提到1905年的彼得格勒苏维埃。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不久，苏维埃概念就开始获得如此稳固的地位和广泛的接受，这完全是革命本身的革命实践的结果。如果说Mehring那句众所周知的箴言，“群众在行动中的直觉比最伟大的个人天才的作品更具有天赋（Die Intuition der handelden Massen genialer sein kann denn das grosste Genie）”得到了证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此。

1917-1923年的革命时期给我们带来的最高、最积极的品质在于，使我们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为了完成自身而必须采取的形式，同时它也使我们看到了一种世界观，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式在思想领域的表现。夺取对社会生产机关的控制权是由**工厂组织**进行的，最确切地说，是通过它们的结合而形成的机关——**工人委员会**。因此，对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问题的任何研究，都必须以这些新的无产阶级权力机构和由此产生的思想世界为基础。

工人委员会有一天会成为地球上全人类的本质，就像一大束鲜花，一起阅读最高的阳光。

他们是普遍存在的最高境界，他们是对孤独的拒绝，每个男人、女人和幼童都在其中找到唯一的目标——人类。

工人委员会就像光一样，他们是和平、安宁和救赎；他们是真理和真理的来源。他们是全人类的基石，劳动的纽带，他们是人类的幸福——你是光明。

（“Die Arbeiterrate werden einmal dasWesen Der ganzen Menschheit auf Erden So als in Blumen in einer grossen Garbe Das hochste Sonnenlicht zusammen gelesen.

Sie sind das Hochste des Allgemein-Seins Sie sind das Verwerfen des Allein-Seins, Darin jeder Mann, Frau und zartes Kind Allein sein einzig Ziel, die Menschheit find't.

Die Arbeiterrate sind darum wie das Licht Sie sind der Friede, die Ruhe und das Heil, Sie sind die Wahrheit, und die Quelle der Wahrheit. Sie sind die Festigheit im grossen Ganzen Der Menschheit, die Knotepunkete der Arbeit, Sie sind das Gluck der Menschheit - sie sind das Licht.”）

[赫尔曼·格尔特：来自诗歌“工人委员会”（” De Arbeiderraad”）]

## 马克思主义关于决定对工人阶级统治的基本社会前提的规定

**除了**工厂组织的作用之外，我们还有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的第二个起点，即马克思主义对支配和剥削工人阶级的社会前提条件的规定。我们在这里首先关注的不是重复尽可能多的马克思的引文，而是尽可能清楚地阐明一般的思路，即他的分析的基本理论基础。

对工人阶级进行统治和剥削的基础，在本质上是极其简单的：它们包括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工人与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分离。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工人只拥有他们的劳动能力：资本家掌握着强迫工人必须劳动的条件。这使工人处于一种没有任何权利或权力的经济状况中，哪怕政治民主已经发展到极致。他们完全依赖于资本。除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所有者阶级还同时拥有对劳动能力的支配权：也就是说，它对工人阶级进行支配和统治。简而言之，这意味着：“**统治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使工人阶级处于对资本的依赖关系中。**”

### 基本因素

工人阶级与生产资料控制权的分离，**这一事实**本身就包括他们对自己的劳动产品也没有控制权。工人与他们的劳动所生产的物品没有任何联系；它们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他们的“主人”。之后发生的事情与他们无关；他们的角色只是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然后代表资本家行使劳动力，作为交换，他们得到工资：他们是**工资工人**（wage workers，或者雇佣工人——译注）。

鉴于这种情况的本质，不可能有别的情况。对生产机关（apparatus）的控制包括对成品的处置权。它们只是同一关系的两个不同方面——它们在功能上相互依赖，一个不能离开另一个而存在，一个只能通过另一个而存在。由于工人对生产机关没有任何控制权，因此他们也没有对成品的处置权；这是对工人的支配形式得以行使的基本手段，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工人被迫成为工资工人。

**雇佣劳动**(wage labour) 是劳动与劳动产品分离这一事实的表现，工人对他们的劳动产品和生产机关都没有权利（rights）。雇佣劳动的存在是工人阶级对生产过程没有或不负有任何责任的明确标志，是他们被那些对社会生产机关和社会产品拥有支配权的人所统治的明确标志。

统治工人阶级的制度的基础可能是简单的，消除工资奴隶制的基础也可能是简单的，即使它们的实际实施绝非那么容易。**只有当劳动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分离被克服时，只有当对劳动产品的支配权，因而也是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落入工人自己手中时，才能实现工资奴隶制的废除。**

这就是共产主义生产的**第一个基本**基础。

当然，这已经不可能像手工业者获得对其工具和劳动产品的权利那样，以同样简单的方式发生。当今社会对个人的、自给自足的劳动者一无所知；它早已转向社会生产，转向完全社会化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只是一台巨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今天的工人必须以**社会的方式**占有生产资料。然而，社会所有制如果不同时包括对生产的控制权，就没有达到其目的。社会化的控制形式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实现工人对生产资料之控制权的手段——一种消除劳动与劳动产品分离的手段，能够废除雇佣劳动的手段。

### 目标与手段的混淆

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当今劳工运动的弱点。宣称的目标是将生产资料纳入共同所有制，但显然没有人想到，这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是什么目标；甚至没有人怀疑，随着社会转变为“公有制”，**首先出现**的困难是如何建立一种新生产方式。工人阶级生活在一种虚假的幻想中，认为共产主义会以某种方式“自行”发生，仅仅作为生产资料中私有制被消除的结果。但在实现这一目标时，雇佣劳动必然消失的假设是错误的。

**无产阶级权力的真正战略目标**只能是由工人征服（conquest）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从而也征服了他们的劳动产品。通过这种手段，他们同时消除了雇佣劳动的全部基础。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工人阶级才变得“自由”。由**自由生产者**在社会上行使的对生产的支配权——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

然而，一旦获得了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自由生产者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置这些生产资料，就像资本主义下的“自由业主”、工厂主或“工业领袖”一样。一旦这种支配权变成武断的，社会行使的控制权就不可能了。确保对生产机关的支配权在社会上得到实施的第一个前提是，确保生产是按照普遍有效的原则进行的，所有社会劳动必须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出符合社会要求的决定和行动。为了实现这一点，自由生产者必须为**所有生产者**创造**平等的生产条件**。一旦实现了这一点，整个社会的生产就将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上。这样，**自由生产者**就同时成为了**平等的生产者**。这样一来，工业组织的各种组合就体现了“自由平等生产者的联合体”。

从这一点来看，不来自任何“伦理”或“道德”基础，而是产生于共产主义经济生活本身所特有的生产的**必要条件**。在这里，“平等”不被视为道德的概念，而是经济的概念。它所要表达的是，所有工业组织的生产都按照相同的规律进行，以便使社会对生产机关的支配权成为可能。为整个生产确保这些法律，使之成为一种有约束力的义务：**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

因此我们看到，对平等的道德要求，是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一项核心要求，同时也是个性充分展现的前提，其基础是**生产的平等**。

### 社会民主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社会劳动本身与那使得资本能够支配劳动的组织形式间的相互混淆**

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派和激进派[布尔什维克]两翼，正是在“自由平等生产者的联合体”这一决定性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进行了修正。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劳动过程的社会化只不过是商品生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成为主要生产方式这一事实的必然结果。越来越多的生产者专门为市场而工作。每个人都生产他自己不消费的东西——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注定是给别人的；因此，每个人都在进行社会劳动，每个人都为社会劳动。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伟大的革命，它在其发展过程中把生产者从他们旧的和习惯的生产方式中剥离出来，使他们为资本服务，使他们进入一种劳动过程，此过程根除了旧的、过时的劳动条件，破坏了与个人或家庭的每一种关系。资本主义使所有人都沦落到这样一种状况：每个人都被剥夺了所有的财产，除了他赤裸裸的劳动能力外，什么都不拥有，因此被迫参与社会化的劳动过程。

社会民主主义对这种生产社会化过程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现在仍然这么理解]。它只看到社会生产的不断进步，只看到托拉斯、辛迪加和卡特尔的不断发展。它只在社会生产资料得以组织起来的形式中看到了社会化。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私人和集体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对生产资料——对社会化劳动和社会产品——行使的支配权得以**组织和集中起来**的形式。

社会民主主义把确立对社会劳动的支配的具体资本主义**形式**与社会劳动本身的**实质**相混淆。

毫无疑问，在概念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应与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现实的方法而得出来的内容完全不同。无论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激进派还是它的改良派兄弟那里，都把纵向的信任——资本主义的联合形式，它将生产组织构建在一个单一的联合体中，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视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想条件：

“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象邮政一样……”（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三章）

在这里，摆在工人阶级眼前的显然是一个虚幻的愿景，即所谓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它描绘了这样一个前景：这个阶级，作为其**第一步**，征服了**政治权力**（STATE），以这种方式获得**对国家的控制**，**只有那时，而且仅仅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对最初由资本本身主持下创造出来的中央生产机关的控制权。因此，众所周知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帕尔乌斯解释说：“从大规模工业向国家生产的过渡是多么容易实现。”[Parvus: '*Der Staat, die Industrie und der Socialismus*', p 112]

我们在鲁道夫·希法亭那里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他说：“这无非是说，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问题是，在国家的帮助下，在有意识地运用社会调节方法的帮助下，将当今由资本家组织和领导的经济转变为通过民主国家管理的经济。”[R Hilferding;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in der Republik*' - p 6]

**这就是**我们在社会民主主义内各种不同的意见中遇到的对共产主义生产的一般看法。这些不同流派之间的差异，只有在讨论和决定为实现这一社会目标而应采取的方法和策略的问题上，才显得重要。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派试图通过运用资产阶级民主，通过普选的道路来达到其目标。它想要“征服一个自成一体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并通过其机构来克服资本组织。” 当然，真实的情况是，即使有社会民主党人在政府中，国家也被征服了，并被更牢固地置于资本组织的控制之下。

社会民主主义的激进派，即布尔什维克党，坚决反对这一政策。它宣扬用革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形成新的政治力量，即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或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通过这个国家的机构，并作为革命发展的结果，将建立一个集中的经济组织[以资本主义托拉斯为榜样]，一旦工业和工业组织足够“成熟”，就将其纳入其中。换句话说：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那些已经实现了足够程度的集中，值得纳入国家管理的工业部门，注定要经历“国有化”。

### 国有化和社会化

尽管马克思没有详细描绘共产主义的经济生活，但毫无疑问，根据他的观点，生产的调节将“不是通过国家，而是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自由联合体的结合”来实现。[H Cunow: '*Die marx'sche Gesichts-, Gesllschaft- und Staatstheorie*' - Vol 1 p 309]

在这种观念中，生产的管理和行政应该是生产者-消费者自己的直接责任，而不应该通过国家来组织。将国家等同于社会是后来的发现。当然，这种观点与《共产党宣言》中表达的观点相矛盾，在这方面，《共产党宣言》可以被理解为仍处于国家资本主义概念阶段的作品。然而，恰恰是1848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形成了经验的苗圃，新的观点在这片土壤中生长和发展。

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中表达了自己对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的反对意见，他写道：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第三编，第五章）

“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

随后，在1880-1890年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观点被整个社会民主党采纳。例如，威廉·李卜克内西在试图将铁路、矿山和其他大型工业纳入国家管理时发表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打算逐步将一个又一个工业企业国有化。换句话说，用国家取代私人雇主，继续资本主义工业，只是换个雇主……它[国家]作为雇主出现在私人雇主的位置上，而工人在这一切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尽管国家确实加强了它的权力和压迫手段……资产阶级社会越是认识到它无法永远抵御社会主义思想的浪潮，我们就越是接近那个真正宣布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的时刻，社会民主主义必须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将在这一口号下进行：‘向社会民主主义前进，向国家社会主义前进！’” [W Liebknecht: '*Staatssocialismus und revolutionare Sozialdemokratie*' quoted by H Cunow in: '*Die marx'sche Gesichts-, Geselschafts- und Staatstheorie*', Band 1, P 340]

柯饶在这方面说：“根据这一线索，党代会也宣布反对国有化；因为社会民主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同上，p 340]

大约是在世纪之交，这个经典的立场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国有化，或将工业企业纳入国有工业，被说成是向社会主义的逐步发展。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术语来说，这种机构当时被称为“公有制下的机构（establishments under common ownership）”，即使生产者与它们的行政和管理没有任何关系。

### 俄国革命提出的困难

俄国革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施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实际例子。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宣传，说工人应该占领工厂，以使这些工厂继续在工人自己的管理下运作。对他们来说，没收工厂从来不是工厂工人的事，而是新国家政权的事。工人发挥的作用只限于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以这种方式将布尔什维克提升到新国家的指挥地位。逐步推行“共产主义”就成了新国家的责任，它的计划是将那些“成熟”的机构收归国有，由国家中央管理。

然而，**这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发现自己几乎立即卷入了与工人群众的矛盾之中。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接管了政府，11月14日颁布了一项《工人监督条例》，规定某些控制生产的一般权力被赋予了工人委员会，但其中也明确规定，工人委员会**不得参与工厂的日常管理工作**。这也被明确禁止：“占有或管理企业”，除非得到“上级机关”的许可（并没有找到正式条例中相关的规定，不过列宁的草拟条例中有“非经工人和职员选出的代表许可，绝对禁止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或生产部门……停工，以及对生产进度作任何改变。”——译注）。

不过，“上级部门”没有采取国有化措施，因为他们的行政机构还没有发展到足以维持工厂在他们控制之下的水平。直到1918年6月28日，布尔什维克执政8个月之时，他们仅成功地将100家工业企业收归国有。而且，大多数是“惩罚性没收”，作为对私人业主破坏企图的防御措施。

然而，工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实施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政府根本没有实施国有化，所以现在很自发地出现了“自主”或“野猫”征用的运动。据Piatakov[当时是国家银行行长]所说，出现了相当自发的“夺取工厂控制权的基层运动，是由工人监督机构发起的。”（英文“工人监督”为Workers' Control，实际俄语含义更倾向于前者，这也跟《列宁全集》中的草拟条例翻译一致——译注）

其结果是：“将工厂的行政责任转移到工人团体的手中，而不是转移到工人国家的手中”。

“一个新的主人出现了，和以前的主人一样是个人主义的，新主人的名字是工人监督委员会。”

['Izvestia' 27th April 1918]

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All-Russian Congress of Economic Councils, ARCEC]到那时为止[1918年6月8日]只成功地将100家工厂收归国有，而“野猫式”的征用到那时为止包括400多家工厂，其中200家是在5月15日至6月28日的短暂时间内被征用的。1918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工人委员会[苏维埃]大会确实宣布禁止“自发”征用，但这次大会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代表了工人的实际意见，在上述200个征用的成就中就足以说明。这种迅速蔓延的“野猫”征用运动是政府政策突然改变的根本原因之一。6月28日，苏联颁布了范围广泛的《国有化企业管理条例》，目的是在生产中至少引入一些秩序。目前，这种国有化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因为意图是在旧的资本家所有者的管理下继续生产，这些所有者在“免费租赁和使用”协议下保留了对工厂的控制。

现在开始了一场争夺工厂控制权的斗争。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发起了一场反对“工团主义倾向”的运动，因为它把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工人则试图为自己保留管理权。有一个例子就足够了：Jivilov淀粉厂被政府收归国有，但工人委员会拒绝将管理权移交给ARCEC的代表。这导致了“工人代表联盟”的形成，该联盟捍卫“工厂委员会自治权”，与工会相对立。这个特殊的组织首先是在铁路车间建立的。

无论对这些“工团主义倾向”的仔细调查和反对它们的斗争对解决社会革命所面临的问题多么重要，但这不是发起它的地方。我们目前的目的仅限于揭示政府权力及其国有化政策与工人的自主革命行动之间出现的矛盾，也就是说，国有化与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上述例子充分证明了这一矛盾在革命中确实存在的事实。

至于共产党，它没有就工人如何将工厂融入共产主义模式的经济生活提供指导方针，它没有说明在实践中如何将管理和行政的控制权交给社会。就它而言，工人的解放不是工人自己的任务；相反，引入共产主义是“科学家”、“知识分子”、“统计学家”等人的责任。共产党认为，只需要赶走旧的工业领袖，把对劳动的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就可以确保社会安全停泊在共产主义的港湾里。至于工人阶级，它只能做的只是赶走劳动的旧压迫者——并在这些人的位置上放上新的压迫者！除此外没有他们的作用，也不可能比这更大了，因为普遍接受的生产规则没有为他们的自我组织提供基础。

布尔什维克向全世界大张旗鼓地宣称他们是马克思的一贯追随者，如果他们不如此强调自己，他们会做得更好。事实上，他们不过是马克思的一贯修正者，因为从马克思所设想的生产社会化到“成熟工业单位的国有化”的变化，不外乎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否定，对共产主义本身的抛弃。根据马克思主义，在“成熟”和“不成熟”的工业企业之间没有有效的区分；对于共产主义来说，社会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变得“成熟”。

“把对个体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或市政化（municipalization）当成社会化的一种形式，人们认为这种流行的描述正在逐步推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化’概念，这是一种错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原本难以理解和神秘的‘成熟的企业......’才会得到强调。然而，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走向成熟。按照他的说法，单个的工业单位或这些单位机构的分支，很少能够变得‘成熟’和‘为社会化做好准备’，就像胚胎的独立器官在孕期的第四个月变得成熟，并被分娩出来独立营生一样。”[F. Oppenheimer, quoted by H. Beck: Sammelbuch über 'Wege und Ziel der Sozialisierung' (Symposium on 'Methods and Aims of Socialisation'), pp. 16-17.]

### “国家共产主义”下对劳动和工人阶级的统治形式

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各种流派中被当作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东西，实际上与引入在本质上是新的、关于物质社会生产的经济法则毫无关系；而只是把资本主义的典型组织形式带入“共产主义”的经济生活中。然而，资本所创造的生产组织形式的意义是什么？一方面从雇工的角度看，另一方面从资本家的角度看，它又有什么意义呢？它只不过是**对工资劳动者的统治形式，对工资劳动者的有组织的统治形式**。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在这一点上没有留下任何疑问。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相对于雇佣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的特点是，前者掌握着对劳动和劳动所得的支配权，也就是说，掌握着工人和他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产品。

社会民主主义各派所持有的各种社会化理论，都围绕着这一点，即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形式。对他们来说，当然必须对劳动进行统治和指挥，除此之外[因为我们关注的是一个社会上不可分割的综合体系]，不言而喻，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组织。要完成的任务是尽可能全面地、以集中的结构来组织对工人的指挥机关；但是，这种指挥机关本身，在改良派那里，是要置于议会的控制之下，在社会民主主义左派或激进派那里要置于无产阶级国家的控制之下，这个国家是在[所谓]工资工人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建立的。换句话说；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形式将通过引入“民主”而得到改善。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限制下，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倾向都在发展，从彻底的改良者到自称的革命者，他们的目标是摧毁当今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并重新组织起来。在所有这些人中，所追求的有意识的目标是实现对劳动的有组织的指挥权。如果“社会主义”生产体系在这些社会化计划引入后能顺利运作，那么行政部门的主要关注点就是确保其对生产机关的支配权，并同时确保其对工人的指挥权。

“如果我们要严肃地谈论计划经济，如果要使劳动力的分配方式在其发展的任何特定阶段与经济计划完全一致，那么就不允许工人阶级过流浪生活。就像军队一样，他们必须准备好驻扎在固定的营地里，在这里和那里驻扎，或者奉命来往。”[托洛茨基；'Russian Correspondence' - Imprecorr 1920 Vol.10 p 12]

在理论上，这种权利是以经济计划的名义要求的；在实践中，它用来对付上级不想要的和不受欢迎的、由工资工人在经济过程中制造的每一个干预。每当工人自己表示希望对生产过程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时，这种愿望就被说成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表现……有关工人就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对待！俄国国家共产主义的整个发展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有益例子。[我们已经提请注意1917年11月14日颁布的《工人管理法令》，其中明确禁止“工人对企业日常管理的干预”] 1918年4月20日，在第三届工会大会上，政府得以恢复工厂的个人管理，并部分地重新确立了“对上”——即向高级管理层——负责的责任原则。另一方面，“工人代表联盟”和高尔基周围的一个团体通过主张“工人委员会”的集体负责制来反对这一点，但他们以很小差距失败。1920年，个人管理的原则，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责任的原则，作为一项普遍措施被引入。

那么，**现在**要通过议会或通过自称是工资工人的政党所建立的支配经济生活的中央机构来实现**什么**？

剥削是要消除的，这一点我们都是一致的。改良派认为，即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运动规律仍然有效，这一目标也可以实现。由于剥削现在是通过国家的机构进行的，因而所得的利润将通过各种社会机构和改良流入工人手中，这一事实将予以消除。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试图完全废除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运动规律，并寻求“自然”分配社会产品，即通过物物交换制。这种尝试既存在于向工业单位分配的领域[积累]，也存在于个人消费的领域。它很快就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于是就采用了上述的改良主义方法来代替它。在这两种情况下，结果都是一样的：**国家资本主义**。

## “自然的”[以物易物]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分配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理想

### 实验

**布尔什维克党把**实现一种消除工资劳动和剥削的社会状况当作目标。因此，他们有意识地努力实现货币的废除。这一目标是通过释放影响所有交换手段的巨大通货膨胀浪潮来实现的。国家的印刷机夜以继日地工作，印出越来越多的纸币，国家用这些钱来偿还债务，但却没有提供价值保证；“钞票正在印刷……印制足够的钞票是不可能的。对它们的需求甚至比生产它们的手段还要巨大。”[A Goldschmidt; 'Die Wirtschaftsorganisation Sowjet-Russlands', p 138]

随着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的巨大增加，卢布的价值或购买力自然下降。另一方面，商品的价格每天都在飙升，达到更高的水平，这种现象我们在德国的通货膨胀[1923]时期也很熟悉。货币的价值下降得如此之快，以至于那些有东西可卖的人不再愿意把他们的商品换成货币。事实上，他们仍然希望交换他们的货物，而不使用货币这一中间形式；他们只希望**直接的交换货物**。

事实上，这正是布尔什维克正在努力实现的情况。1921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俄罗斯财务人民委员部向所有代表分发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这种刻意追求通货膨胀的政策被称赞为一种有意识采用的引入共产主义的方法**。

“如果在俄罗斯，货币的价值正在下降，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但我们有一个解决办法，一个希望；我们正朝着彻底废除货币的方向发展。我们正在采取以实物支付工资的方法，我们正在实行免费使用电车，免费教育，免费食品——即使目前质量很差——免租金的住房，照明等等。我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非常缓慢地引进这一切，同时被迫为我们的目标不间断地奋斗；但我们确实有一个解决办法，一个计划……”

[G·季诺维也夫; 'Zwolf Tage in Deutschland' p 12, quoted by Pollock; 'Planwirtschaftliche Versuche', p 73]

那么，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的特点是，苏维埃国家的中央经济委员会将掌握对商品生产、分配以及提供服务的所有控制权，同时将采取措施消除所有货币和贸易。必需代表所有公民决定每个人应拿多少面包、黄油、衣服等，然后以实物形式向他提供这些物品。这将通过有意识地应用生产和消费统计来实现。

“无产阶级经济在原则上是一种商品生产经济，是一种基于以物易物的经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进行，货币首先必须从社会管理的工业单位之间的交易中消失。煤矿向铁路和钢铁厂提供煤炭，而不对其进行任何价格核算。钢铁厂向工程公司提供钢铁，而这些工程公司又向国有农业企业提供机器，没有货币作为中介。工人们收到的实物工资不断增加；住宿、取暖、面包、肉等等......货币作为交换手段的作用逐渐消失。”[E·沃尔高; ' Die wirtschaftspolitischen Probleme der proletarischen Diktatur,' p 139]

从以下日期可以看出，这些目标不仅仅局限于纸面上的声明；

1919年1月——实行免费邮递。

1919年2月——关于国家工厂之间货物运输的法令，不需要任何银行转账，也没有任何账目记录。

1919年6月——铁路上实行免费的货物运输。

工资的“**国有化**”是在1918年至1921年的整个期间分阶段进行的。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只有15%的工资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电话费、煤气、供水、供电、租金、燃料和交通都是免费提供的。食品供应委员会的责任是通过这种方式为5800万公民提供食品。

因此，生产和分配需求的管理和核算将不通过货币形式或任何其他一般手段进行，而只通过供应货物的总数或数量进行。将根据重量、长度或面积进行核算，或者最后根据所供应的消费品的件数进行核算。总而言之，其目的是转向“自然经济”，一种基于易货贸易关系的经济，奥托·纽拉特用以下的话描述了这种经济的特点：

“社会主义经济科学只承认一个单一的经济主宰：它不计较盈亏，不流通任何形式的货币，无论是贵金属还是反映经济计划的‘劳动货币’，在没有任何核算控制单位的帮助下组织生产，并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分配生活资料。”[O Neurath; 'Wirtschaftsplan und Naturalrechnung', p 84]

从1918年到1921年，布尔什维克一直试图在实践中实现这一原则，而这些尝试所采取的最后一种形式应该被视为官方对其死亡的纪念。1921年，卢布实现了稳定；恢复“基于价值的货币”再次成为官方政策。

苏维埃国家被迫放弃了从生产和分配中消除货币的观点，还有建立通过国家经济机构实行以实物替代货币经济核算的计划。

然而，导致这场惨败的绝不是“世界革命的失败”，甚至不是所谓个别农民经济不适合国家经济管理的问题。这个实验所揭示的是，在这种“共产主义”基础上的生产和分配是不可能的。**俄国革命在实践中证明，对经济管理和控制没有计量单位手段的生产方式，只不过是一种不可行的乌托邦式反常！**

在试图引导俄罗斯经济生活走上新道路的情况下，采取了一项严格预先确定的计划——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相当正确的。各个工业单位制定了自己的生产计划，并计算了自己的成本增量，然后由中央托拉斯管理部门将这些计划细化为整个托拉斯的总体计划。合并所有托拉斯的所有计划后，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就得到了一份国有制内整个生产机关的总体概要，据此可以制定出整个国家工业的总体生产计划。

但所有这些计划都是建立在**卢布单位**计算的基础上的！为什么这不是基于**实物**的计算呢？

因为就经济的基本范畴而言，也就是因此而必需的范畴而言，仅仅根据重量、物理尺寸或数字数量把各种劳动产品加在一起，这是完全无意义的工作至于俄国人的企图所遭受的命运，如上所述，它导致卢布的价值迅速下跌，而产品的价格也因此迅速上涨。结果，如此费力计算的计划和成本增量只在纸面有效——对于实际的生产过程，它们没有任何价值或意义。沃尔高从社会策略的角度接受了“通货膨胀法”的优点，但他不得不承认，他发现其最大的缺点在于作为一种经济方法的无效性。他写道：

“货币的迅速和持续贬值是一个缺点，因为它阻碍了工资的稳定，引发了工资斗争，导致了国家工人和无产阶级国家本身之间的分歧，迫使工人不断要求加薪，使所有经济计算变得极为困难，并使制定连贯一致的国家预算，特别是将预算维持在既定限度内成为不可能。”[E·沃尔高 ;《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政策问题》，p. 138]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苏维埃国家被迫停止破坏“基于价值的货币”的现实原因之一就是这样的。到1919年，人们已经承认“根据产品价值进行核算越来越有必要”，因此，到1919年第二次经济代表大会时，已经作出决定：“根据交换的产品价值来表示对最重要的国家支出的所有计算。”[A Goldschmidt; 'Die Wirtschaftsorganisation Sowjet-Russlands', p 133]

不言而喻，只有当整个生产站在价值的基础上，这才有可能实现。因此，货币的全面稳定是必然的结果。

### 俄国革命的两个教训

布尔什维克建立“自然经济”的**伟大实验**包含了两个重要的教训，一个是经济上的，另一个是政治上的。这些教训应该有助于工人阶级发展无产阶级意识。经济方面的教训是，如果没有对经济生活中的关系进行核算的一般手段，合理的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为了制定生产计划，必须知道以劳动时间[劳动小时]衡量的各种形式的劳动有多少，以及这些劳动如何在各个生产部门中分配。到目前为止，要把一吨煤和一吨玉米加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因此，就所有产品而言，必须撇开它们作为有用物的形式，撇开它们的“使用价值”，而只关注它们无一例外都有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它们都凝结有一定数量的人类劳动**。因此，在制定生产计划时，**必须确定构成计划的每一种产品所需的劳动量**。在共产主义社会，直接衡量这种劳动是可能的，而不需要用金钱作为中间手段来歪曲事实。

“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100 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100 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劳动小时。因此，到那时，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不断波动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产品中包含的、现在已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的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来表现这个量，而是会用它们的自然的、最恰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编，第四章）

至于政治方面的教训，那就是试图把对生产资料的行政控制权交给一个中央国家机关，只能越来越多地导致工人独立主动性的消除。在这种制度下，生产者不可能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有任何控制；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与资本主义下的生产方式完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建立产品的实物分配，进行“工资国有化（nationalisation of wages）”，只能使对“人民财富”来源的控制权更加牢固地掌握在中央国家机关手中。因此，布尔什维克形式的工资增长，只不过是**奴役工人阶级的手段的增长**。用于对生产机关、社会劳动和社会总产品进行控制的客观手段，在对其的掌控权在中央国家机关手中集中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概念转变为它的反面，转变为反革命的**针对**无产阶级之专政的概念的过程。

## 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单位

### 生产的调节

**在上一节**“马克思主义关于决定对工人阶级统治的基本社会前提的规定” 中，我们看到，共产主义面临的基本问题在于克服劳动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分离。不是什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变种，而是工人-生产者本身必须拥有对其劳动产品的控制权，而且这种权利必须通过**他们自己的自由和自治的工业组织**来行使。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自由生产者，也只有这样，他们才有能力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组合成“自由平等生产者的联合体”。正因为当代技术已经达到了全体生产完全社会化的发展阶段，所有的工业单位都毫无例外地在技术上完全相互依赖，从而形成了一个单一的、不间断的劳动过程。就像现在革命的任务一样，共产主义要把它们锻造成一个单一的经济实体。然而，这只有在整个经济过程被一个**普遍有效的客观经济法则所**统一时，这才有可能。

这种结合的统一与所谓的“社会化”理论所提出的完全不同。这些理论从来没有更深入地研究过这个问题，而只是纯粹机械地理解这个问题，认为它不过是各个生产部门的**组织性合并**。他们只关心**哪些**行业要合并，以及如何在纯粹的组织技术意义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与新经济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没有任何关系。在对旧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革命的破坏之前，甚至连考虑这些问题都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在这样做之前，必须对各种工业组织之间必须存在的相互关系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也就是说，它涉及到调节独立的工业组织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组织之间关系的基本社会有效性。

因此，新的一般经济法，即整个经济体系统一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经济法，至少在早期阶段，不以任何方式关注经济各部门的纯组织性整合。它只关心建立一般条件，在这些一般性条件下，生产者**通过他们的工业组织相互联合**，相互参与经济的普遍体系（general system）。首先，这些条件对每个经济部门都是一样的。与列宁不同，他的出发点是：

“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象邮政一样……. 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列宁，《国家与革命》）

我们说：“社会生产各部门的经济条件一律平等，这是我们的第一要求。”

只有这样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在技术意义上讨论将要采用的组织**形式**的问题。

“经济条件平等”首先涉及到对经济调节控制的一种准确而普遍有效的计量单位手段的引入，所有的生产和分配关系都按照这个尺度来管理，所有的会计计算都必须在这个尺度的基础上进行。这种措施不可能再采取货币的形式，因为在工人和他的产品之间不再有任何“第三方”的介入。工人现在不再作为一个“异化者”站在社会劳动的产品之上。当然，工人本人并不消费他自己直接生产的产品；但他的产品确实具有社会生产的所有产品都具有的品质：生产产品所需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因此，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所有产品在质上是完全平等的。它们之间的差别只在于生产过程中所花费的社会劳动的**数量**。正如衡量个人劳动时间的单位是劳动小时一样，衡量产品中社会劳动量的单位也必须是**社会平均劳动小时**。

因此，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迫切需要，所有工业组织都有义务为它们生产的所有产品计算出它们在生产中所花费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确切数量，同时把它们的产品转交给其他工业组织或消费者，并在上面打上适当的劳动时间量。作为交换，这每个工业组织都有权以其他产品的形式利用等量的社会劳动，以便能够按照同样的方法继续生产过程。这样一来，所有人都在平等的经济条件下参与生产过程。一旦这种调节生产和分配的制度建立起来，整个经济生活（它已经通过各种部分形式的劳动的相互结合而被社会**联合**起来）现在也在经济上，即社会地**得到调节**。

资本主义试图通过组织手段，通过不断提高其在工业中的权力集中程度来建立这种调节。当然，它所实现的不过是在越来越高和越来越对立的水平上组织竞争，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灾难性危机。人们试图根据“民主”的规则，通过政治手段来改善与此相关的矛盾，目的是确保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更安全的基础上继续存在。然而，这最终只会使资本主义众多矛盾中最后也是最深刻的矛盾处于更有组织的基础上：这种社会状况只有在工人获得自由时才能克服；只有在他们获得对生产资料的无可争辩的指挥权并开始在经济平等的条件下参与经济进程时才能克服。

### 对分配的调节和控制

然而，革命并不仅仅是生产的经济条件的转变；它还在分配领域，更具体地说，在个人消费领域建立了新的经济条件。一旦工人掌握了对劳动产品的支配权，**他们与产品的关系就必须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并得到调节**；也就是说，在这一领域，新的生产关系也必须在新的社会有效性基础上的新的经济关系中得到最终的完成。工人可能确实拥有对其劳动产品的控制权，但这种权力并没有赋予与资本主义时期相同的权利，即**一种绝对自由的处置权**。对劳动产品的处置权只有在对所有人完全平等的社会条件下才可以行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确实是自由的，但只有通过他们社会所相互依存和统一的工具才能实现。

每一个工业单位**不过**是社会这个巨大的经济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但是，它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每一个细胞都可能有由自己确定其性质的任务，有自己的不同角色，它只能通过自己独立的自我活动来完成。然而，与此同时，这种自我活动只能**存在于并通过**由共产主义社会有机体整体运动的一般规律所形成的明确界定的框架内才可能。在这个确定的框架内，自由的自主活动和自我运动可以发展和展开，为此，工人通过这个框架的工具，成为**自由生产者**。

另一方面，制约个人消费的平等条件只能通过与适用于整体消费相同的计量单位来体现。正如个别小时是衡量个人劳动的单位一样，个人劳动小时同时也是衡量个人消费的单位。通过这种方式，消费也是社会调节的，并在充分和明确规定的限度内进行。

因此，就其本质而言，社会革命只不过是引入了劳动时间作为调节和控制整个经济生活的计量单位手段。它作为生产的尺度，同时，同时，生产者在社会产品中占有份额的权利也通过这一工具来衡量。然而，所有这一切的最基本特征是，作为经济调节和控制的普遍范畴，这种单位尺度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己实施和执行的。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这是共产主义的“伦理”或“道德”要求，而是因为从经济现实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

当然，消除劳动剥削中的不平等权利也是事实，这是人类自由充分展现和全面发展的前提，也是一种道德要求。但这只是再次证明，经济领域和社会伦理只有通过它们的相互依存才能实现自己——它们都融合成一个实体。

## 出版商提示

从德文翻译自1930年AAUD在柏林出版的《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则》，该书由“国际共产主义小组”[GIK][他们是德国工人总联合会（Allgemeine Arbeiter - Union Deutschlands）或全德工人总联合会的残余人员]制作。英国读者应该注意，德语“Union”一词所隐含的关键区别——“工会（trade union）”在德语中是Gewerkschaft，所以工人实际上必需建立他们的战斗组织，即他们的“联合会”（或者叫“工厂组织”），以反对和**对抗**工会或Gewerkschaften]